

907550-54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五輯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一月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孙中山先生寓所（今中山故居）举行庆祝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紀念。

后排左起：刘伯伦、毛泽东、向昆、沈泽民、（名不详）、葛健时、罗章龙、恽代英、邵力子、戴季陶。

中排左起：（名不详）、（名不详）、韩觉民、叶楚傖、王荷波、（名不详）、何世桢。

前排左起：邓中夏、喻育之、孙铁人、茅祖权、张继、胡汉民、汪精卫、谢持、（名不详）、向警予。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此詩在六月廿九日
寄江庸先生
陳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室

新時代，大集詩，不辭勞
為流輝，欲求其，豈
此等詩，可以不作耶！
先生年已八旬，而能
為詩，其詩人，何以故
本行耶，亦其
陳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室

跟進之必然，彼海
張厚，其成，其在吳之
以，其折，其其，其
先生詩，百其，其
不，後，作，其，其
在，搖，納，其，其
其，其，其，其，其
破，其，其，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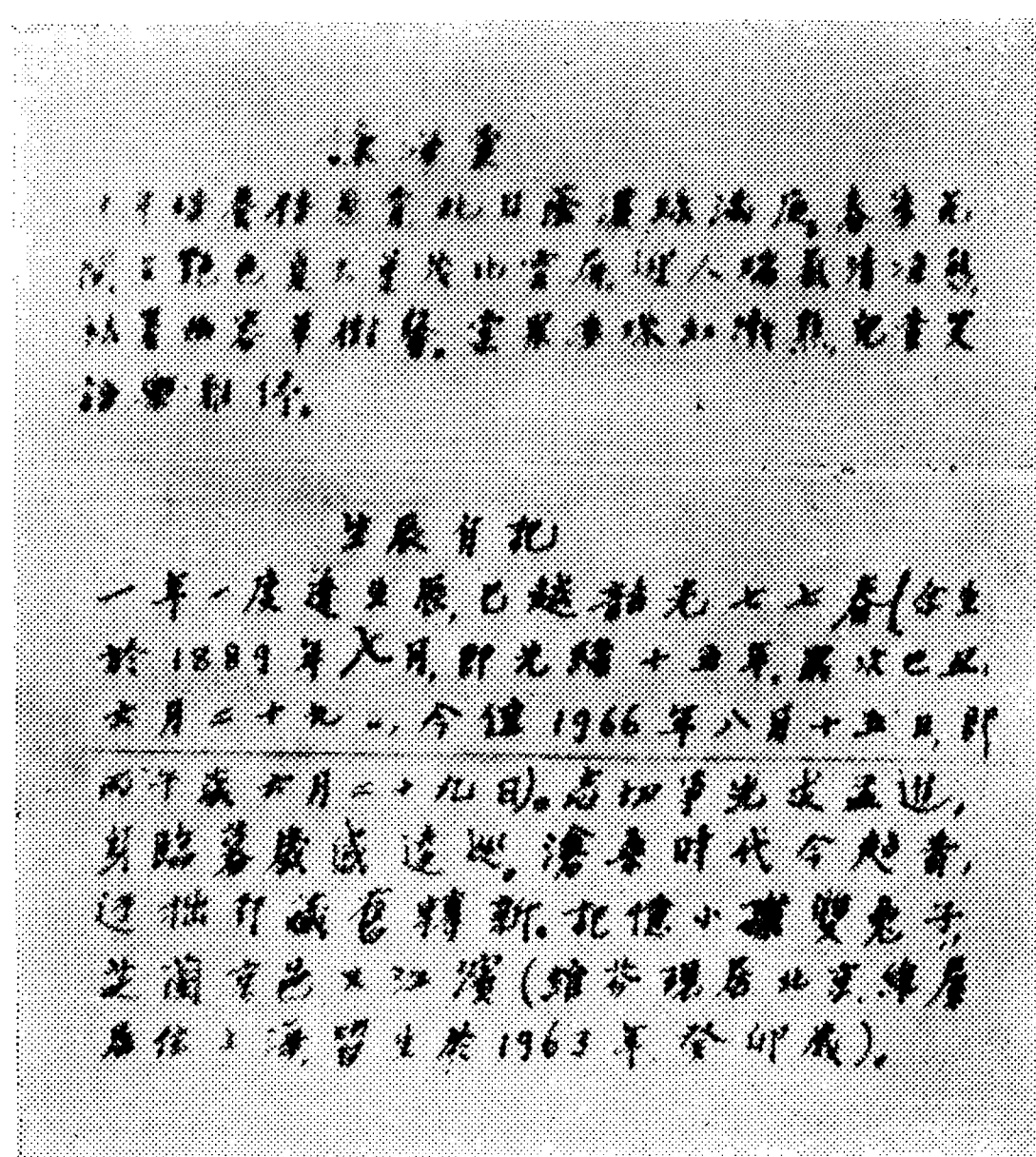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室

翊老重疊，其其收，其
中，其，其，其，其
人，其，其，其，其
大，其，其，其，其
威，其，其，其，其
早，其，其，其，其
有，其，其，其，其
之，其，其，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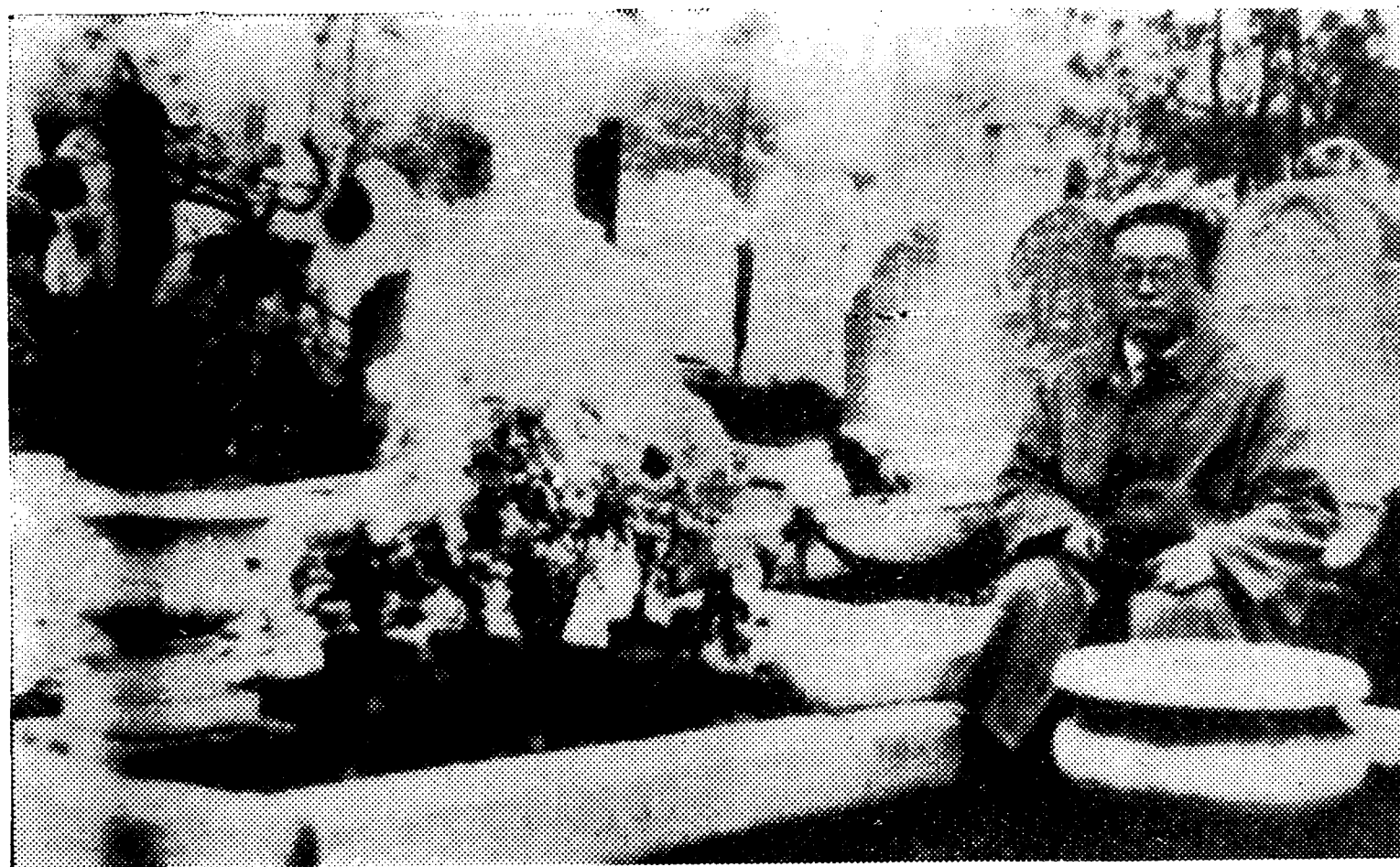
陳毅同志給江庸先生的親筆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翁文灏(正面沙发上右首)参加一九六一年端午诗会留影
(中为邵力子,左为王葆真)



翁文灏诗稿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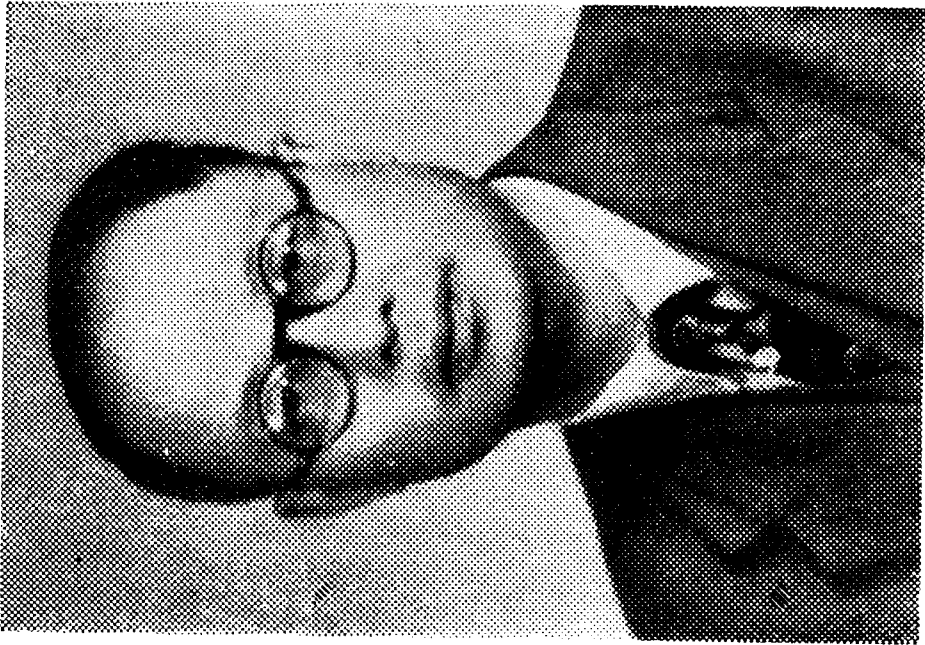


陶行知在马克思墓前



陶行知等在巴黎参加法国作家、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巴比塞葬礼时留影

(左一)陶行知,(左二)任克,(中)陆瑾,(右二)钱俊瑞,(右一)徐寿轩



王造时先生像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手迹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王造时先生自述

目 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任武雄(1)
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后	李家齐等(11)
抗日战争时期苏南与苏中的反清乡斗争	李 广(29)
策动汪伪第四军起义始末	顾草萍(38)
蕉园诗稿(选录)	翁文灏(46)
江庸自传	(64)
有关先父江庸的点滴史料	江 靖(69)
李公朴先生在申报馆的工作	伍康成(73)
陶行知二十六国行	杨明远(84)
王造时自述	(98)
先师圆瑛法师事略	明 旸(140)
回忆《生活知识》周刊	毛齐华(147)
记开明书店	章克标(152)
上海雷士德工学院	郑朝强(171)
对《我所知道的上海震旦大学》一文的几点质疑	程兆奇(185)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任 武 雄

一、执行部的成立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定，共产党员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中委或候补中委。会后，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从此，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当年一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认为，要着重注意在国内各地发展党务，但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为便于就近指挥，除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决定派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直接指挥各省省党部。但事后，只有北京、上海、汉口三地成立了执行部，哈尔滨、四川始终未成立。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中委和后补中委胡汉民、于右任、叶楚傖、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继到沪，他们于二月二十五日举行上

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民党在上海即设有类似性质的“上海执行委员会”（俗称国民党总部），由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等负责，以原国民党机关刊物《建设》杂志社社址——环龙路四十四号（今南昌路一百八十号）为会址。执行部成立后，机关仍设在这里。以后又将其邻屋四十六号租下，供扩充之用。

上海执行部的内部组织和主要人员如下：

秘书处常务委员为胡汉民、叶楚傖、汪精卫（均为国民党中委）；文书科主任原定为邵元冲（国民党候补中委），由毛泽东代理，不久因邵始终未到任，改由毛泽东同志任主任；会计庶务科主任为林焕廷（国民党上海民智书局经理），他是胡汉民的亲戚，所以胡汉民叫他掌管钱财，五卅运动时期海外华侨捐款由他掌管。

组织部部长胡汉民，秘书由毛泽东兼，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时起争论。一九二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推荐与胡汉民有师生之谊的张廷灏（时为共产党员）继任，作为缓冲^①。该部尚有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录事陈德徵（右派，后调职）。

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宣传指导干事施存统（施复亮）、沈泽民。

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调查干事邓中夏，办事员王荷波。

青年妇女部部长叶楚傖，秘书何世桢，助理向警予。

调查部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

此外尚有其他工作人员，不一一列举。有些人后来也有调动。

^① 一九六三年访问张廷灏记录。

应强调指出的是,实际负责各部工作的都是共产党人,调查部虽无共产党员,但该部并未进行多少工作。

二、执行部的活动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分别由毛泽东、恽代英担任秘书,使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取得不少成绩。在组织工作方面,因毛泽东除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又负责国民党执行部的组织工作,所以江浙与上海等地的统一战线事业蒸蒸日上。在国民党一大前,其组织极端松懈涣散,党员大多只是挂名,国民党濒于名存实亡的危机,改组后才获得生机。

当时,共产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都决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中注入了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血液,面貌为之一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上海各地先后成立了许多区党部和区分部,革命青年纷纷加入。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热情予以指导。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等曾去松江指导建党工作。国民党江湾区党部(由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几个区分部组成)成立时,毛泽东同志曾莅临指导。^①

一九二四年三月,黄埔军校委托执行部招收一百多名学生,湖南学生到上海执行部参加复试时,曾由毛泽东同志接待。复试被录取者径赴广州进入黄埔军校。^②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共产党人在执行部中大力开展革命活动,同右派进行斗争,因而被右派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一九

① 一九八三年访问丁君羊(丁基实)记录,丁当时是同济大学学生,该区党部委员。

② 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第37页。

二四年底，毛泽东同志积劳成疾，回湖南养病和工作，这和右派的排挤也是有关系的。

执行部宣传部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宣传部出版《评论之评论》周刊，由该部指导干事、上海《民国日报》编辑沈泽民（沈雁冰之弟）主编，作为《民国日报》之“特种附刊”。主要撰稿者有：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等。该刊宗旨是，在复杂混乱的社会中，“指出一般民众应走的康庄大道”，“指出谁是谁非的真相来，使得一般民众有所适从”。“至于持论，则务期合于革命的、进步的两个原则。”（均见《发刊词》）。该刊影响虽不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但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该刊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终刊，共出四十四期。

执行部的内部刊物有《党务月刊》，共出两期，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月各出一期。由恽代英和宣传部干事刘重民主编。内容有党务报告、宣传材料等，主要是供党务工作者参考学习。

宣传工作的最大成绩是广泛地向国民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使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准备了很好的思想条件。在宣传部中，恽代英将各区党部区分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组成一个宣传委员会，参加者三十人，有刘重民、刘兆先、雷荣璞（雷经天）、贺威圣、王人路、侯绍裘、李宇超、沈资田、李世勋、蔡鸿干、顾谷宜等，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一九二五年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胜利后，革命高潮萌发。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群众革命热情更趋高涨。从四月下旬到五卅运动前，恽代英曾多次召开宣传委员会会议，布置宣传工作，鼓舞干部，提高他们的革命信念。四月二十八日，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恽代英主持并讲话。他指出，自孙中山先生逝世

后,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是许多人从事实中认识到国民党改组是正确的,对国民党来讲,此实一种新机。第二是反动派时时在中伤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第三是要扩展国民党这个各民主阶级的联盟,努力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以后恽代英又召开会议,作过政治形势报告和介绍宣传工作方法。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学生纷纷抗议帝国主义采取的高压政策。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学生上街讲演示威,由恽代英出面,召集执行部宣传委员会讨论贯彻。后来肖楚女在《革命运动史大纲》一书中回忆说:“五月二十七日(注:系二十八日之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开会,列席委员二十八人,均系各校青年学生。余以此事为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之问题,如竟如此无声而没,则将来何堪设想。讨论结果,决定翌日全体委员向学校请假,每一委员带一工人代表,赴各学校报告日人虐待之经过。二十八日(系二十九日之误)上海各校学生得此报告,均甚愤怒……二十九日深夜,二十八委员报告执行部,言各校决定于三十日停课,出发讲演。”这就是五月三十日广大学生分赴公共租界讲演示威的由来。梅龚彬也回忆说:“恽代英、李立三都召开了大会布置这次反帝运动。恽代英是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李立三也去作了报告。当时我是负责指挥学生队伍的”。^①此外,恽代英在其所著《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也作了相同的叙述。

国民党右派在执行部中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害怕用执行部名义指挥反帝运动,因此五月三十日学生到南京路等处讲演示威,未用执行部名义,用的是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恽代英同志在《中国民族

^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梅龚彬的回忆。

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回忆此事时写道：“此时，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们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了指挥机关了。”刘重民也说：在五卅运动中，“上海执行部他们不帮助而且极力声明这次运动与本党无关”。^①此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力领导五卅运动，不再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发出号召，而是依靠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进行公开活动。但是上海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仍受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指导，因而“下层同志还是努力奋斗，尽量宣传的”。^②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群众运动。上海执行部中许多人也全力投入运动，恽代英、向警予、孙良惠、俞秀松、宣中华等都曾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中负责一定的工作。

执行部的妇女部也积极开展活动，该部助理向警予同志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在妇女部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吸收各界女性国民党员三十人为委员，向警予兼任该委员会秘书，在上海历次工人罢工中，均曾发动女学生分头慰问，积极支援。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李一纯、钟复光等还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提倡男女平等，争取妇女的合法的权益，在上海妇女界中引起广泛的影响。

执行部的青年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设立青年委员会，委员共四十余人，其中有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二十余校的代

①② 刘重民：《上海党务报告》，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刘重民为共产党员，出席过国民党二大）。

表,分工负责出版、演讲、联络、平民教育运动等。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平民教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大学学生纷纷举办平民补习学校,吸收失学青年与工人上课,成为知识分子联系工人的桥梁。杨开慧、杨之华、张琴秋、李一纯等许多人,都曾在平民补习学校授课。

执行部的工农部在组织工人参加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声援上海工人罢工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援助被压迫工人,并谋发展工人方面党务起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执行部工农部特组织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有李成(李立三)、杨之华、张廷灏、张佐臣、孙良惠、郑复他等。^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执行部还成立了教育运动委员会,聘请教育界人士二十四人参加,不少人是党团员。目的是在教育界中交流革命工作的经验,加强大中学校的工作。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有恽代英、向警予、刘重民、侯绍裘、黄正厂、沈观澜(即沈志远)、柳亚子、高尔松、高尔柏、朱季恂、陈贵三、董亦湘、糜文溶、张霁帆、杨贤江、沈雁冰、韩觉民、丁晓先、林钧、姜长林等。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当时国民党主要人员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二月中旬返沪后,立即开始筹备悼念活动,发起成立“上海各团体追悼列宁大会筹备处”(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先后加入者有八十多个团体。三月九日,上海各团体追悼列宁大会在小西门中华路少年宣讲团内举行,由胡汉民主持,瞿秋白报告了列宁生平,邓中夏、邵力子、叶楚傖等发表演说,数百名出席者高呼列宁主义万岁,在哀乐声中散会。

^① 见《党务月刊》第二期刊载《工人运动消息》一文。

追悼大会曾发出致北京苏俄代表加拉罕电云：“此间今日以八十团体五百余人之大会追悼为被压迫民族力争自由之列宁先生，会场一致对列宁先生遗容致至诚之敬礼，并愿努力于列宁先生遗业，如先生之存在。”^①大会还印行了《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随上海《民国日报》附送。特刊中有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施复亮）、李春蕃（柯柏年）和董亦湘的文章。这次悼念列宁的活动实际上是向群众进行了一次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上海执行部和上海人民一起开展了悼念活动。执行部内成立了上海治丧事务所，恽代英任文牒员（秘书工作），邵力子等任接待工作，每日轮流去中山故居接待各方吊唁者。各大学、各区党部都召开了追悼会。四月十二日，规模盛大的全市追悼大会在西门体育场举行，介绍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迹。执行部印发了《敬告参与孙先生追悼大会诸君》的传单，提出要扩大国民党组织，吸收新党员。还发起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组”，学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不久，上海一些大学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批判戴季陶主义。四月十三日上海全体国民党员又召开了追悼大会。

孙中山逝世后，执行部曾派人去江、浙、皖等地进行宣传 and 联络活动，吸收了许多革命同志加入国民党。执行部组织部制定了《上海市征求党员条例》，要求自五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末的征求期内，每个区分部至少将党员增加一倍。此后，国民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一九二五年十月统计，国民党在上海共建立了九个区党部和由区党部领导的区分部一百多个，全市国民党员五千余

^①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申报》。

人,其中学生占百分之三十,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教员占百分之五,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二十,官吏、议员、军人占百分之十五,商人占百分之五。^①

三、右派活动和执行部结束

在执行部内部,始终存在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工农运动兴起,当时汪精卫、胡汉民已不在执行部,在执行部掌权的戴季陶写了臭名昭著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同时戴季陶等还盗用执行部名义,发出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在宣传工作上对阶级斗争应采取的态度的训令》,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右派提供反共的思想武器。共产党人严正予以驳斥,在执行部内部与右派的斗争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

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因涉及重大嫌疑离开广东,谢持、邹鲁、林森等则由广东来到上海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后,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这时环龙路四十四号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巢穴。他们派遣刘芦隐强行接收执行部组织部的印信文件,恽代英同志坚持斗争,拒不交出。^②西山会议派还通过决议,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开除许多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与此同时,戴季陶在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季陶办事处”,右派趋之若鹜,共产党

① 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编印的《党务月刊》第2期刊载的《上海党务的现在和最近的发展计划》。

② 据姜长林回忆(姜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

人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均被挤出。八月中旬广州国民党中央停止发给执行部津贴费,但右派有钱,没有津贴照样活动。

广大革命同志对西山会议派的行径极为不满,上海许多区党部和区分部纷纷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要求严厉制裁右派。一九二五年末,广州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停止上海执行部的职权。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时,正式决议撤消执行部。

附带提一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在上海市的党务工作由执行部直接领导,没有市党部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七月,恽代英等一度筹备建立上海特别市党部。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中央委托恽代英、张廷灏、刘重民为上海特别市党部筹备委员,翌年一月正式成立,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

上海执行部在其存在的两年中,由于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帮助,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工作显得生气勃勃,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当执行部中的右派兴风作浪,与西山会议派沆瀣一气,与革命的三大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背道而驰时,执行部最终也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来 信 照 登

编辑同志:

贵刊第四十四辑上拙文《毛泽东同志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谈及一九二六年七月毛泽东同志来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主任,此事不确切。七月,毛泽东同志来沪,应改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到沪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请予更正。

任武雄

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后

李家齐 倪复生 江 怡 杨春霖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在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简称六次劳大）。参加这次大会的既有解放区的工人代表，也有蒋管区的工人代表，是一次全国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大会。

这次大会在动员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夺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处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们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派，和其他十几位同志一起，代表上海工人，分几路秘密赴哈尔滨参加大会。会上，我们汇报了上海工人同美蒋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情况，学习了大会的文件，了解了全国的革命形势，明确了工人运动的方针任务，特别是受到了党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的亲切关怀，至今不能忘怀。

一、从上海到哈尔滨

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破坏了承印进步刊物的富通印刷所，紧接着就对上海的民主工会和进步群众团体进行疯狂迫害，到处搜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以下简称法电）的工人领袖朱俊欣、周国强和美商上海电

力公司的地下党员欧阳祖润、沈翔声等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撤离上海。原来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从事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倪复生、江怡、陆文达等十人，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秘密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华中工委所在地合德镇。一九四八年四月底，组织上通知倪复生到哈尔滨参加六次劳大，随行的有江怡、陆文达。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原来在英商上海电车公司从事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杨春霖、吴彩生（后改名方克）、杨连发等五人也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被迫撤退，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苏北解放区藕堡（离合德二十几里）。到了那里，华中工委组织部通知杨春霖去哈尔滨参加六次劳大。同行的有吴彩生、杨连发、顾松高、郑厚德四人。不久，倪、江、陆和杨春霖一行会合，一起住在华中工委招待所，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房子，大家睡地铺。临行前，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请大家吃饭送行，讲了很多勉励的话，大家很受鼓舞。

五月一日，八人从华中工委出发，先去阜宁。行前就听说阜宁那边有敌情。进城后，发现城里空气很紧张，到了镇公所，刚刚接上关系，忽然一个民兵跑来报告说，敌人已从西门进城了。他刚说完，就响起枪声。大家赶快从北门出城。一出北门，碰上交通员，他说赶快跟他走。于是，大家穿小路奔跑，一小时跑了十八里。慌乱中，杨连发、郑厚德两人跟随民兵向东门出城，失散了，大家心里都很焦急。夜里，大家在一个农村学校里过夜，第二天到了东坎。在交通站碰到了杨连发和郑厚德，大家都很高兴。据交通站的同志说，那天敌人发现有我们这批人出北门，因此他们朝正北方向追了二十里路，幸亏我们跟着交通员朝东北方向走，而且不走大路，否则就糟了。

到了东坎也并不太平。就在八个人离开东坎，走在离东坎三、

四里地的公路上，敌人飞机来了。敌机发现我们后，就俯冲下来，大家赶紧跳过公路旁一条相当阔的沟，卧倒在麦田里。敌机绕了两圈，空扫了一阵机枪，到东坎镇扔了两颗炸弹就飞走了。说也奇怪，飞机一走，要想再回到公路去的时候，怎么也跳不过那条沟。后来只好绕道走到公路，继续跟交通员朝西北方向出发。一路上大家不时听到枪炮声，看到敌人烧杀后的情景，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痛恨。走了好几天，才到了六地委（在灌云县附近）。过了几天，又从六地委出发，在离陇海铁路十几里的地方住下，待机过陇海铁路。六地委准备用武工队护送过铁路，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从陇海路北面冲过来了，于是赶快后撤，一夜走了八十里，仍然回到六地委。这一次在六地委耽了近一个月。因为是游击环境，几乎每天晚上要行军，把我们几个上海人累得走路时都打瞌睡。晚上睡在牛棚、猪棚里，背包不敢打开，衣服不敢脱下，吃的是麦糊，也没有盐。第二次到六地委不久，就碰到了从上海出发去哈尔滨参加六次劳大的另外几位同志：纱厂的汤桂芬、钱瑞华、徐明哲，法电的蒋阿龙、张华林、钱进、龚长庚等，于是，队伍又扩大了。

由于经常碰到敌情，在六地委到处转来转去，很不安全，地委书记就决定把上海来的同志安排到三面环水的一个安全岛去隐蔽。谁知道，这安全岛也不安全。当大家在岛上刚把住处打扫干净，烧好饭，敌人就来了，只好马上撤退，连一顿饭也没有吃成。算算日子，从华中工委出发已有一个多月了，还是在苏北转来转去。大会原定七月十五日开，从苏北到哈尔滨还有很多路要走，这样等下去，岂不要误了会期，完不成党交代的任务，辜负了上海工人的重托和期望？于是大家商量之后，给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写

了一封信。没有几天，六地委就采取紧急措施，派了一个副团长，带上一连战士，护送大家过陇海铁路。

十一个人先从灌云县到海州，这儿离陇海铁路比较近。过陇海铁路是在半夜里。傍晚五点钟光景，部队同志要大家轻装。临出发前，副团长向大家宣布纪律：一个跟着一个走，路上不准讲话，不准吸烟，不能出声，不能掉队。一路上大家严格遵守纪律，特别是过陇海铁路时，不时听到放冷枪的声音，虽然走得很累，但谁也没掉队。

进入山东后，因为莒南县农村流行鼠疫，大家只好睡在露天。在这里，不但没有地方住，而且没有东西吃。好容易找到用小米、黄豆、高粱、玉米等掺合起来做成的饼，但这种饼很硬，不摇着头啃就咬不下来，所以大家风趣地叫它“摇头饼”。听交通员说，这儿经常有卡车装炮弹去华东局，可以搭便车。我们赶紧去兵站打交道，终于搭上了卡车，坐在炮弹箱上，到了华东局所在地益都，这已经是六月下旬了。

华东局城工部长王尧山接待了大家。他说，全国胜利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军即将南下，需要城市干部，组织上决定汤桂芬、钱瑞华、徐明哲、蒋阿龙、龚长庚、倪复生、江怡、杨春霖等八人去哈尔滨开会，其余的人留下学习和工作。临行前，华东局负责人请大家以及准备出国的妇女代表团的成员张琴秋、丁玲等吃了一顿饭，见到王尧山、赵先、田辛同志，曾山、魏文伯等同志也在座。据说这是华东局实行精兵简政等三大政策后第一次请客。

参加六次劳大的八个人离开华东局正好是七月一日，和妇女代表一起坐卡车到莱阳，在那里脱下了军装，改为老百姓的打扮。又从莱阳到荣成附近的俚岛，夜间，在那里上了一艘木壳的机帆船，

从海上闯过封锁线。船上不点灯火,并关照大家不准点火吸烟。半夜一点钟,突然海面上发现一粒粒星星一样的亮点,大家数着数着,心情都紧张起来,知道遇上了敌人的军舰。船老大关掉了马达,大家把有军装的行李搬到甲板上,准备紧急时丢入大海。幸好没有被敌人发现,等敌舰过去后又继续行驶,次日一早到达大连。

在大连呆了两天,大连市委热情地接待我们,还发了津贴费。大家如饥似渴地到新华书店买了不少革命书籍。由于沈阳、长春都未解放,去哈尔滨的铁路不通,于是登上了一艘苏联海轮,经过黄海、日本海,到了朝鲜北部的罗津上岸。在罗津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换乘火车。那时朝鲜的火车是烧木炭的,所以走得很慢。第二天一早,到了图们江边。江面不宽,有一座桥,两头分由朝鲜和中国的士兵站岗。大家下了火车,顺利地过了桥,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又坐上火车,经过两夜,终于在七月二十五日到达了日夜想念的哈尔滨。

李家齐出发的时间比倪复生等要晚一些。大约在四月间,上海邮局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清泉通知李家齐去哈尔滨参加六次劳大,并要他带大隆机器厂的顾亮、毛纺业的惠根宝和纺织厂的工程师桂实之一一起去。当时去解放区的路暂时不通,大家等的时间太长,心情都很急,唯恐误了会期。因为从宁波也有海路可去东北,于是惠根宝和桂实之从宁波先走。哪里知道他们到了宁波刚出海不久,就遇到海盗,除了贴身的衣服外,全部衣物被劫。等他们回到上海,李、顾等已从苏北走了。

五月二十六日,李、顾两人由交通员沈智带领坐船到了青龙港。在南阳镇碰到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沈鸿春以及他即将分娩的妻子娄惠珍。走到了大中集(今大丰县),当地驻军听

说从上海来了工人代表,就来请人做报告,由顾亮去介绍了上海工人的斗争情况。从大中集到了合德,又碰到了晚几天出发的惠根宝和桂实之。这时华中工委迁到了合德,陈丕显同志接见了李家齐等人,并听了上海情况的汇报。

从合德出发,经东坎,过陇海铁路,到了山东莒南,时间已是七月十五日,离开会只有半个月了。当地驻军请示华东局派汽车将大家送到益都。到了益都,经潍坊、莱阳到俚岛,又从俚岛坐船到大连。在大连招待所等船去朝鲜时,桂实之去金州参观纺织厂。就在他去金州的当天晚上,紧急通知上船。因此,桂实之未及赶回就留在大连,晚了好几天才赶到哈尔滨。

船从大连到朝鲜的南浦,坐上火车到平壤,住了一夜。次日又坐火车到南阳,过了图们江,再坐火车到了哈尔滨,这时已是八月十日了。

二、六次劳大盛况

我们上海去参加六次劳大的共有十七人。从苏北这条线到哈尔滨的,有倪复生、江怡(女)、杨春霖、汤桂芬(女)、钱瑞华(女)、徐明哲(女)、蒋阿龙、龚长庚、李家齐、顾亮、惠根宝、桂实之。从上海到香港学习后,再到哈尔滨的有朱俊欣、欧阳祖润、韩武成、沈翔声。还有大会快结束时才经苏北赶来的孙明(邮局)。沈鸿春原来是由组织上派到东北学习企业管理的,到哈尔滨后,也列席了六次劳大。

我们一到哈尔滨就受到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情欢迎。汤桂芬等一行到达哈尔滨时,有专人来车站迎接。刘宁一、李颀伯等领导同志亲自到住所看望,并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第一批到的上海

代表。大会原定七月十五日开会，因为等你们蒋管区的代表，现在改在八月一日开会。”党和解放区人民如此重视我们蒋管区的代表，使我们深受感动。组织上通知我们除了一部分必须用真名的同志外，其余同志都临时改名，倪复生改名罗斌，杨春霖改名刘贯，钱瑞华改名张明，徐明哲改名徐月华，蒋阿龙改名王金生，龚长庚改名龚景，江怡在上海原名范梦青，这时改名为江怡。桂实之、沈翔声在赴会途中就分别改为张弩、裘荣庆，参加大会时仍用化名。这是因为代表的名字会登报，有些同志以后还可能要回上海做秘密工作，很多同志的家属又都在上海，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所以要我们改名，组织上真是考虑得十分周到。

我们上海代表到哈尔滨后都被安排住在东兴公寓，这在哈尔滨是比较好的住房。领导上要我们上海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并提议汤桂芬为上海代表团团长，我们都表示赞成。

大会会场设在兆麟电影院，这是为纪念抗日将领李兆麟而取名的。电影院为三层楼建筑，最上面的墙上挂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两旁各有一面红旗，下面是“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旁边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巨大直幅，特别醒目。门前搭有拱形彩牌，上面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等字样，给人一种庄严、隆重的感觉。

七月三十日举行大会筹备委员和各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提案，将原来决定的全国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改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产生的全国组织亦应恢复以前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称。这个提案在次日召开的大会预备会议上，以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刘宁一、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上海代表团团长汤桂芬、天津代表团团长周青四人联合提出的

形式获得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欢声四起，掌声与口号声经久不息，大家高呼：“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并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预备会议还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代表资格审查条例、大会议事规则、会场规则等。最后，全体代表一致选出了由三十四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其中有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李颉伯、张金保等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老前辈，有中国劳动协会的领导人朱学范，有各解放区工会的负责人、劳动模范。上海的汤桂芬和华南、武汉、天津等地的蒋管区工人代表分别代表各地的民主工会参加了主席团。

八月一日上午，上海代表和各地代表共五百十八人，满怀革命激情来到了会场。十时，大会开始，热烈通过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接着，由李立三致开幕词，回顾了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期间中国工人运动的战斗历程，其中多次提到了上海工人的斗争。他说：“特别是今年二月间上海申新纱厂工人的罢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坦克、机枪的屠杀下，死伤一百多人之多，表现了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英勇传统至今仍然保持着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当他讲到“今天上海、天津、武汉、唐山、广州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能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来出席这次大会，说明了中国工人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抗拒的”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立三同志讲完后，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世界工联等组织的贺电。东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罗荣桓、林枫、冯仲云、朱其文及解放军战士、农民、妇女、青年等代表纷纷登台致辞祝贺。哈尔滨的五百多名工友在锣鼓声中向大会献旗。最后，大会还通过了给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解放军的致敬电。就这样，我们兴奋地度过了大会的第一天。

八月二日，东北局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三日、四日，陈云同志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以后，刘宁一作了《国际职工运动工作》的报告，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主席团要我们上海代表也在大会上讲话。我们起草了《上海职工运动》的稿子，推欧阳祖润在大会上发言。欧阳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过话，显得很紧张，照着稿子念。这时，立三同志在台上对他说，你不要念稿子，你们在上海怎么干的，就怎么讲。结果欧阳在发言中汇报了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在国民党的残酷剥削下的悲惨生活，介绍了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事例，赢得了与会代表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当报告最后讲“上海职工在重重压迫下面，始终没有消极失望，相反，他们的队伍是更强大、更有力量了。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并且深信先烈的血没有白流，他们都知道人民解放军前去解放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并高呼：“打到上海去，活捉蒋介石！”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对上海工人协会及国民党统治区其他民主工会，在抗战时期及最近两年来团结一切职工并领导他们为民族解放，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艰苦工作表示满意，希望他们根据本次劳动大会所决定的方针，继续努力。令人深深感动的是，解放区的职工响应大会号召，义务劳动一天，将这一天的工资作为援助国民党统治区职工斗争的基金，到大会结束时已达几千万元。据当时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张祺同志告诉我们，那时他收到组织上转给他的解放区职工的捐款有十七两黄金，他兑换成银元后，分送给被捕和撤退的同志的家属，并附有上海工人协会的信，说明这是解放区工人义务劳动得来的一点心意，这对上海工人及其家属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大会期间，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小组讨论，特别是讨论陈云同志的报告。在讨论中，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关于女工的产假问题。陈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除此之外，他还对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女工、童工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当我们看到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中规定，在解放区女工产前产后有四十五天假期，工资照给时，心里十分激动。因为在解放前的上海，有的工厂企业的老板不雇用已婚女工，即使雇用已婚女工，一旦发觉她们怀孕，就要开除。所以有很多女工怀孕后，就用布带绑紧肚皮，以致经常发生死胎。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体会到只有人民政府才真正关心工人。工人阶级要翻身，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翻反动统治才能实现。

另一件事是陈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有四条：（一）聚集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二）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对待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应有不同的态度，要联合民族资本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三）派遣熟练的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参加新式工商业建设，同时保护一切公私营企业及其厂房、机器、物资，使之不被破坏。（四）注意保护自己的团体和领袖，加强职工内部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听了这段话，我们一方面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为上海即将解放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深感上海工人阶级责任的重大。我们想到，上海是反革命统治的中心，他们在灭亡之前必

然会作垂死挣扎；但是我们相信，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一定会响应六次劳大的号召，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上海代表团经过讨论后，推派倪复生同志代表五十万有组织的上海工人在大会上发言，保证“上海解放之时，工厂仓库都能完整转回人民手中，有信心把上海变成最繁荣的人民城市”。发言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后来的事实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毁灭上海的罪恶计划，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上海，迎了解放，水、电、电车、电话都没有断，大多数工厂一天也没有停止生产。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的领导成员。在正式选举前，李立三同志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提议，希望这次选举能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全总的正式执委为五十九人，候补执委为二十二人，共八十一人，其中留出正式执委六人、候补执委二人的名额给六次劳大到七次劳大期间新解放城市的工人推派代表参加全总领导。另外，由于参加这次大会的各地区代表所代表的工人会员数量不同，选举时按二千会员为一权。东北、两广的代表团每票是一权，西北代表团每票五权，华北代表团每票八权，华东代表团每票十权，中国劳动协会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每票十七权，总计一千四百四十权。就是说，我们上海的代表投一票就等于十七票。这个办法获得大会一致通过。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陈云、蔡畅、陈郁、李立三、刘宁一以及中国劳动协会的朱学范、易礼容等五十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其中有上海的刘长胜、马纯古、张祺、汤桂芬、朱俊欣、顾亮六人。当选为候补执委的有二十人，其中有上海的欧阳祖润、李家齐、韩武成三人。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次劳大举行闭幕式，刘宁一同志宣读当选的正式执委和候补执委名单，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恢复。当选的执委登上主席台，由李立三代表宣誓：“一定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团结全国职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和各民主阶层，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为工人阶级与人民解放事业之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在闭幕式上，东北的党政领导、教育界、荣誉军人、劳动模范及各地的代表发了言。汤桂芬也在会上发了言。朱学范致闭幕词，他总结大会的成果说：“这次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前进的大会。这次大会不独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在意志上、在思想上、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是统一的。”他在讲到解放区职工义务劳动一天，捐献支援蒋管区工人弟兄时说，“这充分表示了我们的阶级友爱与阶级同情，这告诉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同志们，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他们有统一的团结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二百八十三万会员作为后盾，他们的解放斗争一定会更快得到胜利的。”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六次劳大完成了它的使命，胜利闭幕。

回顾这二十二天的大会生活，我们上海代表的心情十分激动。我们深深感受到党中央对工人阶级的亲切关怀，深深感受到解放区人民对我们蒋管区工人的阶级友情。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仔细回想来到解放区后的一切，久久不能入睡。

三、参观学习，参加接管城市工作

六次劳大结束后，除东北以外，其他地区的代表都被留下来，由全总组织参观学习。先在哈尔滨市内参观铁路机车车辆厂、肥皂厂等单位，同时传达大会精神。后来又组织我们去外地参观，到过鹤岗煤矿、吉林造纸厂、佳木斯发电厂、小丰满发电厂、双城的农

场、三棵树的地主庄园、牡丹江纺织厂、鸡西煤矿、东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在东影，袁牧之、陈波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上海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东北的工人对我们真是太热情了，我们坐的火车，每经过一站，车站上都有群众队伍打着横幅欢迎我们，即使火车在车站上只停几分钟，也是如此。我们每到一处，当地的群众就要我们讲上海工人的斗争情况。尽管我们中间会讲普通话的不多，我们也南腔北调地认真地讲，大家也认真地听。有一次向朝鲜族工人作报告，还专门有人作翻译。在鹤岗煤矿向矿工们介绍上海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参加的有矿工以及当地的驻军和职工家属，共有一万人左右。当听到上海工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如何在死亡线上挣扎，听到许多失业工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冻死在街头，甚至有人自己爬进慈善机关施舍的薄皮棺材，冻死在里面的悲惨情景时，台下的工人弟兄们就喊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努力生产，支援蒋管区工人兄弟！”等口号。当听到上海工人怎样不怕敌人的刺刀、坦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搏斗时，台下又喊起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虽说是九月，但在东北天气已很凉，一万多人在夜间露天开会听我们介绍上海职工的生活和斗争情况这件事本身，对我们就是个很大的教育。东北工人兄弟对蒋管区工人弟兄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我们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

十月下旬，我们参观结束，回到哈尔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使我们开了眼界，看到了东北的大工业，看到了在上海看不到的煤矿。我们虽然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但到了东北，同解放区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一比较，就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差距很大，更没有在自己的政权下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全总根据大家

的迫切心情,把我们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并拟订了学习计划。

十月底的一天,学习还没有开始,突然通知上海一部分代表去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会上陈云同志宣布沈阳即将解放,部队进城后,要有干部去接管工厂企业,要我们立即回去打好铺盖,晚上出发去接管沈阳。他并风趣地说,你们这次去,起码要得六十分,考个及格分数。接着,陶铸同志作了具体安排。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北的一部分干部,他们提出要回去交代一下工作,陈云同志说,情况紧急,不用回去交代了,当晚就要出发。我们听了以后,一则高兴,一则发愁。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前几天,有的同志还在说三年解放全国,没想到今天沈阳马上就要解放了。发愁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接管工作,到了沈阳,怎么开展工作呢?可是,情况紧急,也不容我们多考虑了,马上要准备出发。

当时全总决定留下一部分上海代表:汤桂芬准备随蔡畅同志出国去参加国际妇联大会;沈翔声到全总当秘书处秘书科长,后来又当了李立三同志的秘书;倪复生当全总组织部秘书;江怡当全总女工部秘书;朱俊欣和欧阳祖润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城工部汇报工作;其余的代表都在当晚乘火车出发。

火车只通到四平,在四平继续坐马车出发,到铁岭再换乘火车。到达沈阳火车站时,不断听到枪声。深夜,我们进了城,以全总工作组的名义,分别派到各个工厂。李家齐到东北水泥公司,杨春霖、龚长庚参加接管沈阳兵工厂,徐明哲到化工厂,蒋阿龙参加接管电车公司,顾亮参加接管坦克车厂,惠根宝到联勤总部的农产品加工厂和沈阳机器厂。那时,我们解放的大城市还不多,经验也不足,据说抗战胜利后,我们部队接管东北一些工厂矿山时,因为把

重要部分的技术图纸烧掉了，散失了，给恢复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我们一进沈阳，有些工厂来不及派人接管，领导上就让解放军把守大门，凡有字的纸一张也不能动。那时工厂几乎全部停工，沈阳工人的生活很苦，我们就把工人召集起来，发高粱米。工人们看到共产党这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就都陆续回厂了。我们又把工厂的管理人员找来，讲党的政策，宣布接管以后保持原职原薪，这样才把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情绪稳定下来，逐步恢复了生产。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真快，过了不久，大军准备进关，解放平津。上级通知我们又要出发了，我们就打起背包离开了沈阳。

我们随军进关，在唐山过元旦，学习了毛主席起草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在献词中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坚定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这对我们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在唐山，领导上决定将我们兵分两路：李家齐、倪复生、龚长庚准备去北平，到长辛店待命；孙明、江怡、杨春霖、蒋阿龙、韩武成、顾亮、钱瑞华、徐明哲、桂实之等准备去天津，到杨柳青待命。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拒绝我军和平解放的提议后，我军发起总攻，仅仅用了二十九个小时，就活捉了陈长捷，解放了当时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接管组同志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后，江怡参加接管电讯系统，包括邮政局、电话局、电讯器材工厂等单位，杨春霖和蒋阿龙参加接管电车公司，惠根宝参加接管纺织机械厂，徐明哲参加接管国棉四厂，顾亮参加接管炼钢厂，桂实之参加接管纺织系统的工厂。天津的情况同沈阳有所不同，地下党力量比较强。天津市委在天津解放后立即将地下党的力量和我们去接管的同志结合起来，并把天津地下党

编的《天津工厂手册》发给我们，因此开展工作比较顺利，生产恢复得比较快，群众很高兴。当然，由于城市新解放，市内还有反革命残余分子造谣破坏，煽动一些人磨洋工。电车公司有的人动不动就借口车子有毛病，不开车。可是，蒋阿龙和杨春霖原来都是上海法电、英电的工人，他们到那里去发动工人，同工人一起干活，从此把那些人的气焰压下去了。在天津化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接管单位的工会筹备会都建立了起来。

天津解放后两个星期，北平和平解放。李家齐参加接管邮局。并参加了接待国民党通邮代表团的工作。倪复生参加接管电话局，龚长庚参加接管自来水厂。

三月下旬的一天，在全总工作的沈翔声通知在北平、天津的出席过六次劳大的上海代表赶到全总开会。全总组织部长许之桢在会上宣布，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马上出发，去迎接毛主席。顿时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了。沈翔声将事前领来的印有“欢迎”两个金字的红色缎带发给大家。汽车一到西苑机场，欢迎的队伍已经都整整齐齐地排好。全总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排。一会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坐了吉普车来了。毛主席身穿灰色棉布军大衣，脚着长统毡靴，身体非常健康。欢迎队伍中不断响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主席下了车，满面笑容，和我们站在第一排的同志一一握手。后来，又登上吉普车检阅了部队，并同前来欢迎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见了面，照了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三月间，欧阳祖润出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和苏联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同月，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蒋管区的代表团团长是许广平，江怡担任副团长，参加六次劳大的上海的女同志徐明哲也参加了大会。江怡在五月份又在北平参加了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随刘宁一同志出国参加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接着又去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才回到解放了的上海。

三月底或四月初，全总把在天津参加接管工作的出席过六次劳大的上海代表调回北平，李立三同志特地请刘晓同志向大家传达了刚刚结束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我们听了以后，十分激动，大家的心都向南飞，想早日回到上海。朱俊欣在解放区电台向上海广播，号召上海工人以保护工厂的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以他的名义写信给法电工人，要他们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破坏，迎接解放。这些宣传活动在上海工人中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江怡在天津接管电话局时，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她在上海电话公司的叔叔，告诉他，天津已经解放了，不久上海也会解放的。结果这个消息在群众中传开了，使大家都振奋起来。我们化了半个月的时间在全总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急切地等待南下。

四月二十一日，广播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晚上，领导就决定我们马上出发。临行前，李立三同志对我们说了不少勉励的话。他说，你们这次到解放区来，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回去以后，不要骄傲自满，那样是要犯错误的。立三同志对我们真是语重心长。

除江怡外，我们三人和其他几位上海同志坐火车离开北平，先到济南，因蚌埠大桥被破坏，换乘汽车，在二十三日傍晚到达浦口，

半夜过江，到南京找不到联系的单位，就进了国民党的总统府。后来又有人通知我们转移到中央社会部，最后住到中央饭店。过了几天，我们又跟随陈毅、刘晓等同志出发到丹阳。在丹阳见到了顾开极、徐周良等许多老战友，大家欢聚在一起，十分高兴。在丹阳的二十几天里，我们在华东局陈毅、刘晓等同志领导下组织学习，作好进城接管的各种准备。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坐上卡车，途经无锡、常熟等地，一路上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胜利地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上海，和全市人民一起，热烈欢庆上海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 苏南与苏中的反清乡斗争

李 广

(一)

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一方面对国民党加紧政治诱降，一方面力图巩固占领区，控制我敌后根据地，加紧掠夺人力与物力。大江南北广大地区，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更是敌我必争之地。日军占领宁沪、徐州及武汉后，在宁沪两城市及宁沪沿线，驻扎重兵；汪逆精卫投敌后，也配合日军，对大江南北严密控制，妄图消灭我抗日根据地，因此孤注一掷，决定以最疯狂的手段对我们实施全面“清乡”。一九四一年五月，汪伪在南京设立“清乡委员会”，汪逆自任委员长，且亲去东京乞得五亿日元作为清乡经费，设办事处于苏州。经过周密的准备，即于同年七月正式宣布对我苏南地区实行清乡。

敌伪所谓的“清乡”，不同于一般的“扫荡”和“清剿”，是妄图以军事、政治、经济和特务等各种手段对我实行联合进攻，其目的是妄想消灭、驱逐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由点线的控制达到面的控制。所以他们在采用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肆意杀人放火的同时，还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和平反共建国”、“建立和

平模范区”等口号。

在清乡之前，敌伪专门训练了特务、警官、行政等各种清乡人员约二千余人，并在苏南一些城市中进行清乡演习。随后即调集日军一个师团，伪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我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地区的外围增设了大量据点，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了大面积的包围圈。

是年七月一日，敌伪一万五千余人，按预定计划对我苏、常、太地区实施清乡。首先采用闪电战术，从四面八方向该区反复进行篦梳式的“清剿”与搜索，以突然包围、跟踪追迹等手段，寻歼我部队及党政机关。接着，大量增设据点，并在据点与据点之间，用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构成小块封锁区，进行分区“搜剿”，同时派出大量清乡人员，编组保甲，建立伪化统治。

同年十月，敌伪又对我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开始清乡。由于我澄、锡、虞地区党政军民及时总结了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采用灵活的斗争方法，使敌伪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四三年春，敌伪除继续在苏南清乡，并在浙东部分地区进行试验外，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清乡。他们首先选择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的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计划于四月一日开始，分两步进行，以六个月时间完成。第一步为“军事清乡”，为期两个月，第二步为“政治清乡”，为期四个月。当时日军从苏南抽调了“有清乡经验”的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作为机动兵力，强化和整编了苏中的伪军、伪组织，选调了坚决反共的伪军担任清乡区的封锁和据点守备任务。另从苏南抽调大批警察、特务和伪行政人员随军担任清乡任务，在南通设立清乡主任公署、特工站、政治工作团等一系列庞

大的清乡机构，并搜罗了大批流氓、地主、劣绅和国民党特务，组织清乡队作为爪牙。此外，还搜集了大量的竹子等作为封锁器材。

四月一日起，敌伪按照预定计划，对苏中四分区开始军事清乡，通、如、海、启境内各据点的敌伪倾巢出动，采取篦梳、拉网式的战术，分十几路、几十路向我各中心地区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企图寻歼我武装力量和党政机关。同时增筑大量据点，不分日夜地四出“搜剿”，对我中心区的村镇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包围搜查，时来时去，飘忽不定。伪清乡人员随敌跟进，挨户清查，搜捕我党员、干部及抗日民众，并设立伪区乡行政机构。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向我中心区“清剿”的同时，还在清乡区边缘沿河川和公路，赶筑了绵亘二百余公里的封锁篱笆，对清乡区构成大包围圈。在封锁线上配置重兵把守，碉堡、瞭望哨、检问所等彼此呼应，以此来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

敌伪在“军事清乡”之后，随即部署“政治清乡”，妄图“六月强化启东，七月强化海门，八月强化南通，九月强化如皋”。所谓“政治清乡”主要是编查保甲，加强伪化统治。其做法是：编造户口册，贴门牌，订立保甲规约，实行连保连坐；推行自首政策，发动密告检举；收买叛徒、流氓，建立特务情报网；举办壮丁训练，编组“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登记田亩，摊派苛捐什税。他们企图通过编查保甲，来清查我党员、干部、民兵及群众团体的成员，摧毁我党政军民一切组织，掠夺人力物力。

敌伪按计划在苏中进行的六个月清乡，遭到我严重打击，于是宣布延期三个月，企图以更为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摧毁我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日伪在对苏中进行清乡的同时，又分别于三月

十五日和四月一日宣布对我苏南的茅山、太滬、长滬、丹(丹阳)、金(金坛)、武(武进)地区实行“清乡”，采用的部署与手法基本上同在苏中的一样。他们还从镇江城起，沿镇句公路经白兔、宝堰、西旸、直溪桥、白塔、里庄桥、夏溪、茶食、五洞桥、杨桥、漕桥、分水墩，然后沿太湖北岸直达苏州的胥江、木渎、横泾，建筑了一条全长六百五十余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妄图对我苏南实行严密的封锁与大包围。然而时隔不久，敌伪这次清乡也终于宣告失败。

(二)

清乡与反清乡，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敌伪对清乡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准备相当充分，采用的手段也十分毒辣。在敌伪清乡之初，我们对他们的意图和部署了解不够，对付这种所谓清乡还缺乏经验，所以苏、常、太地区的反清乡，一度受到一些损失，我军主力不得不撤出这个地区。但是敌伪对我苏南其他地区和苏中地区实施清乡时，我军民已总结了反清乡的经验，掌握了敌人清乡的特点，因而针锋相对地作了周密准备，使敌伪的清乡阴谋一一归于失败。

从客观方面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本质上是非正义的，他们实行清乡作垂死挣扎，所到之处，灭绝人性地对我国人民实行“三光”政策，必然要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反动派、汪伪及各傀儡组织之间，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虽然一致，但是相互之间矛盾重重，行动不可能统一。如汪逆之早死，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之被毒害，都发生在清乡期间，这是他们内部斗争的结果，也是清乡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可是，敌伪清乡之所以失败，我们反清乡之所以能取得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苏南和苏中军民团结一致，顽强作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一九四一年七月，当敌伪对苏、常、太地区开始清乡时，由于情况突变，我们缺乏足够的准备和应变的经验，一度把敌伪清乡当作一般的“扫荡”、“清剿”，既未采取适当的对策，又未充分发动群众，作好反清乡的准备，因此部分武装和党政机关曾遭受一些损失。我们原想从外线打击敌人，调动清乡区内的日伪兵力，故将新四军十八旅主力转移到澄、锡、虞地区进行外线作战，由五十二团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苏州附近的黄埭，横扫太湖地区；又调五十四团连克无锡近郊的严埭、西高山等几个据点；五十一团则挺进到江阴城西活动；十六旅也在茅山江句地区积极行动，连克延陵、九里、郭庄庙等二十几个据点，给敌以很大威胁，但都未能调动敌伪在清乡区的兵力，反之，敌伪继续集中力量在苏、常、太地区清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力部队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不得不跳出清乡圈，转移到江北的苏中，致使苏、常、太地区绝大部份沦为敌占区。后来我们摸清了敌伪的意图和情况，总结了初期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因此在澄、锡、虞、苏中四分区及苏南茅山、太滬的反清乡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对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反清乡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曾作了全面分析。他说：“在敌伪清乡斗争中所受的部分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开始一、二次的清乡中是很难免的。当敌伪集中优势兵力并在便利于敌之地形条件下，再加上流氓特工等集中‘清剿’一个小地区，在我军现有条件下，是很难以强力打破其计划的。在这种时候，较好的对策是主力预先转移，跳出其‘清剿圈’，并以少数

武装人员利用很好的群众关系与统战关系，分散坚持原地斗争，打击叛徒特工，等待敌‘清剿’过后再恢复原来地区的工作。因为敌伪清乡的弱点，就是只能集中在一、二个小地区进行，而不能长期在一个地区‘清剿’。”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尔后苏中、苏南的反清乡斗争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也认为少奇同志的分析是科学的、正确的。

事实也确是如此。早在一九四二年冬，苏中区党委和苏南军区就认真研究了上级的有关指示和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反清乡的部署，确定在清乡区以外的军民应以积极行动配合清乡区内军民的斗争，而清乡区内的党组织和各级政权、武装也应以坚定的信心团结人民大多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断打击和削弱敌伪清乡部队，大力镇压清乡人员，粉碎清乡计划。

一九四三年七月，当敌伪对我四分区疯狂进行清乡时，我主力一部即进到南通地区，在封锁线上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袭击据点，破坏封锁篱笆。八月，敌伪改取所谓“机动清乡”，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伪军、伪组织人员普遍恐慌动摇。八月十五日起，我们对整个清乡区的敌伪军政人员发动了一次全面政治攻势；接着又在九月六日至十八日，以主力、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发动了全面性军事攻势。主力多路袭击敌伪据点和封锁线；短枪队、游击小组深入据点缴枪，捉俘虏；民兵在据点附近举行武装示威。九月底，迫使南通境内十几个据点的伪军全部反正。我通、如、海、启地区的党政军民，在九个月英勇的反清乡斗争中，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毙伤大量敌伪军和清乡人员。在我这样由外线配合作战，连续开展军政攻势下，敌伪的清乡不得不流于破产。

在我苏中地区开展反清乡斗争的同时，我苏南新四军十六旅活动的地区，也同时胜利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和四月一日，敌伪在苏中进行清乡的同时，分别宣布对我苏南的茅山、太滬、长滬、金、丹、武地区也实施清乡。仅在茅山清乡区内，日伪据点即由五十余个增加到一百零五个，几乎每隔几里就设有一个据点。用于封锁的竹篱笆一般高达二、三米，插入土内二、三尺，两边培以厚土，竹篱笆外还挖一道水沟。在封锁线外，敌人也驻有重兵，经常四出扫荡，进行搜索。在封锁线内则组织快速部队，配合特工武装，不分晴雨昼夜轮番出动，对我搜索，威胁群众，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加紧编组保甲、编造户册，建立各种伪组织，设立情报网，对群众进行政治欺骗，还以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开征苛捐杂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早在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苏皖区党委即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大家接受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和一切行动上做好反清乡的准备。各级党政军领导部门都认真研究上级的有关指示，详细弄清楚敌人的部署和手段，同时针对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好反清乡准备。如在敌伪清乡准备阶段，我们各级党政军一面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党员会议、武装工作会议和有关群众工作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坚定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信念。同时作好周密部署，在根据地内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动员，鼓舞群众的斗志，揭露敌伪的阴谋，指出其必然失败的趋势。另一方面，对敌伪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深入到敌占区去警告一切敌伪组织和特工汉奸。在组织上，则迅速精简各级党政机关，合并一些区县，调整领导干部，挑选坚强的人员组成精干的武工队，配以精良

武器，准备随同坚持原地的领导干部留在内线斗争。为了不让敌伪掠夺物资，我们坚壁清野，挖地窖和地道，建立隐蔽点，贮藏公粮物资，利用基本群众和外围关系建立几道秘密交通线，以便于开展斗争。还在敌占区用种种隐蔽斗争手段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情，刺探情报，对我进行掩护。

当日伪清乡正式开始后，我主力部队按预定部署及时跳到外线，选择战机，寻找敌伪的弱点给以狠狠打击，以配合内线斗争，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力求歼灭敌人。如一九四三年五月二日，敌伪正在对茅山地区加紧清乡，我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以果断行动，一举奔袭西旻，摧毁了敌伪据点。接着于五月八日，四十七团又在清乡区外沿迅速打下白兔至宝坨之间的包巷据点，全歼守敌。六月初，连续发动攻势，一举攻克清乡区内十几个据点。特别是七月二十一日深入到清乡区内，攻入延陵据点，全歼敌人，俘获伪清乡政工团员以下一百余人，使敌伪受到沉重打击。七月三十一日又乘胜打下了句容的丁庄据点。经过这样反复多次的军事行动，我主力部队在清乡区内外，进进出出，狠狠打击敌人，使敌伪军和清乡特工人员，惊魂不定，大大鼓舞了清乡区内外军民反清乡斗争的信心。

在清乡区内，我坚持原地斗争的干部与武装，日藏夜行，到处穿插，严厉镇压一切特工、汉奸和清乡人员，以内线斗争配合外线斗争，以较隐蔽的斗争配合较为暴露的打击行动。为了对付敌人的封锁分割，配合外线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他们大力发动群众，开展了破坏竹篱笆的反封锁斗争，动员群众自毁竹园，隐藏毛竹，使敌伪找不到材料。当群众被迫为敌伪构筑篱笆时，以集体逃跑和磨洋工等办法拖延时间。当篱笆将筑成时，以武装力量为掩护，

在封锁线上开展声势浩大的破坏活动。仅据茅山地区统计，在一九四三年三、四两个月内，就发动群众破坏竹篱笆五十一次，火烧竹篱笆一百二十余里，一举烧掉毛竹二万根。在大火焚烧时，绵延数十里，烟尘滚滚，火光冲天，黑夜里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长长的火龙。敌伪惊慌万状，不敢外出，只是在据点里乱放枪炮，哇哇怪叫。

经过这样激烈的斗争，到一九四三年九、十月间，彻底粉碎了敌伪对茅山和太滬等地区的清乡，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苏南和苏中开展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敌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顽强斗争的结果，也是苏南、苏中和其他兄弟地区互相依靠，密切配合，协同斗争的结果。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自觉遵守的铁的纪律，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在任何困难情况下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无论面对野蛮强暴、奸诈狡猾的日伪，或是一贯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都能克敌致胜，百战不殆。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苏南与苏中地区反清乡的胜利，是整个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希望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场伟大斗争的老同志都来回忆、总结。当年的斗争距今已有四十年，笔者记忆疏漏，资料不足，上述回忆如有讹误和欠缺之处，希望得到老同志的补充、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策动汪伪第四军起义始末

顾 草 萍

一、表妹搭桥，打入伪军

一九四二年我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敌伪军工作站（简称敌工站）磁武分站副站长。这年夏末的一天，我二姨父从河南来到我家，说他有一位侄女婿在汪伪和平救国军当师长，驻在河南商丘以北的陈楼一带，但说不清楚部队的来龙去脉。我把上述情况向敌工站作了汇报，领导要我进一步了解详情。

这年深秋，我奉命秘密去寻找这支队伍。在商丘下火车后，向北到达属山东曹县的陈楼，在该师师部找到了表妹程华芳，在那里住了十多天，了解到这支队伍的基本情况：该部的番号是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四十师，部队前身是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师第二旅，归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节制。一九四二年六月孙良诚率部投降日伪后，汪伪政府授孙部以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辖第四、第五两个军，赵云祥是伪四军军长，表妹的丈夫戴心宽是第四十师师长，系赵云祥部属。我返回太行根据地后，将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一九四三年三月，太行军区敌工部决定利用我和戴心宽的亲戚关系，派我往伪四十师做地下工作。行前军区副政委黄镇同志

找我谈话。他说：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你这次被派出，主要任务是争取该部伪军反正，行政、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军区敌工部。进去站稳脚根后，要力争掌握兵权，并安插一些干部和知识青年进去，培养骨干力量，以利长期隐蔽，相机行动；对个别先进分子可以吸收入党。他还说，我军派人打入伪军工作，与国民党和日伪的特务工作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去争取伪军走向抗日，走向光明，走向革命，他们是破坏抗日，破坏革命事业的，这一点你在思想上要明确。

接受任务后，我即去伪四十师寻求工作。此时该师已移驻开封东北的东明县东明集。我赶到东明集，向戴心宽说明前来谋事，他安排我住下，要我等待。一个多月后，即一九四三年五月间，由戴保荐，并由伪四军军部考试合格，我被委任为伪四十师参谋处上尉参谋，顺利地打入了伪军。

二、广交朋友，发展党员

在伪军谋得职务以后，为了站稳脚根，获取信任，必须熟悉参谋业务。那时伪军参谋处业务广泛，包括作战、训练、情报、通讯、译电等方面。我虽有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但对参谋业务特别是对旧军队的参谋工作完全生疏，于是下决心学习，经常主动向伪四十师参谋长杨镜清、参谋处处长宋秉礼、上尉参谋王连捷等请教。对分配给我的工作，总努力做好，给他们以良好的印象。

与此同时，我有意识地广交朋友，对所接触的人都以礼相待，从逐步建立友谊的人员中选择争取对象。不久，和参谋处的王连捷、军需处的孟则忠、副官处的张澍铭交上朋友，其中与张副官的交情日渐加深。张原名郭维治，在伪满奉天工业大学毕业后，由于

与我党在东北搞情报工作的一位同志有联系，和几位进步同学常在一起，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化名逃入关内，经人介绍，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到伪四军军部任中尉日语翻译官，后来到伪四十师任副官。我同他谈得来，也谈得深，后来成为我在伪军中发展的第一名地方工作成员。

我站稳脚跟后，于一九四三年八月间，借口回家探亲，返回太行军区敌工部汇报了一次工作。经部里批准，返伪军后个别吸收张澍铭为党员，同时决定让我带几位同志进去一同工作。如太行军区五分区敌工站磁武分站的梁镇宇同志，曾打入磁县峰峰煤矿任伪自卫团团长，在日本人怀疑该团与八路军有联系遭解散后，即到伪四十师任中尉监印官；高庆福同志原在磁县、定县伪警察局任所长、督察长等职，也经我推荐进伪四十师，任中尉谍报队长，后来升任上尉情报参谋兼谍报队队长。接着知识青年段景林、武鼎三和做敌工工作的刘维新也相继进入伪四十师，任文书、书记官等职。到一九四四年夏，我们地下工作已经有七人，内有三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这些同志成为在伪四十师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每个同志都广泛地交了不少朋友。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我第二次返回太行汇报工作，敌工部指示我要认真贯彻短小精干、长期隐蔽、力争掌握兵权的方针，不再发展地下组织，而要多交朋友。

三、讲清形势，策动起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伪二方面军奉命由开封一带调防苏北，孙良诚兼任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我考虑到苏北离太行军区太远，请示汇报不便，即通过来伪四十师看望我的敌工站工作同志张成

和向太行军区汇报伪二方面军将要移防的情况，并请组织把我的领导关系转到苏北，约定联络暗号为“马安兰”。

伪四十师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到达苏北盐城上冈镇，这里是日伪军的一个小据点，驻有一小队日军，设有伪政权机构，师部带一五四团驻此，另有一五五团驻合德（即射阳），一五六团驻湖垛（即建阳）。三月间，上冈有一位商人到师部找我，说他在扬州做买卖时，在旅馆里碰到一位名叫“马安兰”的人，说是我的朋友，叫他回上冈以后到师部来告诉我一声，他以后来看望我。从此，我的领导关系转到了苏北地区。苏北区党委城工部派左如桂同志任政治交通员，经常来敌伪据点同我联系。为了保证左如桂同志的安全，我们给他一张“特别谍报证”做掩护。左如桂同志不但及时带来了上级的指示，而且以收集新四军情报资料为名，经常带来根据地出版的书籍、报纸。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上叫我们立即进行策动伪军起义工作。几经研究，确定重点做师长戴心宽的工作，因为只有把戴的工作做好了，组织全师起义才有可能。同时，我们在朋友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向他们分析战争形势和中国前途，议论个人和家庭出路，促使他们思想转变，发展了一批地下力量，其中有少校参谋王连捷、上尉军需孟则忠、卫生处长朱枫，还有电台台长、营长、副团长各一人（姓名均记不得了），这些同志又各有知心朋友，并在军官中有广泛的联系，成为宣传和组织起义的骨干力量。

我们又对戴心宽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是西北军行伍出身，为人正直，既有遭国民党排斥异己的体验，又有在冀中、冀南敌后与八路军联系的经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同时考虑到

我虽和他有亲戚关系，但我当时还很年轻，职位也不高，说话作用不一定大。研究结果，认为师部参议隋昆亭年纪较大，与戴有较深的交情，同我们的关系也较好，是我们做戴的工作的桥梁。于是我有计划地同隋多接触，经常和他议论日本侵略者必败已成定局，伪四军驻地周围新四军已形成包围之势，部队应谋出路等等。议来议去，认为向新四军谋出路不但可行，而且是势所必然。当时我有意向隋提出，新四军里要有个朋友就更好办了。隋说，他有个熟人在苏北新四军某部当团长。其实他并没有这样一位熟人，只是他谋求出路心切，借此鼓我的气。我便将计就计地说：这样就好了，只是必须说服戴师长，并敦促他去找戴师长深谈。他果然找戴谈过多次，每次均把谈话情况告诉我。有一次隋对我说，他向戴提及情况危急，需图良策时，戴说存粮充足，打几个月没有问题，隋问子弹也够打几个月吗？戴默然不语。我们以此断定戴已在考虑出路。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驻防待命，不让我军解除敌人武装。我军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向日伪军开展反击作战。一九四五年十月底，新四军苏中、苏北两军区部队，在苏中军区管文蔚司令员、吉洛政委统一指挥下，逼近盐城地区，把盐城、伍佑分割包围起来，重点围攻驻守伍佑的伪三十九师（欠一个团）。战斗中伪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和一五三团团团长王法祥被俘。戴心宽在获悉潘子明部被歼的次日，在他的办公室单独召见了。我一进门他就说：“你在新四军里有朋友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他就接着说：“三十九师已被新四军消灭，我们不能同归于尽呀！”我随即说：“隋参议说他有位朋友在新四军当团长。”戴接着说：“你去和隋参议商量一下，出去联系联

系。”我即去隋参议家，对他说：“师长叫我们出城联系，你经验多，去一趟吧！”隋说：“老弟年轻，还是你辛苦一趟吧！”这正合我的心意，我就换上便衣，叫谍报队长高庆福同志随我一起先到北门外二、三百米处伪一五四团一个连的阵地，嘱咐他在那里等我，以防我返回时发生意外。

四、与我军谈判，达成起义协议

我出城后，向东北方向走了三、四华里，进到围城部队跟前，哨兵把我带到连部，我对连指导员说：“我是从城里派出来谈判的，请快派人把我送到前线最高指挥部去。”指导员和在场的同志都很高兴，派人送我到盐阜军区司令部，见到谢祥军司令员，我向他简要汇报了城防情况和伪军内部动向。饭后，谢司令员带我连夜赶到围攻盐城的前线最高指挥部——苏中军区司令部，管文蔚司令员、吉洛政委立即接见了。我向他们详细汇报了伪四军内部动向及我们地下工作的情况。最后确定做两手打算，一面加强争取工作，力争困守盐城的伪四军主力全部起义来归，一面防止其采取缓兵之计，以谈待援，约定出现后一种情况时，地下同志作好内应，配合围城部队进攻。我还同苏北区党委城工部薛尚实部长，政治交通员左如桂同志等见了面。事毕，我由原来的路线返回城内。

我回城后，先向伪四十师师长戴心宽，接着又向伪四军军长赵云祥汇报了出城经过，说明新四军欢迎驻守盐城的部队起义。赵云祥当即决定，再由四十师派高级代表出城进一步谈判。戴选了隋昆亭参议为代表，由我陪同前往。我们到苏中军区后，受到管司令员、吉政委接见。二位首长谈了我军对待伪军起义的政策，提出伪四军起义后可以保持一个军的番号。这次，我们还去看望了在伍

佑被俘的伪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他见到我们便说：“打不得了，新四军的政策好，又兑现，赶快起义吧！”我们请他给赵云祥、戴心宽写了信。

我们回城汇报后，赵云祥决定再派伪四军代理参谋长张伴农出城，谈判具体起义条件，仍由我陪同出城。管、吉首长热情接待了张伴农，提出起义后保持一个军的番号，与新四军一样待遇，起义官兵愿留者继续服役，愿走者发给路费作复员处理。张伴农提出在伍佑被俘的官兵也按起义待遇，也被允许。至此，起义的基本条件确定下来了。

为了肯定起义行动，张伴农回城后，又决定由戴心宽作为全权代表出城作最后谈判。谈判在城东北约二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进行。戴随带四、五名警卫人员，又去了一个排部署在小村庄以西二、三百米的小河边警戒。那天我也是戴的随员之一，到达后，吉洛政委、谢祥军司令员接待了我们。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达成协议，伪四军起义后保持军的番号，归华中军区指挥，与新四军同等待遇。

五、发出起义通电，投入革命营垒

戴心宽谈判归来，径去军部，连夜由张伴农草拟协议书及起义通电，由军长赵云祥、师长戴心宽二人签署。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苏中军区的管、吉首长和盐阜军区的谢祥军司令员同伪四军赵云祥军长在新开河飞机场签订了起义协议，发出了赵、戴的起义通电。至此，汪伪二方面军第四军，计一个军部，一个师部，五个团，一个训练总队，共计一万余人宣布起义，投入革命营垒。

这支部队起义后，整编为解放军第四军，下辖十一、十二两个师，一个训练总队，一个特务团，归华中军区指挥。军长仍由赵云祥担任。赵在起义后的第二天就离开部队，在淮安晋见华中军区首长后，要求去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一去未返。戴心宽任副军长，后代理军长。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戴的提议下，经华中军区批准，将该部整编为三个团，即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团，归华中军区十纵建制。后来，除留八十八团于十纵外，八十七团改为五十七团，八十九团改为六十一团，编入华中七纵。解放战争开始，该部队参加苏中七战七捷作战后，五十七团仍留七纵，六十一团编入皮定钧旅，我们的策反工作顺利结束。

蕉园诗稿(选录)*

翁 文 灏

自 叙

余不能诗,亦不自期为诗人。而兴之所至,偶有吟咏,不求琢句之工,但纪感念之意。尤于抗战时期以及其前后,惓怀时势,积集增多,还都检之,稿已成帙。薄薄自惭,决无当于盾鼻;讽咏所及,辄有寄于毫端。忆在川东,寄住南开中学之校舍,风土相宜,树蕉特盛,余女燕娟拟名蕉园。诗篇大半成于此宅,因以为名,以志鸿爪。自余从政之时,以迄还都之日,分年成集,得集十二,得诗三百有余,付之剞劂,以便浏览。惟句未尽能精当,词不比于古人,读者勿作求全之讥,幸甚。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 懋士叙于南京

翁文灏先生(1889—1971)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早年留学比利时,得理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先后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代理清华大学校长、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部长、战时生产局局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宁沪解放前去香港,旋赴法国。1951年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1971年病故。抗战胜利后,先生曾自编抗战期间所作旧体诗为《蕉园诗稿》,颇多爱国忧时之作。原稿排版未付印,现选录一部分发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载有先生所撰《回顾往事》一文,可以参阅。——编者注。

平汉车中口占(一九三五年九月)

往返程途客子心，轮声陆续伴微吟。两行树影飞驰急，数点阳光秋意深。浩荡平原勤刈获，参差村落隐乡林。华胄太息萧条甚，忍把神州付陆沉。

此地从来古迹多，邳阳过后复滹沱。金戈昔已争辽汉，岭粤今犹峙越佗(切念国局之艰难，更感统一之必要)。衰草秋风思保国，高粱虏马叹濒河。燕云坐弃伤心事，岂有余闲供放歌。

开国自来困苦真，白登汉祖几伤身。大风猛士能存国，博浪书生竟灭秦。一旅中兴征往事，三韩沦没叹无人。兴亡我亦应同责，莫但愁忧泪满巾。

和陈毓华赠诗(一九三六年二月)

立志非徒在作官，愿供弩力列鹓鸾。曾勤学术廿年事，期获邦家百载安。决计牺身终不惜，宅心如水岂能干。欲求宏效臻旦夕，法治于今忆读韩。

游玄武湖(一九三六年三月)

行过梁洲到翠洲，环湖徐步导春游。斜阳远映鸡鸣寺，碧水清围玄武楼。遍地桃樱花待发，经冬松柏景良幽。太平旧事从头记，来日如何亦足忧。

追记京杭公路之行(一九三六年四月)

艰难崖石落深陂，振作方能判险夷。海不扬波赖障护，途多坦荡仗良规。救时暂作终身志，拚死愿回旧国危。自古和平凭奋斗，

决心用力莫迟疑。

荷院小坐寄慨(一九三六年六月)

城郭金汤峙水滨，千年王气郁淮秦。龙盘虎踞堪凭险，蚕食鲸吞最足瞋。天下先忧贤士志，宗邦同死宰官身。管萧力可成强国，况有神州百兆民。

杞忧(一九三六年七月)

无端鼙鼓动天来，兄弟阋墙肇劫灰。岂可抗争凭意气，自将戈戟破城台。孤军假道终无幸，内战徒劳最足哀。树倒巢倾狂水下，鲁阳挽日几能回？

自秀峰寺归牯岭(一九三六年八月)

游踪此日独探寻，五老峰前鄱水浔。老树横空知寺近，白云如海入山深。苍松郁密冈头路，修竹清新岭畔林。犹见四围生众绿，薰风习习豁胸襟。

时事(一九三六年九月)

此日何时费琢磨，正应共保旧山河。成都痛授邻人隙，北海空操同室戈。敌国侵陵催梦觉，民生憔悴惜平和。从今赤胆忠心士，努力前程责任多。

悲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太息人心晚世凋，空言忠爱对天朝。和戎自古安难久，辱国于今恨不消。曲笔岂能欺直士，急流更复杂狂飙。千年基业成非易，何忍轻轻付落潮。

最是青山黑水边(谓绥远之大青山及黑水地方)，旧游曾忆廿年前。平沙浩荡旧争地，黄水环回新辟田。屏障终当卫汉土，忠贞早愿著先鞭。岂容蚕食终无已，并此神州竟亦捐。

大厦岂能一手扶，狂澜欲倒最堪虞。满朝肉食奇谋少，举国心惊决策无。碧血终当尽薄责，赤心谁与作良图。从来兴废非天命，移转应存大丈夫。

元旦国府纪念(一九三七年一月)

一年之计在于春，旭日光辉万象新。创业艰虞应奋勉，持身勤俭更清淳。农田收岂常丰获，同志心宜互诚亲。二十五周溯革命，更将何策慰斯民？

西安事变(同上)

岂但徒为萁豆煎，忠诚报国志同坚。删除派别纷歧见，收复河山在眼前。

华北战起(一九三七年七月)

战事凭空起芦沟，侵陵步步见深谋。鲸吞已去金瓯地，蚕食未忘黄炎胄(自前清侵占台湾以来，日本侵略吾国坚进不已)。坐视冀幽归左衽，凭谁砥柱挽中流？河山半壁终难恃，奋起抗争誓不休。

国联空语尚和平，仗义徒劳口舌争。须识皮难从虎得，可怜草竟随风倾。横行可畏邻谋远，决战非关国策轻。拚以牺牲维国脉，冲冠怒发愤难平。

东望沪战(一九三七年八月)

滔滔浪水大江东，兵革春申奋斗中。早该弹丸破割据，誓除侵略抗强雄。神州命脉竞争烈，华国英豪肝胆忠。我亦应捐微顶踵，齐心看取九州同。

就职纪念(一九三八年五月)

道德文章第一流(余在国府就部长职时，监誓委员吴稚晖以此相许)，先生奖许抑何优？邦家扶植想安石，淡泊操持法武侯。逝者如斯悲往事，前程可勉竭忠谋。况当敌寇纵横日，岂敢余闲强自偷。

重庆感怀(一九三八年八月)

淡泊原存天性厚，静宁不减覆亡忧。胸无渣滓何庸隐，事虽艰难不许休。皓首穷经贤士志，鞠躬尽瘁古人猷。关中河内前朝事，此日经营自益州。

胡适之电劝汪精卫切勿半途言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空言切莫误和平，为国今须用甲兵。美法英苏方共议，东西中外尽同情。艰苦终能臻胜利，迟疑势必害苍生。劝君一着休迷失，大局全盘需战征(时余持电面言，汪答词支吾)。

痛哭(一九三九年四月)

涕流太息贾长沙，此恨于今更有加。天子多才重贵戚，王公有意植私家。官僚贪污民应弃，国命阽危我独嗟。岂有覆巢存完卵，

前途可畏是中华。

感事(一九三九年十月)

和 战

大局原应细斟酌,最须君相策同心。尚存政略抗强敌,岂可交谈停战侵。江渚樽俎相折证(时日敌授意言和),潇湘胜捷正传音(湘北大战,我胜日败)。从知天下兴亡事,不许参差误纵擒。

民 主

民主原难一步图,空虚过度亦堪虞。会场千案成空语(各会议滥提议案,为数过多,议决后并不付之实行),论议无声苦士夫(各刊物甚少正直言论)。宵小猖狂紊治理,忠心策划待传敷。时艰痛见重重积,谁救邦家万象苏。

将 帅

貔貅多士大中华,率导有人方足夸。应使将军专职务(统兵司令不宜多兼民政),庶教战力早增加。饩廩称事宜添俸(俸给过低,风纪荡然),技术趋新庶免瑕(近代战术必须勤习)。更愿多求真学识,国威浩荡自无涯。

大 政

犹自兵烽争短长,输赢得失费衡量。极权国本和平敌,胜利人应侵略防(欧洲政略家有谓中国胜利必骄,势将侵略他国,不宜多助)。既自民权传国父,宜看美政出朝堂。最应努力迎头赶,时代潮流不可忘。

父亲七十寿辰献颂(一九四〇年二月)

康健欣看到古稀,追陪杖履侍庭闱。性因宁静致宏远,教忆慈

诚明是非。地上神仙安淡泊，人间草木仰春晖。期颐寿愿自天锡，重见升平扬国徽。

难得渝滨驻客踪，春风和气故雍容。青城山畔诗千句，绿野堂前酒一钟。齿德共尊先觉士，沧桑遍阅后凋松。天留耆老示型范，尔雅文章为世宗。

伤心人语(一九四〇年六月)

惊心动魄望前途，困苦艰辛大可虞。诚愿争成公理胜，奈何深感力量孤。狂澜虽已三年扼，大厦非能一手扶。忍见神州华夏族，陆沉沦落为人奴。

甘肃油矿(一九四一年二月)

天助宗邦地出油，祁连山麓石脂优。背斜形势规称善，井架探寻愿得酬（甘肃油矿地质，民国十年由谢家荣初察，二十三年以后孙健初迭次测勘，二十八年一起由资源委员会凿井试探，得油颇富）。源出玉门边塞外，富看甘肃远关头。从今燃料来有自，争取山河护九州。

蕉园晚眺(一九四一年七月)

初晴风色豁胸襟，鸟语涧泉鸣好音。擎水芰荷遍有盖，经年楝木已成林。沿堤绿树增生气，满地繁茵感雨霖。惟念兵戈犹未已，岂容幽处自闲吟。

告贪官(一九四一年九月)

操守莫忘清白洁，人心终有是非存。口中有舌手中笔，直道于

今仍足尊。

挥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挥戈返日救斯民，多难兴邦理自真。运会转移凭奋斗，国家振起赖精神。生当尝胆卧薪日，勉作先忧后乐人。烟雨楼台时在望，莫辞劳瘁与艰辛。

板荡(同上)

板荡潮流荆棘时，宏开风气仗先知。浮云富贵沧桑视，尘世功名变幻词。但得事能拯国族，不辞力尽经艰危。精诚专一求前进，此志生平不自欺。

汉留侯庙(一九四二年五月)

细雨微风伴壮游，登阶古庙谒留侯。赤松子道仙更侠，紫柏山容净且幽。养性全真见伟略，兴邦建国展良谋。复兴汉室人安在？绕柱徘徊费策筹。

答资源委员会成立十周年陈伯庄赠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新词雅句投琼玉，报国衷诚承顾关。逝水时犹驹过隙，前程功愧弩登山。屠龙自省无奇术，击楫今当追昔贤。矢志坚贞扶社稷，同情深感寄渊源。

自信心真如水清，更当为国牺微身。艰难缔造兴工业，辛苦回旋转巨轮。誓启资源坚志气，须从事实见功勋。佩君卓识相探讨，共辟民生不二门。

国事(一九四三年五月)

逝水年华去不留，兵戈转瞬六春秋。秣陵有恨凭谁诉，江水无情只自流。南北昔曾分禹域，东西岂竟裂神州。河山收复从头起，莫误时机空白头。

官僚(一九四四年八月)

官僚资本势滔天，地主声威更益坚。违反党纲危国本，伤心相对共凄然。

四强互助友情真，辅导匡襄倍费神。独惜邦人迷旧梦，阍墙莢豆最酸辛。

答客问(同上)

此志兢兢不敢欺，为君披沥尽言之。惊闻炉火纯青誉，俛有锋芒太露时。愿救宗邦凭死力，岂恋栈豆尽驰驱。心无嗜欲诨辞怨，身可牺牲不为私。坦荡襟怀怜彼醉，沛充浩气爱吾痴。回生起死中华运，自竭精诚奠国基。

哭心翰抗战殒命(一九四四年九月)

自小生来志气高，愿卫国土拥征旄。燕郊习武增雄气，倭贼逞威激怒涛(翰儿生于北平，民国二十四年师长关麟征及黄杰初办军训，翰儿与同学因感日敌侵迫，受训特为热心。乃日敌屡次强迫吾国停止军训，消息传布，翰儿等愤不欲生，乃决投考空军，誓雪国耻)。誓献寸身防寇敌，学成飞击列军曹(翰儿家书曾言终生只愿为国家御敌)。河山未复身先死，尔目难瞑血泪滔。

自得航空毕业时，辛勤争战未曾迟（翰儿在航空学校时，展转播迁，始在昆明第八期生毕业，宣誓舍身杀敌，并即实习战斗，加入抗战）。秦陇力见翱翔翼，湖泽威先貔虎师（翰儿曾在兰州东郊守卫，深夜当地汉奸突来袭击，少数空军人员仓卒抗御，幸免及难。嗣即转秦川鄂湘各省。湘西之战，日军溃退，翰儿率机追击，杀敌尤众）。奋斗驰驱摧敌队，忠贞坚朴度艰危。最怜九载长征士，竟在沙场一日牺（日军由湘省进侵桂北兴安、灵川间，我陆军抗阻甚艰，乃由空军以芷江为基地，翰儿率领机队前往抗战，每日出发至五次之多，备极劳瘁。九月十六日在兴安上空为敌弹所伤，仍率机飞回，中途迷失方向，至三穗坠机毕命）。

艰苦吾家一代人，同舟风雨最酸辛。上哀老父凄怆泪（余父于翰儿钟爱最深，耄年遭此，惨痛特甚），下念新婚孤独亲（媳周勤培与翰儿识于成都，上年初同来重庆成婚，突遭此变，哀苦可知）。痛切连枝齐息涕，悲怀身世更沾巾。宗邦如此阽危甚，何日江山得再春。

人生自古皆有死，死为邦家亦足荣。痛惜士兵少斗志，能捐身命自豪英（近时我陆军残缺畏葸，惟空军将士仍不避艰苦，奋勇作战）。伤心最切兆民苦，哀哭惊看大厦倾。儿已丧亡卫国土，千钧重责更谁擎？

忧煎（同上）

滔滔风气坠深渊，贞下起元岂其然。末世有官皆废职，万民无褐枉呼天。浮夸谁克存忠信，贪污人争握政权。何日澄清睹盛世，仓皇我意最忧煎。

追哭翰儿(一九四五年八月)

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究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拚命捍防城。

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身疲命亦终。

最难为国竟忘家，此日凯歌悲苦加。环顾家庭儿女辈，只儿战死在天涯。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蕉园惜别(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爱此蜗居景色清，东归离别最关情。嘉陵水出石门激(江中有双石门)，歌乐山临龔舍明(指南开学校)。秀丽无双双巷子(户外地名)，精诚唯一一书生。八年宦海藏身处，犹忆倭夷炸击声。

移居胜利新村(同上)

抗战功成国克存，移居胜利号新村。倚山地僻心如水，照夜窗明月有痕。自问身真同野鹤，应怜民尚苦啼猿。名园岂敢耽安逸，犹念疮痍遍弟昆。

新年(一九四六年一月)

御侮已成差足幸，阅墙未已实堪哀。是非素学终能信，新旧交添不可回。我自坚贞遵直道，谁更忠直救沉灾。闲居默念沧桑变，手把史编自阖开。

按：翁文灏先生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定居北京，也写了不少诗篇，反映晚年的愉快生活和对新中国的感受。现摘抄一部分，附此发表。

北海晚景（一九五六年八月）

译书余暇赏新晴，丝柳高槐景气清。明月当头残夏影，鸣蝉聒耳暑天声。玉泉潋滟涌金液，琼岛青葱冠帝京。遥想运河收埃及，鼓笳隐隐动英兵。

康南海生辰百年纪念志感（一九五八年三月）

转瞬光阴满百年，复兴努力忆前贤。维新明治强邻迫，拯救中华重责肩。变法精神为保国，著书学术培渊泉。如云士气争先着，共仰高山倡导坚。

太息先生晚节亏，歧途误走信堪悲。保皇岂即拯邦难，革命缘何畏事危。往返印欧空涕泪，留恋帝制太支离。伤心一代贤良士，黯淡斜阳落崦嵫。

赠邵力子（一九六二年三月）

八十高龄友亦师，亲仁爱国敬先知。苏联矮获尊先进，直道公忠不容私。

水仙（同上）

春风方启蛰，幽室得清馨。移植园山种，开来燕邑厅。仙姿英绰约，娇态美娉婷。旦夕灌泉林，闲居慰暮龄。

自溯(一九六二年五月)

勤修锥指地,二十五年余。登涉看消长,驰骋评实虚。燕山峰岳峻,岩石察研徐。喜为神州创,联翩学术书。

弃学从邦政,为因日寇仇。青年曾鼎鼎,花甲竟悠悠。未克鱼千里,遂教貉一丘。何人明此意,世事本云浮。

自咏(一九六二年七月)

我生于 1889 年夏间,今到 1962 年盛夏。数十年来,时势屡变,我治学从政,不敢自逸,竞业操守,渡越洪波。身无遗憾诚何易,心有操持勉自安,亦聊以自慰耳。

七四春秋死已邻,抚身自问自安神。居官无愧心曾尽,救国诚难事是真。学以指锥登涉苦,政悲多变海桑频。只愁国局飘摇甚,祝祷苍天助革新。

咏海棠(一九六六年七月)

十年培养倍葱青,此日荫浓绿满庭。春季花开呈艳色,夏天叶茂比云屏。迎人瑞气清凉态,祛暑幽容草树馨。棠果垂珠红渐熟,儿童笑语乐难停。

生辰自记(同上)

一年一度逢生辰,已越韶光七七春^①。志切争先求孟进,身临暮岁感逡巡。沧桑时代今超昔,迂拙行藏旧转新。记忆小孙双兔

^① 余生于一八八九年七月,即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六月二十九日,今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即丙午岁六月二十九日。

子，芝兰京邑又江滨①。

①维芬现居北京，维群居住上海，皆生于一九六三年癸卯岁。

十老吟（一九六六年八月）

耄龄健在者十人，皆居京师，目睹鼎革。张难先年逾九十，须眉皆白。何香凝、章士钊、王葆真、仇鳌、叶恭绰、程潜、马寅初、邵力子、叶景莘年皆八十以上。

耄年康健亦堪钦，解放以来岁月侵。读马列书今日事，想唐虞世古时心。怵怀内战干戈苦，幸值新邦改革深。阅历从前多体验，沧桑转变可高吟。

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堂皇会议盛非常，纪念诞辰百岁光①。革命先行心坚毅，中华民国意深长。生逢军阀贪私苦，志接苏联改造昌。花甲未周身早殒，雄声唤起气辉煌。

崇论宏议出周公②，事绩详明宋氏忠③。草创东京见宏远④，前修日本识融通⑤。三民主义新胜旧，联共同行最有功。今日追钦开前路，艰辛困斗最高崇。

①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一百诞辰周年，人民大会堂万人聚会，共申纪念。②周恩来总理讲话，优辞褒颂。③宋庆龄副主席历述孙中山终生革命，坚苦不移。④民革主席何香凝九十高龄，热诚赞扬。⑤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历述日本人士的同情感受。

咏雪（一九六七年二月）

沁园春句映云霞，陋室鲋生比井蛙。芦蕊千条银作色，冰晶六

出玉无瑕。湖山素裹胜如画，梅鹤清高静不哗。炉火微红葡汁酒，
天工人意美堪夸。

追溯前尘（一九六七年二月）

负笈欧西六十年，二文^①已去我生全。章丁^②逝矣同勤奋，叶
谢^③长行叹后先。旧友留存能有几，新时幸值是良缘。凌霄国势风
云会，耄岁欣逢改造天。

不慕虚荣趋阅阅，自甘淡泊读图书。燕山运动东方象，金属锑
钨南岳均。地震鹫峰初测验，陨星体质试乘除。神州大好山河在，
来往携锥策蹇驴。

锥声测地兼探矿，学识欣超霞客多。拔地高峰登岱岳，滔天沧
海泛洪波。爬行骸骨琅琊野，三叶虫形汶口河。齐鲁风光陶客醉，
至今回想足高歌。

九江湖口曾经行，浩瀚波涛大可惊。鄱乐煤田看质美，磁都景
德著名精。冲天牯岭森林茂，超世钨金脉络明。一派风光邻浙省，
云烟胜地岂能轻。

西北豪雄不等闲，游踪广涉又高攀。石油涌出玉门窟，农利勤
修银水关。要地宏开西域路，高峰亲到贺兰山。张骞盛绩雄千古，
何幸追寻伯仲间。

东北山河欣壮游，物藏丰富冠神州。巨型铁矿兼机械，琼液精
华产石油。辽水松花天赋厚，高山大海国防优。舟车数度来观览，
疆宇恢宏占上游。

①胡文耀、孙文耀。 ②章鸿钊、丁文江。 ③叶良辅、谢家荣。

海棠花开(一九六七年四月)

一年一度海棠花,绿叶枝头迎目葩。春色庭前来燕语,瓶香案上
映蝉纱。词风越缙堂吟咏①,诗集蓼园客诵夸②。偶以余闲消永
日,芸窗静对晚晴霞。

①越缙堂词录,李慈铭菴客著。 ②蓼园诗钞,柯劭忞凤孙著。

忆海国飞回(一九六七年五月)

痛哭生平孽,曾参反动营。官高增罪大,行洁不肩轻。念岁燕
京守,十年盗窟行。生涯徒淡泊,苦志究难明。

解放曙光见,飞航万里程。归来钦改革,新政正长征。阶级人
人有,恩仇处处鸣。翻然真理见,分别浊还清。

奴隶殷商业,君皇秦汉朝。诗书皆破碎,剥削贯云霄。古学残
葩去,新知马列超。从头开眼界,改造受咸韶。

日月翻天地,心思换径途。尘埃去富贵,雨露启欢愉。共产工
农势,生民进展谟。追随新世纪,迈步力驰驱。

步行运动(一九六七年六月)

夏来空气晓清超,医嘱徐行稍动劳①。西走勉看钟鼓址,东行
步到北新桥。明年此日盼无病,康健持身避失调。髦士幸观新政
治,日长月就贯云霄。

①余身老体弱,不宜枯坐室中,而应随时散步,以期活动血脉。

南京长江大桥告成(一九六七年八月)

龙盘虎踞护南京,今日风光分外明。天堑长江波浩荡,虹桥通

道势峥嵘。人工建筑超前古，自力经营树伟旌。武汉壮观曾远著，雄豪后起更传声。

六朝天堑分南北，晋宋江淮抗敌师。手造神州重建设，桥通轨道最精奇。从前轮渡犹周折，此日驰驱无阻歧。共喜巍峨兼壮丽，河山刮目显雄姿。

悼 凤(一九六九年九月)

逝矣悲歌廿五年，精忠保国勇无边^①。痛遭倭寇侵袭急，怒驾飞机抗战坚。前敌扬威身以殉，家庭追悼泪长悬。阵容此日胜前代，先烈英风尚凛然。

①一九四四年九月次儿凤书率空军猛战桂边，终遭敌炮。他专任国防，未参内战，英风追溯，到今已二十五年矣。

忆 瑾(同上)

弱冠志力已嶙峋，女子边疆甘苦辛^①。珍宝烽烟飞勇士，虎林坚决遏强邻。誓捐生命宗邦守，决助韶山教导遵。每读来书多壮气，自惭耄耋老埃尘。

①孙女维瑾志愿守边，保卫宗国，虎林军屯，誓作牺牲。返身自问，年已衰老，愧对宗邦。

秋初听蝉(一九七〇年九月)

昨夜淋漓雨，今朝日色融。树犹留众绿，声已发鸣虫。时值阳光暖，音传木叶通。振纱能大响，入耳悦天聪。团体兴同调，心怀受不穷。秋来多美景，静坐养衰翁。

春节忆台湾（一九七一年二月）

律转春回气象妍，东风旺盛正空前。高歌亿兆心情畅，痛惜台澎侵侮煎。外力终将冰岳倒，华邦势必海疆全。须教完璧归怀抱，举国人人立志坚。

和平诚意我谋求，帝国阴谋少等俦。美隔重瀛遥万里，华存领土越千秋。积年耻辱今应雪，海岛风光誓必收。敌我分明须记取，驱戎护国莫疑犹。

为人作嫁总沉沦，殷鉴荆齐遭劫尘。虏首轮卷同诡诈，宗邦怀抱久亲仁。护明克敌邦门将，爱国腾辉何国斌。成败须从邪正别，翻然决计莫因循。

春回翘首想宗邦，文物惊闻出国疆。鼎鬲西周存拱璧，图书唐宋美无双。昔临危局犹思奋，今值盛时更可崇。六亿人民殷期望，须将全部还家乡。

敌我昭然判别森，是非曲直由此分。人生自古区邪正，道路于今待酌斟。虚号徒为夷狄役，忠贞乃得汉人心。终生功过须尊重，莫忘宗邦惠泽深。

台澎原是我屏藩，形势天成比户门。纸虎终看归破灭，忠怀岂可忘渊源。峰峦环峙卫宗土，日月光华寄国魂。要在人心同振奋，发扬正气振乾坤。

江庸自传

江庸字翊云，又作翼云，晚号澹翁，原籍福建省长汀县。祖父讳怀廷，字兰皋，咸丰辛亥举人，壬子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庸生于璧山县署。祖父歿于南充县任内，余随父瀚（字叔海，号石翁）流寓成都。

十四年（一八八八），父入湖南易佩绅方伯（字笏山，易顺鼎实甫父也）幕。方伯调任苏藩，家属随赴苏州。时泰兴朱盘铭曼君、华阳张祥龄子馥皆以文学名当世，同在幕府。庸为子馥丈室人曾彦季硕所最钟爱，教庸作小篆，读《文选》。曾即蜀才媛左冰如季女，著《桐凤阁诗集》者也。

易方伯辞职，余随父母返成都。十八年（一八九二），父掌教重庆致用书院；从巴县潘清荫梧冈师治制艺文。二十年（一八九四），从荣县赵熙尧生师治诗古文。二十四年，川督奎俊乐峰聘父参赞戎幕；入成都中西学堂肄业，习英文。该堂分为二斋，一英文，一法文，英法文外固无他学科也。

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入京应顺天乡试，值义和拳之变。五月取道宣化、大同，由晋、秦还蜀。抵长安时恰遇驿差，遂乘驿马，日夜奔驰栈道中，以当时西安至成都二十八日之程，十三日而至，此平生第一壮快之举。筋骨之锻炼须自少年，今年逾八十而腰脚犹健，未尝不得力于此。

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川督遣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入成城学

校。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毕业,入私立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继范源廉、静生经管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学务,并充翻译助教。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清廷派遣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派充照料员。是年毕业,清北洋大臣袁世凯聘充北洋法政学堂教务长,未到校,学部调充普通司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教务长。修律大臣沈家本派充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并聘任法律学堂教习。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大理院调充详谳处推事。三十四年应学部试,列举人。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廷试第四,归大理院以推事即用;充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三年冬,偕唐绍仪赴武昌议和。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留大理院,旋简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二年,梁启超长司法,任次长。四年(一九一五),奉命考察东三省,归见袁世凯复命,力陈奉吉两省政治之腐败,军务之废弛,惟黑龙江将军兼省长朱庆澜励精图治,军政、民政皆蔚然可观。三省以奉天接近强邻,关系尤重,宜调朱督奉,吉、黑另简贤员继任,整顿军政吏治以固吾圉。袁大不谓然,言朱庆澜军事尚娴,奉天政务繁剧,恐未必胜任。庸笑应之曰:“悦各省省长皆如朱庆澜,总统亦庶无宵旰之忧矣。”退草一呈辞职,语颇激切。袁问秘书长张一麐应如何批示,张云江庸之辞职负气耳,自当温语慰留,袁曰姑拟一批语。袁阅批语曰:批太好。张答曰,既慰留乌得不好批。袁微笑,复谓张曰:汝告江庸,此后但做官少说话。此段经过,一九三九年在重庆始闻之张氏也。

五年(一九一六)辞职。次年(一九一七)任命司法部次长并代理部务。旋李经羲组阁^①,任命司法总长,辞不就,避往汤山。次日

^① 指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去职,黎元洪提请国会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张勋复辟，逃至天津始闻伪廷^①有法部左侍郎之命，付之一笑而已。及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任司法总长，因赦张镇芳拒绝副署辞职。时民国方恢复，张勋尚在逃，即赦复辟要犯，何以惩前毖后，故当日辞职颇为舆论所许，以为民国以来负政治责任辞职者，庸尚属第一人。

一九一八年，留日本自费生围使署，被捕数人，公使无法应付，各省监督亦多逃匿，非恢复昔日总监督之制，慎其人选，重其事权，无以善后。教育总长傅增湘乃商请俯就留日学生监督之任。到日本后，即保释被捕学生，按月发给官费生学费。在日二年得相安无事，因各省财政支绌，学费必后继为难，托词归国，遂辞不去。

一九二〇年，特任修订法律馆总裁。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李彦青用事，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职。行律师事务，创办《法律评论》周刊，赴广东游历，谒孙中山先生于士敏土厂，先生嘱留广东八个月为之帮忙，因北京尚有要事婉辞，究未知所嘱何事，又何故以八个月为期，当时及后在北京晤中山先生，亦竟未问及也。

一九二四年，教育部聘充国立法政大学校长，一九二五年辞职。一九二七年，任私立朝阳大学校长。

一九三六年，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参加维也纳国际律师协会会议。九月取道莫斯科归国，径赴上海作移居之计，以日本侵略势力在平津日益增长，华北将成政治特殊区，不可久居也。一九三七年，日寇占据上海，筹划南京伪组织，松井于某日嘱温宗尧代邀于虹口东语酒家晤谈，辞不往。后畑俊六至沪，更携台湾人许丙来访，畑、许皆一九二九年余代表华洋义赈会赴台募捐时所识，竭力怂恿参加伪组织，复峻拒之，其后亦不再相扰。因知王克敏、梁鸿志辈罪

^① 指张勋复辟后，溥仪任命伪大臣。

无可怨，南北伪组织之参加，日人并不甚威迫或勉强也。

一九三八年，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七月赴汉口。会毕先赴重庆，以当时三个月开会一次，闻下届在渝开会，四川本旧游之地，亲友尚多，故先期到渝相待。一九四一年，妻徐琛挈三女满、九儿康来。一九四三年，八儿靖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亦至渝，家人粗聚。是年被推充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提名伪国大代表，不竞选。后伪府迫令王善祥律师让席，亦致函拒受。伪宪法公布，任命为“大法官”，函电力辞不就。

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代理伪总统，时北京已解放，李以个人名义邀请与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入京探索和平途径。到京先晤叶剑英市长，切陈所见，经叶市长转陈毛主席钧裁。嗣复接毛主席电邀赴石家庄一谈，遂遵命前往，蒙主席面允可指定地点及时间，姑予磋议。及返南京，与当时国民党政府要员晤谈，灼知议和并无诚意。未几，何应钦任伪行政院长，至沪造门邀请担任司法或政府委员，不允。及正式派员赴京议和，亦以病辞，逆料其必无成效故也。

一九四九年八月，蒙毛主席手书嘱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长。

庸幼承庭训，经史词章之学多受之先父，著有《趋庭随笔》一卷，语皆肤浅，不足以绍述先业。平生好游，撰游记独多，出版者有《台湾半月记》、《菲律宾游记》、《欧航琐记》，《佘山三日记》，华山、黄山、盘山、上方山等游记。诗已出版者：《百花山诗草》、《南游诗

草》、《黄海闻批诗稿》、《蜀游草》、《澹荡阁诗集》等。法律著述无专刊，散见于《法律评论》及其他杂志；法律馆出版《刑法理由书》，则与日人冈田朝太郎合著，但未署名耳。

（政协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有关先父江庸的点滴史料

江 靖

一、开国时政协诸老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毛主席亲笔函先父江庸有云：“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骏人先生^①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以骏老亦第一次“和谈”代表，曾于平山面谒毛主席也。嗣后骏老因病请假，先父乃于九月中旬赴京。会中有出席代表年逾七十者二十四人，按年齿为序，录其姓名如下，可作政协史料：

司徒美堂，八十三岁	张元济，八十三岁	张 澜，七十八岁
李锡九，七十七岁	陈嘉庚，七十六岁	张难先，七十六岁
沈钧儒，七十六岁	沙彦楷，七十五岁	陈叔通，七十四岁
简玉阶，七十四岁	周善培，七十四岁	安文钦，七十四岁
徐特立，七十三岁	彭泽民，七十三岁	吴玉章，七十二岁
江 庸，七十二岁	黄炎培，七十二岁	何燠时，七十二岁
房文礼，七十二岁	何香凝，七十一岁	符定一，七十一岁
高镇五，七十岁	李步青，七十岁	王葆真，七十岁

^① 颜惠庆别号骏人。

至于毛主席手书原件已于一九七七年献诸中央。

二、陈毅同志的关怀鼓励

一九五八年春先父大病初愈，选刊旧作为《澹荡阁诗集》一册，因精力就衰，自序中有“不复作”之语。寄之陈毅同志，旋接五月八日手书云：“尊集收到，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古人云诗可以疗疾，信然。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黄晦闻^①评早岁作有中者有不中者，即可信又不可全信。黄之《蒹葭楼集》弟亦读过，艰涩之态显然。彼论词独推尊美成、白石、吴文英等，而抑苏、辛，其趣旨可以概见也。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矣。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诗之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奇句何可以不作耶？先生年已八旬而食眠均佳，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真诗人也，何可以放弃本行耶？弟病可六个月，现有好转，仍需调养。病中握笔，草率之至，祈谅之。”

先父接函后，对陈毅同志所望第二点，曾有续作，惜不多耳。而一九八〇年二月即逝世，集外诸什未及整理，十年内乱后所余百不及一，颇负厚望。

从信中可以看到陈毅同志对老年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鼓励他们发挥所长，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对先父“不复作”以建议形式提出批评，体现了“肝胆相照”的精神，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评议诗词，使人心折。尤其病中握笔作此长函，当时先父即深感厚意。

^① 黄晦闻即黄节，南社诗人。

陈毅同志手书已献之上海档案馆。

三、与陈叔通先生论“五四”宪法草案

一九五四年五、六月间，先父在学习宪法草案中，有质疑，有建议，去函陈叔通老人，得复详告。当时两老均年近八旬，学习认真，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至足效法，而两函探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订立与人民政协的性质等问题，亦有史料价值，因抄录如次：

（一）先父去函：

“日前上海市政协全会讨论普选后协商会工作，对今后政协如何产生，即无解决善法。弟日来有一不成熟意见，不知可供参考否？政协之应存在并加强，已详公报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为巩固统一战线政权，自需协商机构，然普选后，执行国家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政协虽是建议机构，似亦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方足以昭郑重。故鄙见共同纲领及政协章程修改草案，宜由全委会起草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决。是否有当，先请裁酌，如中央已有成算，可秘而勿宣。”

（二）陈叔通先生复函：

“政治协商会议行使政权只限于第一届全体会议，自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后，政权已付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故全国委员会已是协商机关而不是政权机关，各地协商委员会亦同。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由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筹备，如何产生仍如第一届以协商（各党派、无党派、各团体、少数民族、华侨）方式来产生。至于组织法或仍是通过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而不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宪法上提不提是一个问题。共同纲领与以前不同，以前包括宪法性质在内，共同纲领是奋

斗的目标（由各党派、共产党在内以及各团体、各民族领导全国人民，在统一战线上共同奋斗，与人民代表大会是政权机构是两事）。宪法是死的，共同纲领是活的，故可能亦是通过政协全体会议，而不必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要共同遵守是法律性，共同纲领要共同奋斗是政治性，死活之分即在此。各地协商委员会原是各级代表会选出的，以后须改地方委员会（也可能加协商两字），产生方式亦是以协商而不是代表大会。就是必须改组，职权可能以建议为主，包括反映情况。反映就是现在人民意见，研究就是现在所设各种专门委员会。此外，参加各种活动却在建议之外。以上仅供参考，不能作为正式解答。”

（一九八三年三月）

（政协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李公朴先生在申报馆的工作

伍 康 成

一九三三年夏季，我从大学毕业，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当时在申报馆工作的李公朴先生，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到李先生的寓所拜访，他了解了我的学历和个人志愿之后，把我安排在他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部工作，又让我在他主持的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中兼课。这是我认识李公朴先生和进申报馆工作的开始。

一、李公朴先生和我的第一次谈话

李公朴先生当时三十来岁，从美国考察回来不久就进入申报馆。他在申报馆中担任三项工作：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申报业余补习学校校长和申报业余周刊主编。前两项都是申报馆在一九三二年举行创办六十周年纪念之后新创设的社会服务事业。业余周刊是申报本埠增刊的一种，创刊也没有多久。这三项事业都以上海工商企业中的低级职工，主要是店员和学徒为服务对象。

我第一次见李先生就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既和那些旧官僚和有封建文化修养的旧学者不同，也和我接触比较多的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不同。他虽然在讲话中喜欢插进一点英语词句，也很赞赏西方的一些风俗习惯，但他并没有某些教授先生那种

目空一切、自命不凡的气派和架子，却有精明强干而又平易近人的风度。我那时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受了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洗礼的人。

他同我谈了个把钟头，谈了申报馆创办这些社会服务事业的原因和经过，他同申报主持人史量才的关系，最后还详细说明了他在办理这些事业方面的打算和计划。他说，申报馆原来并没有打算办这些服务事业，后来由于他的建议得到史量才的支持，申报馆才决定开办。还说，他虽然在美国大学读过书，但是过去一直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他的文化知识，主要是在业余自学中获得的。他觉得，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学校林立，但是社会教育和补习教育却很薄弱，商店工厂的广大职工和学徒，工作重，待遇差，生活苦，文化低，在青少年时代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渴望获得文化知识，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他在申报馆担任的三项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流通图书馆给他们准备文化食粮；补习学校给他们一点基础知识和职业教育；业余周刊给他们提供一些世界知识，帮助解决一些生活中和思想上的问题。他并不将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单纯看作是职务，而是看成一种事业。他表示要将全部精力贯注在这些事业上面，因为它们体现了他的理想、抱负和希望。

二、申报流通图书馆

很多人以为申报流通图书馆是《申报》为它自己设立的图书馆，其实不是如此。它是一九三三年由申报馆筹措经费举办的一个对外开放，读者可以借书回家阅读，为上海市民服务的图书馆。馆址设在南京路抛球场慈淑大楼的三楼。申报馆本身和它的职工

很少使用这个图书馆。因为这个图书馆是为上海工商企业中的职工服务的，职工只有业余时间可以利用，不可能到图书馆长时间阅览，所以它的书库和阅览室面积不需要很大，可是交通却要便利。在热闹的南京路上用昂贵的租金去租用慈淑大楼的房屋（这种房屋一般是用作工商机构的写字间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个图书馆的房屋，有的白天当阅览室使用，晚上就作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的教室，放学之后还作练习生的寝室。馆内的书籍报刊都是当代的出版物，古籍和外文书籍以及过于专门的书刊一般不收藏，因为普通读者并不需要。馆中的组织和工作，主要是在书籍流通部分，凡是馆藏图书的选择、采购、编目、保管、出纳、流通等事项，都由这个部门负责，可是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二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馆员和练习生五、六人。因此，在开馆时间内，这个部门的工作十分忙碌。其它工作人员，除了馆长之外，还有一个集文书、出纳、会计、庶务等工作于一身的事务员和一个兼管清洁、采买、通讯以及其它杂役的工务员。可是，这个图书馆却有一个一般图书馆所没有的部门——读书指导部。

三、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

关于读书指导部，李公朴先生在第一次接见我的时候，谈得很多。从他的谈话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是把读书指导部当作图书馆的关键部门，把读书指导当作图书馆的核心工作看待的。他反复强调，青年店员和学徒中有许多人不但要读书而没有书读，而且有了书也不知道读什么好，结果是胡乱找一些书来看，往往不适合他们的情况和要求。结果，有的读不懂，有的读不进去，反而挫伤了他们读书的兴趣，不是废书不读，就是找些浅薄无聊的东西，消磨

掉有限而宝贵的业余时间。所以他认为，为他们服务的图书馆，不但要提供借阅书报的方便，而且还要提供阅读些什么以及怎样阅读的指导，同时担当起帮助读者的教师、顾问的责任。

因此，他在流通图书馆中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由它来实现他的理想和希望。至于这项工作具体怎样进行，还要在实践中解决。他在同我谈了这个打算之后，接着就要我参加这项工作，还告诉我，他另外也物色到了一位同事。提起这人，他眉飞色舞，极其兴奋，象在讲述一个传奇式的故事。他说，这位同事虽然只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可是勤奋自学，社会科学知识很丰富。他与此人素昧平生，也不是由别人推荐、介绍，而是这位同事自己写信到报馆申请做点文化工作。他看过申请信，面谈了一次，就邀请他来担任读书指导工作。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知道这位同事是有很多知识和长处的。

我到图书馆报到的时候，李先生给我介绍了馆中其它几位同事之后，就领我去会晤这位同事。他名叫柳辰夫，湖南人，年龄与李先生差不多，比我约大十岁。在读书指导部办公的，就是我和他两人。我对他的最初印象现在已经模糊，只记得在谈论工作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他总是头脑敏锐，见解深刻，善于分析问题和说明问题。过去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中，固然也有许多有独到见解和善于议论的人，但总离不开强烈的书生气，他却不是这样。但他又不是一个不通理论的实干家，他对周围事物往往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因此，我也和李公朴先生一样，从一开始就对他有良好的印象。

最初几天，我和他在一起，谈话的机会固然不少，可是所谈论的除了工作之外，都是一般性问题，彼此都很少提到个人的事情。

几天后,有一个早晨,我刚上班,他微笑着对我看了一阵说:“你同黄明慧很熟吧?”我说:“是的。他是我的同学。”于是他谈开了,说他从黄明慧那里知道我已经参加“社联”了,同时向我简单说明了他的情况,告诉我现在他也参加社联的活动,并且指出我们对目前的工作,不应该看成混饭吃的职业,而应该看作是帮助青年提高思想认识的革命事业,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是为着共同事业奋斗的同志关系。于是,我们在申报流通图书馆中成立了一个社联的小组,由柳和我以及流通部的其他两位同志组成。后来,我的同学寿熹(进文)从“左联”转入社联之后,也编入我们的小组。

就这样,我们又重新研究和计划了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现在回忆,当时我们进行的工作,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流通部联系,按照当时馆中的经费,订购书刊,所选的以适合青年阅读的进步书刊为主。第二,与读者联系,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第三,为了引起读者兴趣,扩大工作效果,从我们和读者往来的通信中,选出比较有共同性或者比较有意义的函件,在《申报》上发表。这些工作,经柳辰夫和我商量好之后,就向李公朴先生提出,并且得到他的赞同。关于第三项,李先生同《申报》负责人联系后决定在《申报》的本埠新闻版中开辟一个新的专栏,名叫《读书问答》。

四、《读书问答》专栏

《读书问答》是在什么时候见报的?最初刊出的是那些篇目?现在都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第一篇是辰夫写的,他在文章末尾署了一个笔名——“柳湜”,从此他写文章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后来图书馆的同事也都这样叫他,很少提他的原名了。第二篇文章

是我写的。以后就这样陆续向报馆发稿,虽然不是每天都有,但总是经常见报。

《读书问答》栏刊出以后,在社会上和报馆中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申报》早就是社会公认的一份比较保守的报纸,特别是本埠新闻版,登载的消息往往格局相同,过于陈腐。因此在这样一张大报纸上,忽然有一个角落刊出这么一个专栏,特别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这个专栏所提出的对于读书的看法大都和传统的观点不同。它总是希望人们认识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前途,以及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出路,从而进一步认识个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洪流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应该努力的方向。它不但不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点,而且也不鼓励人们去抱“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美妙幻想,而是引导人们去认识客观真理,投入改变现实的斗争。这种观点虽然为保守派所不满,但在追求真理的青年群众中却获得了热烈的赞护,不久就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他们热情地和我们讨论他们所关心或感到困惑的问题。

这个工作虽然很有意义,然而那时我很幼稚,骤然担当起指导青年读书的重任,感到非常吃力。起初还勉强同辰夫轮流写过几篇问答,后来就逐渐感到所写的东西内容空泛,同时我还担任申报本埠增刊“业余信箱”的解答工作,占了很多时间,所以读书问答的稿件,写得越来越少。但是这个专栏需要每天发稿一篇,如果让辰夫一人负责,实在太紧张。而且,他也只适合于撰写有关社会科学的题材,在哲学、文学方面就不大相宜。尤其是对文学,读者很有兴趣,提出的问题广泛而复杂,非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不能解答。于是辰夫同我商量,将参加左联活动的夏子美调来工作。因为辰夫左的色彩比较明显,由他提出,怕引起疑虑,把事情弄僵,就嘱咐

我出面向李先生推荐，然后他再去同李说。我就照他说的去办，不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同李一说就成功了。后来李先生对辰夫说，我知道夏子美是你提出的，你直接同我说好了，何必多转一个弯，看别人作曹丘呢。所以后来李崇基参加工作，就由辰夫直接推荐。除了夏、李之外，还有两位社联的同志也参加过这个工作，不过他们不久就因事离开，事隔多年，他们的名字我也忘记了。

夏、李二人参加以后，《读书问答》的工作开展得比以前更加活跃，社会科学、哲学、文学分别由柳、李、夏三人担任。夏、李两人在《读书问答》上的署名都用他们在馆中名字的一个字。李公朴一直不知道夏子美就是夏征农，李崇基所用的“艾思奇”名字，馆中同事大都知道。他们三人曾将在《读书问答》上要写的稿件各自作过比较系统的计划，陆续写作。后来他们把在《读书问答》上开始而在《读书生活》杂志上继续完成的这些作品，汇集起来，各自编选成为一本专书，柳辰夫的书名叫《街头讲话》，李崇基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大众哲学》，夏子美好象也有一本，但叫什么名称，我已记不得了。

五、《读书问答》停刊和读书指导部解体

《读书问答》在社会和群众中引起的反响，总起来说是拥护和称颂多于反对和诋毁，特别是在工商界青年职工中，赢得广泛的拥护。但是在申报馆内部，却是不满的人多于赞成的人，产生了一些流言蜚语。这些自然会传到申报主持人史量才的耳中。不过史量才对于申报的编辑方针却不象实际负责报馆的人那样保守。他希望这张报纸有所改革，有所进步，同时对于李公朴先生也没有政治上的顾虑，因为他知道李是国民党员。所以在李公朴将《读书问答》

的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之后，他不但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而且还对这项工作予以一定的支持。

单是报馆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对于《读书问答》的影响还不小，成问题的是官方的破坏和打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在上海实行图书报刊审查。《读书问答》专栏开辟之后，立即引起审查官员的注意。起初他们向编辑部提出警告，还没有任意删节或扣发稿件。后来就挑剔得愈来愈厉害，态度也愈来愈恶劣。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写稿人煞费苦心，字斟句酌，不让对方捉住把柄，就是李公朴先生也化费了很多心血和气力来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他要不断地对史量才做工作，争取他的谅解和支持；不断地向报馆编辑部的负责人作耐心的解释，取得他们的同情；而且还要同那些审查官员进行持续的、各种形式的说理斗争。除此之外，他还要安慰我们这些人，希望不致挫伤我们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李公朴先生在这些方面所表现的不屈不挠，为着一种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以及在这些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机智灵敏和坚韧不拔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提高，极其迅速而明显。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也就是读书指导部刚创办的时候，他所希望的是通过职工的业余教育或职业教育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借以改善他们的地位和处境，他的理想在实质上还是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在政治上，他反对国民党独裁，但向往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他曾经叫我给《申报·本埠增刊》写一系列的鼓吹民主的短论，大概他以为我在大学是学政治学的，写这类文章应该驾轻就熟，谁知适得其反。我当时有一种过“左”的糊涂思想，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口号，对于它不但轻视而且厌恶，所以，虽然

接受他的意见，写了几篇，却是有气无力，后来索性搁笔不写了。对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而李先生则从旧民主主义开始，通过社会实践迅速提高认识，不久就跳出了这个陈旧的框框。

他的这种进步是同柳辰夫、夏子美、李崇基等同志的帮助分不开的。每一次《读书问答》刊载的文章发生问题受到反动派干扰的时候，李先生总要同读书指导部的同人特别是作者谈话，或者研究对策，或者叙述斗争的经过，进一步考虑我们的主张是否正确，探索官方反对刊载这些文章的目的和作法，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反动派的面目。李先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就是不论处境如何困难，官方的压力如何重，只要他认为他所维护的事业是正义的，他就决不气馁，总会千方百计地捍卫他的事业。

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在外部的摧残打击和内部的造谣中伤之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的因素，首先是李公朴先生全力捍卫这两项事业；其次是史量才没有被反对派种种诽谤非议所动摇。他是申报馆的老板，在报馆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不反对，旁人也就无法取消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专栏。

反对派在史量才面前散播的流言蜚语，我不清楚，在李公朴面前对读书指导部工作人员的诋毁，有两桩事我印象很深。一桩是关于夏子美的。有人曾对李说，读书指导部中有左翼作家夏征农在内，李公朴极力否认，因为他并不知道夏子美就是夏征农。其实就是他知道这两个名字只是一个人，我想他也决不会因此而改变态度。另一桩是关于我的。柳辰夫告诉我，申报馆的陈彬龢有一次到流通图书馆拜访李公朴，看见了我，就悄悄对李说，要当心防范，因为他在一个左翼组织中曾经几次见到我。陈说的话也不是毫无因由，因为在一九三二年，社联的韩托夫同志曾经约我一道参

加苏联研究协会的成立会，我们并被选为协会的干事，干事中除了少数左翼作家和教授外，其余大都是上海文化界名流，陈彬龢也在内，只有我是青年学生。后来开过几次干事会，我也参加，大概因此引起陈彬龢的注意。但是李先生却并不因为陈的谰言而对我有所疑忌。至于对柳辰夫，谗害他的就更多，而李先生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日益增进。

可是厄运终于到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人谋杀，申报馆内发生了很大震动。谋杀者和谋害原因在当时是很明显的，人人都看得出，无非是《申报》得罪了国民党当局。申报馆中人检查下来，认为《申报》得罪当局主要是由于：（一）《自由谈》副刊一度刊载过许多进步作家如鲁迅等人的文章；（二）社论中有过一些批评当局不抵抗日本侵略的言论；（三）《读书问答》刊载了为当局所不满的文章。前两项已经过去，只有第三项是当时同当局摩擦最多的事项，于是《读书问答》成了罪魁祸首，据说有人甚至将它作为史量才被刺的唯一原因。当然这是个别人过甚其辞，但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读书问答》要象原来那样不屈不挠地会同审查官斗争之中生存下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自动改变态度，力求平稳，讲些无关痛痒的空话，不但为读者所不满，就是李公朴也决不会赞同。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面临着前途抉择的最后关头。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时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这两项事业在群众中已经建立起一定的声望，获得很多工商业青年从业员的拥护，具有独立自主、自成一局的条件，不一定非要依附在《申报》这个躯壳之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因而不久，以李公朴为首的读书指导部工作人员就创办了一个新杂志——《读书生活》。它不但将

原来《申报》的《读书问答》搬迁过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开辟了更广阔的园地。发行不久，就成了销路很好、风行一时，很受读者爱好的刊物。只是我没有参加这个刊物的工作，关于它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陶行知二十六国行*

杨 明 远

一、国民外交使节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通栏消息，大标题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联、美国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陶先生对该报记者说明此行的目的任务：“我特别注意的是向会议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变中国的实践。”陶先生又谈到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后，准备作世界旅行，以进一步达到上

* 根据陶行知海外工作日志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记载：“统计二年来之行踪：五次进英国，七次进美，六次进法，四次进加，三次进比，三次进德，三次进锡兰，二次埃及，二次印度，二次新加坡，一次墨西哥，一次爱尔兰，一次捷克，一次荷兰，一次瑞士、奥、匈、保、南、希、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地、爱登、安南、柔佛、意大利、香港。”解放后陶宏整理陶氏日记，编写成：《陶行知出访廿八国日志》，实际上香港和巴勒斯坦均为地区，故作“二十六国”。——作者附记

述的目的任务,尤其是要“唤起侨胞参加救国运动”。当时陶先生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的委托,乘出国之机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反帝,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赞助,所以当时进步人士都说陶先生是“国民外交使节”。

出国前夕,陶行知在香港和他的亲密战友邹韬奋,对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作了修改,两人先行签字,然后由韬奋持至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作最后修正,七月十五日四人联名发表。八月十日得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这两个文件的发表,代表了亿万爱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起了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作用。陶行知后来在巴黎全欧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关于团结御侮的“再度说明”,引起广大华侨的热烈反响。

热心为中国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家陶行知,当时作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领袖,作为全国救国会的代表,满怀救国热情,肩负起国民外交使节的重任,走向世界,行迹遍及欧美、亚非二十六国,目的是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二、在欧洲参加一系列国际性会议

世界新教育会议与一般教育会议不同,是对教育事业持有新信念的人交换意见和进行研究的国际性机构,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新世界的一种工具,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因此这一会议讨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教育。

陶行知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十四日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这次会议共有五十余国代表参加，中国被邀请的教育家共三人，陶行知是其中之一。^①在会上，陶先生报告了中国大众教育与救亡运动的实况，着重介绍了工学团与小先生制在运动中的作用，引起许多代表的注意和赞赏。

九月初，陶行知和钱俊瑞、陆瑾在日内瓦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后，立即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各国代表到会的有四千九百余人，中国代表团公推陶行知为代表团主席，并决定由陈铭枢、陶行知、王礼锡、胡秋原四人参加大会主席团。陶行知还参加教育组会议，钱俊瑞参加青年组讨论，其他代表都参加分组讨论。陶先生向世界拥护和平的人士报告日本破坏和平与我国民众为拥护和平而反抗侵略的救国运动，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赞扬与同情。

大会结束时，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他又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一封致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书：“为使国际和平会议在远东更有效的发展，以及使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与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分会有以联系。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大会结束后，陶先生又和钱俊瑞、陆瑾等于九月十二日到达巴黎，受到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陶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怎样才可以救中国》。他说，我们首先要

① 另有南开大学的张彭春和中山大学的崔载阳，崔因事未赴会。

问谁是危害中国的敌人？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五年来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几千万同胞受剥削被奴役，强调指出“要救中国，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抵抗。”“抗日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经济抵抗，第二是文化抵抗，第三是武力抵抗，三者要并行。”他还提出，要建立联合战线，要有三种联合。第一是国内联合，最主要的是国共要合作。第二，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受日本军阀压迫的，我们应当和尊重民族平等的日本人联合起来。第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也要联合起来。他的这些讲话，引起听众的热烈鼓掌。

“九·一八”五周年时，前来参加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联合大会的欧洲各国华侨代表团聚集在巴黎，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会。在巴黎中国学生会举行的纪念会上，陶行知和陈铭枢、吴康、钱俊瑞等都发了言。陶先生讲话时特别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在布鲁塞尔世界和平大会和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曾提议建立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制度，以保障东亚和平。他的讲话使海外侨胞得到很大的鼓舞。据巴黎《救国时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卅日报道：“自从国内抗日救国团体派赴世界和平大会及世界青年大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陆瑾到欧后，即竭力鼓吹建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之总机关，一时各国侨胞纷纷响应，乃由陶行知、王海镜、胡秋原诸先生于八月廿四日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侨胞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致，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后来又报道：“陶先生及英、法、德各国侨胞在巴黎举行筹备会，负责邀请各国侨胞选派代表来法出席并起草各项章程及文件，筹备一切事宜。”同年九月廿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正式开会，到会的有欧洲各国

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四百余人,还有不少侨胞函电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与拥护。这次大会表明旅欧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的伟大团结,盛况空前。陶行知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大声疾呼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并结合十二点说明朗诵了十二首小诗,非常生动而有说服力。大会着重主张南京政府应立刻停止“剿共”军事行动,由人民救国团体隔断双方阵线,互派全权代表,负责谈判停战和抗日协定,同时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救国联席会议,协议救亡政策及具体办法。

三、在美加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陶行知从英国出发赴纽约,在美洲访问了一年半,大部分时间是唤起华侨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同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援助,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陶行知抵美后,访问了许多华侨组织和学校,介绍中国的青年运动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国必胜的道理。当时美洲华侨组织复杂,各立门户,常有纠纷,甚至发生自相残杀的“堂斗”,有一年“堂斗”死了六、七十人。通过陶先生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说服帮助,终于使他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许多城市的华侨成立起抗日救国会,开展义卖捐献活动,推行救国公债。

在此期间,陶先生到处奔波,参加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有时还教救亡歌曲,组织华侨歌咏队。在陶先生促进下,一九三七年继“旅美华侨统一捐献救国总会”成立之后,又组织纽约华侨举行万人游行。最令人感动的是有些华侨领袖从前因政见各异,互不

团结，此时在救国活动中变成了亲密兄弟，坐在一起开会办公，共同战斗。陶先生在回国后的一次报告中曾说：“美国新华侨是从旧的背景里活跃出来的，好比是新生的孩子，我也可算是接生婆之一。”又说：“新华侨的努力救国，不但是美国如此，我所到的各国，同胞们都表现相仿佛的精神，这是可为祖国庆贺的。”

陶先生一面充分运用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做争取国际友人的工作，一面动员华侨多交外国朋友，扩大国际影响。他告诉华侨，交朋友要把个人的朋友变为中华民族的朋友，这就首先自己要有抗战必胜的信心，才能起到国民外交的作用。在陶先生的倡导和鼓舞下，许多爱国华侨参加了国民外交活动的行列。最突出的是从事洗衣工作的华侨，在陶先生的启发指导下，用很多小纸片，印上“请不要买日本货”等内容，放在洗好的衣服口袋里，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陶先生后来还写了一首《衣联歌》勉励洗衣工人：“洗去中国的国耻，洗去世界的罪恶。……兄弟们联合起来，拿出我们的真本领！”当时华侨抵制日货非常认真，连小孩子都懂得宁可穿得破旧也不买东洋布，陶先生特为写了一首小诗：“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不买东洋货。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陶先生还和爱国华侨一道做码头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搬运军事物资到日本去，于是一方面大批日本货在美国卖不掉，另一方面码头上成堆的军用物资运不出去。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工头到美国，找了两个工会都碰壁，又去找旧金山码头工会领袖卜立哲斯，也受了一顿严厉的教训，垂头丧气而去。当时的中日宣传战，由于陶行知和进步人士以及广大华侨的共同努力，是打了胜仗的。

陶先生在美国从事国民外交，逐渐改变了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懦夫”的思想，转而尊重中国人。他无论到何处演讲中国抗

战情形，入场和出场的时候，听众都全体肃立，表示对英勇抗战的中国人致崇高的敬意。在演讲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反抗侵略，听众即一致欢呼，一致鼓掌，有如山崩海裂。^①当时美国各派都有人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日，但各不相谋，后来看到中国人团结抗战和华侨的联合，也经常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援华问题。

陶先生为了更好地说服美国人禁运军事物资支持日本，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和爱国华侨胡敦元、林霖、林雨苓等创办了“中华经济研究社”，对日本军用材料的来源及购买力进行研究，结果得知一九三七年美国运日军用材料占日本进口军用材料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从美国输入日本的废铁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九十点四。陶先生就用这些事实在各种集会上宣传，促进对日禁运。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洛杉矶五千人的集会上，陶先生又揭露“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在座的美国国会议员司各脱先生立起对听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站立，表示禁运决心。后来这个研究材料载入美国国会公报上，成为对日禁运的重要根据。

一九三八年三月，陶先生第四次到加拿大访问，从东到西，沿铁路线到处演讲、广播或座谈，或教救亡歌曲。四月十四日，在华侨集中的温哥华市，由加拿大医疗界援华会主持召开大会，陶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首先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感谢他们募捐和征集医疗物资，派人支援中国人民作战，然后

^① 这些事例均见陶行知《新华侨之出现——在美国所见》。

介绍中国人民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当时温哥华市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曾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汽车上的炸弹模型上面写着：“不要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加拿大的妇女团体也上街宣传禁运军用材料到日本。这次访问加拿大，历时一个多月，对加拿大人民和华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他本人演讲的门票收入和华侨捐款都寄给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托宋庆龄买医药用品转交白求恩医疗队。解放后，加拿大进步人士来华访问时，还提起陶行知是中加人民友好的第一个使者。

四、联合旅外华侨及国际友人，营救“七君子”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七人在沪被捕，海内外爱国同胞和国际友人大为震惊激愤。世界和平理事会曾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分会委员沈钧儒等被捕提出抗议。一九三七年初，陶行知在美国和冀朝鼎、陈其瑗、胡秋原、柳无垢、陆瑾、李信慧等三十三人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及马相伯先生运动，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南京政府镇压抗日救国运动，并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释放爱国七领袖，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返沪；二、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与义务；三、立刻对日抗战，切实保障人民救国运动。并征得华侨三百多人签名赞同。

陶行知等还在美国联络知名学者、教授发起援救，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初致电南京当局，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表示严重关切。署名者有约翰·杜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姆·大卫斯、路易·克伦、保罗·孟禄、保尔德·罗格等十六

人。

南京政府坚持反动立场，不顾广大爱国人民的反对和国际友人的声援，悍然于四月三日由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所谓“危害民国罪”罗织十大罪状，提起公诉。所列被告，除上述七人外，又加上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七人，并对陶行知明令通缉。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地救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陶行知远在美洲，虽遭再次通缉，但意志愈益坚定，尽心竭力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活动。五月二十四日曾借用郑板桥的两句诗，手书一条幅寄回国内：“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明心志并勉励亲友。

五、结合社会活动，宣传和实践教育主张

陶行知先生既是杰出的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又是世界闻名的大众教育家。他把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结合在一起，反对脱离社会死读书。

他到美国后，半个月内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了三次。十一月二十一日对该校师范学院讲演《中国之新教育》，列举事实，阐明什么样的教育可以救国，学校怎样办民众教育，介绍他所从事的新教育——救国教育。他到处参观华侨学校，向华侨宣传，动员团结御侮，支援祖国，进行最实际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他到墨西哥访问，曾向墨西哥学校讲《创造的教育》，介绍了小先生制，受到热烈欢迎。在刚入境时，“曾受官方的留难”，经过他对各方面的引导，后来受到热忱接待，墨西哥总统还专门约期接见。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午宴上发表告别词，提出三点希望：（一）希望墨西哥与中国结成兄弟；（二）希望停止以

武器军火供给日本；(三)希望停止以港口供给法西斯国家使用。可见他的演讲既是社会活动，又是教育活动，对听众进行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教育。

陶行知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他的演讲内容丰富，语言生动，饶有风趣，很能吸引听众，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他在海外到处访问、讲演、座谈、参观，实际上也就是在实践并发展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通过他的活动，广大华侨在社会大学学校里，在开会、座谈、唱歌、捐款、游行、交朋友等等活动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救国教育和创造性的大众教育。

六、三次瞻仰马克思墓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陶先生离美回国，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形势比较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和陶行知等也被推举为参政员。陶先生经过伦敦时，向爱国侨胞介绍了美国侨胞抗日救国活动情况。六月二十五日，他特地邀李信慧（原在美留学，和陶氏一同回国）一同去拜谒马克思墓。这是两年来他第三次瞻仰马克思墓了。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拜谒回寓后特地写了一首小诗《马克思墓》，内容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①，小坟葬伟大。”短短四句诗包含着无限的真情实意，表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赞扬。

第二次瞻仰马克思墓是和吴玉章同志一道去的。吴老所写《回忆陶行知先生》文章中有一段，说：“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们一同出

^① 马克思墓穴编号是24748。

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的时候，一同去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我们在一片荒冢里，找寻了几遍，才发现恩格斯所题的墓志，而惊叹这一旷世伟人的墓竟这样平凡。这象征着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死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才是真正的伟大。这和陶先生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是相符合的。陶先生崇拜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吴老和陶先生在欧洲、在四川重庆有多年交往，他对陶行知崇信马克思和辩证唯物论的评论，决非过誉。

陶先生离英经过柏林时，受到爱国华侨热烈欢迎。“七·七”抗日一周年，他向华侨作了长篇报告，讲了七·七的意义，介绍了美国华侨由分裂而联合，一致从事救国运动的情况，揭露了日本宣称“中国赤化”，妄图孤立中国的阴谋，特别强调：“抵抗到底，必定胜利！”七月十四日途经巴黎，适值法国国庆，陶先生和爱国华侨、国际友人一起参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游行。当时在巴黎的中国音乐家任光和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纵队的中国革命志士张纪以及李信慧等，都参加了游行。

七月廿四日夜晚，陶先生到达开罗，受到爱资哈尔回教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在卅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是他的学生，他带领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陶先生说：“谁也不曾想到在古老的沙漠国度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这太使我感动了”。爱资哈尔大学是世界古老的学府之一，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于祖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解放，都怀有最热烈的期望。陶先生了解到他们也在尽力为抗日救国出力，从仅能维持生活的费用中抽出钱来进行爱国宣传，利用开罗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深表宽慰，并加鼓励。他还了解到在埃及的华侨，

组织过战区灾民救济会，发动捐款和购买救国公债，又多次印发传单，劝告伊斯兰教教徒起来抵制日货，在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日。对此，他十分感动地说：“这些教徒所表示出来的爱国精神，是多么好啊！回汉两族的隔阂是消除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在船上还组织了一个歌咏团，请任光教唱救亡歌曲，每日四时半教歌一小时，船上四十多个中国人，团结一心，怀着满腔救国热情投向祖国怀抱。

七、访问印度、新加坡和越南

陶先生回国途中访问印度，是应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的邀请。他于八月八日到印，十二日抵加尔各答，访泰戈尔，谈一小时饮茶而别。当日受到全印大会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代表的欢迎。十四日下午从迎宾馆出发，到谢岗甘地住处，两人席地而坐，谈了两小时多。甘地在谈话中曾向陶先生了解中国普及大众教育的情况，并约陶氏撰写文章。二十二日陶先生在轮船上草拟《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一文提纲，九月九日陶先生在香港用英文写成文章寄甘地，甘地将它发表在《贱民》周刊上，并亲自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印度访问我时，我曾邀请他送一份中国进行大众教育运动情况的小册子给我。如今他已经送给我，不得不认为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对我们印度是非常有用的。”由此可见，甘地对陶行知关于大众教育的主张和经验是多么重视。

当时印度正在组织援华医疗队，陶先生在印度访问了两星期，亲身体会到被压迫的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多么真诚。回国后在武汉至重庆的轮船上，正好遇到印度救护队，陶先生和他们亲密交谈，还教他们十课新文字，对中印

人民友谊的增进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的华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曾听到陶先生出国后所作的第一次讲演。这次回国经过新加坡，有许多青年朋友热情地列队唱着救亡歌曲欢迎他。朋友们告诉他华侨竭尽全力抵制日货，如果有人贩卖日货，就要受到处罚，大商店就罚款，充作救国金，小商贩教育不改，就要割下一只耳朵。陶先生说：“耳朵割了不能再长，这个做法要改正。应该用火热的救国热情去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研究贩卖别的东西来代替日货，那就更好。”他的开导帮助了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加强团结。

陶先生离开新加坡于八月二日到达越南西贡，当即访问华侨团体。次日在中国戏院演讲，向侨胞们报告欧美华侨团结一致开展救国活动的情况，受到热烈欢迎。八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有一段记载：“旅越侨胞季玉堂与张长有十一年失欢，昨夜听我演讲旅美华侨曾因意见不合而暗杀械斗，今则和好，令二人感动颇深，因此接吻联欢，和好如初。”又记载有华侨节省菜金捐助抗日，推销救国公债二百万元，以及不卖大米给日本等等。

八、在香港会晤邓颖超，发表“回国三愿”

陶先生于八月三十日回到香港，第二天中午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欢迎陶行知与因公来港的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邓颖超。九月一日陶先生在青年会作公开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他首先热情赞扬四万万五千万人站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又分析了国际形势与大国态度，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人由被人轻视而变为被人敬佩，指出：“不能等待国际形势的根本转变”，“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

陶先生到港时，正逢各界同胞掀起献金救国热潮，其中以菜果、鲜鱼小贩义卖捐献最令人感动。陶先生曾为此写诗赞扬：“南海有义卖，高风可崇拜。富翁学穷人，中国不会败！”后来他还和蔡楚生、金山、李信慧等访问渔村和渔民小学，勉励小学生为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并摄影留念。

陶行知在港停留一个月，出席各种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讲话，宣传抗日救国。还对新闻记者发表了他的“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培养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创办港九业余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不久，中华业余学校在港成立董事会，陶先生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是黄泽南，校长是陶氏好友吴涵真，校务主任是方与严。这所学校后来在港九培养了不少进步分子，有些学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抗战与革命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十月一日，他回到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汉，受到亲密战友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热烈欢迎，并分别和蒋介石、周恩来、李宗仁等会见。他坚决谢绝了国民党当局许诺的高官厚禄，满怀救国热诚，下定决心，要为抗日救国大办抗战教育、救国教育，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继续为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王造时自述

王造时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曾经设想写《自传》，但只开了一个头。十年动乱中，他遭受迫害，继续写了一些材料，叙述一生经历，并作自我剖析。我们认为这些材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乃整理成文。为了尊重本人生前愿望，仍以《自述》为题。在整理过程中，得到先生家属和部分生前友好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希望了解先生生平的同志对我们整理的《自述》提出宝贵意见，并提供补充资料，以便在编写先生年谱和传记时参考。

何碧辉 赵寿龙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我是江西安福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八月三日。父名济善，字嘉美，号子泉（一八六九——一九四七），生前在安福县城木架巷经营竹木生意。大哥启瑞、大姐秀英是汪氏所生。我和二哥英生的母亲刘氏是继室。

我到八岁才跟朱廉夫老师发蒙。在发蒙那天，他替我取了“造时”这个富于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名字。这个名字对于少年时期的我有好的影响，亦有坏的影响。好的影响是鼓舞了我的雄心壮志，力求上进。坏的影响是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读了三年私塾，读的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但是老

师并没有开讲，只管点书，我只管死读书，死背书，所以孔孟之道那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有泛泛的印象。

就在读私塾的第二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君主专制，宣布了民主共和。我听说北京的皇帝老子被赶下台，看见家家户户都插起了一面写着一个大“汉”字的白旗，孙文、黄兴、李烈钧等人的传奇式的革命故事，从大人的口里传到我的耳朵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个大变动。民主共和的涵义尽管那时我不懂得，但是这个名词的种子撒在我的头脑里不可能不生根发芽。

辛亥革命成功了，民国建立了，再也不会再有科举了，要读书只有进学校。那时安福全县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在里面读书的两百多学生，大多数是三十左右的青年，还有好些个没有考取秀才的老童生。我读完三年私塾，考上了那所学校。学的是国文、历史、地理、格致、修身、音乐、图画、手工、体操，最后半年还加上了一门英文。在高小三年中，除了接受那套洋教育外，有三件大事对我的思想有影响。

第一件是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我已看报，看的是学校订的上海《时报》和《申报》。上海的报纸在英法势力影响之下，不用说是拥护英法方面，反对德奥方面的。把前者说成是为正义、人道、公理、民主而战，后者是讲强权、霸道、专制、野蛮的。因此我亦跟着同情、拥护英法方面，痛恶、反对德奥方面。尽管后来才知道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为帝国主义而战，但是正义、人道、公理、民主这些美丽的名词给了我不能磨灭的印象。

第二件大事是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乘欧洲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向我国提出了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袁世凯要做皇帝，想

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于五月九日除对第五条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当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激烈反对。我们这个高等小学也开了一次国耻纪念大会，由一位老师上台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全场师生无不为之感动。爱国主义在我头脑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痛恨卖国求荣的袁世凯，痛恨侵略我国的日本强盗。

第三件大事就是袁世凯的洪宪称帝。这个窃国大盗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还不称心满意，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居然粉墨登台做起皇帝来了。接着就是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逼得他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皇帝称号，六月气死于北京。梁启超那篇反对他称帝的有声有色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亦由国文老师讲给我们听了，民主思想的根子又深了一层。

高小毕业了，父亲原来有意要我帮助他做生意，但是恰好在这时候他受到土豪劣绅的欺负，几乎闹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于是，才决心设法让我出外升学，希望我将来能够扬名声，显父母。听说北京有个清华学校办得很好，基本上是官费，毕业后还可以留学美国。到了暑假，我就别离家乡前往南昌报考。清华是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而办起来的一所预备留美的学校，学制是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然后留美五年，一共十三年。每年中等科一年级招生是委托各省省政府办理的，然后到北京去复试。名额是按各省当年所担负庚子赔款的数目依照比例而定，江西每年分配名额约有五、六名。由于清华有特殊的待遇和机会，各省有权势的军阀、官僚、政客、学阀都想把自己或亲友的子弟硬塞进去。一九一六年江西省有

六个名额，我没有八行书的介绍，考了个备取第一名。我气坏了，我痛恨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平。幸而随即考取了南昌第一中学，预备下年再考清华。在南昌一年中，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思想有影响。那就是双十节那天，江西督军李纯为庆祝国庆到讲武厅去阅兵，文武官员都前呼后拥地跟着，把沿途的老百姓，连我们学生在内都赶到屋里去。我从门缝里窥看这些大小军阀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跑过去，老百姓连参加国庆活动的权利也没有，头脑里马上起了个大问号，这难道就是“民”国吗？

一九一七年暑假又到了，清华这次招考名额只有五名。我准备了一年，好不容易给我考取了。这是我一生的关键，这样一来，我就连续接受了美国资本主义教育十二年 and 英国资本主义教育一年，这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起了主要的作用。到了北京，一进清华校园，我这个土包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一个洋学校，也梦想不到有这么一个洋学校。这简直是一个大花园！堂皇的大礼堂，富丽的图书馆，雄伟的体育馆，整齐的科学馆，水木清华的工字厅，宽敞的课堂和寝室，大片如茵的草地，宽阔的运动场，高低的小山，平静的小河，幽雅的荷花池，杨柳成荫的马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所凝结成的。课程设置除了小部分关于本国文、史、地、哲的功课是用国语教学外，大部分功课都是用英语直接教学的，从而使高等科毕业后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能插入美国所谓第一流大学的二年级，学社会科学的能插入三年级。

五四运动以前，清华留美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后，学社会科学的才多起来。教师中多数是留美的，也有不少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校园却只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的家庭，很难找到工人和农民的子弟。我初入清华，不仅欣赏这种奴化、洋化教育，而且觉得自己能够享受这种特殊教育机会是一生的幸运。经过五四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我才逐渐地认识到清华有大事改变的必要。我为学生会写了一本名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①的小册子，主张改组原来由中国外交部代表二人和美国驻华使馆代表一人所组成的校董会，改为完全由教育部所聘请的教育专家所组成的校董会，把清华改成国立的、正式的、完全的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多收学生，多造人才；留学办法可以继续，但须举行全国公开考试，选拔大学毕业生，不应由清华包办，留学年限缩短为二、三年；课程应增设专门科目，尤其应重视有关本国文化的科目；原有师资不能应付正规大学的需要，须聘请专门学者担任教授。这些意见经学生会讨论修改通过，作为代表全体学生的建议，促请当局采纳施行。同时社会上和教师内部也有类似的舆论，于是清华便由预备留美学校性质，逐渐过渡到正规的完全的国立大学了。这种改制完全不是所谓“翻腾的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招收的学生仍然是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儿女，工农子弟仍然被拒于校门之外，师资、课程、教材、设备以及其他种种方面，仍是效法美国大学那一套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五四前，清华学生只有级会、班会，没有全校性组织，五四后，学生会诞生了。学生会的组织，模仿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分立制度。有由各级依照学生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评议会，等

① 《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写于1921年10月；1923年6月《清华周刊》增刊又登载王造时的文章《改良清华计划大纲》。（整理者注，下同）

于立法机关；评议会推举一人为主席，职权很大，等于学生会的主席。有由评议会选举的干事会主席一人和各部正副部长，等于行政机关。有由评议会选举的法官若干人，组成学生法庭，得审判记大过以下的错误行为，并实行陪审制和律师辩护制，等于司法机关。我在学生会活动中非常得意，连任评议会主席和干事会主席，因此很欣赏这种具体而微的资产阶级民主法治。

在清华读书八年，我深深受到美国资本主义教育的感染，但同时参加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三大运动不但对中国革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我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因于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平会议不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归还我国，而把这些权利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北京学生感于德、奥、俄三大帝国的崩溃，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受到世界革命形势的鼓舞，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发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吼声，举行示威游行，并对勾结日本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采取了革命行动，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立即由北京燃遍了全国各大城市。清华与北京各校采取一致行动，举行罢课，成立全校性学生组织，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进行各种爱国活动。运动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反动当局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曾经采取高压措施，都无效果，决定于六月三日开始大逮捕。各校学生得悉之后，决定分批出发，准备前赴后继入狱。我参加了第一批，带领一个小分队到东安市场宣传演讲，当即被捕。六月四日各校第二批学生出发，遭到同样命运。六月五日各校学生就全体出动，反动当局捉不胜捉。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至此便由学生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

汉、九江、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成为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北京反动当局迫于这种形势，只好接受学生各项要求，并将逮捕的学生释放。七月间，山东军阀马良枪杀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济南、天津和北京各校学生组织代表团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惩办肇事官员。我代表清华参加，又被拘捕。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爱国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尽管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但我爱祖国、爱民族的心永不会变。谁侵略我们的国家，不管是日帝也好，英帝也好，美帝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我就反对谁。谁出卖我们的民族，不管是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汪精卫也好，蒋介石也好，我就反对谁。但是我现在深切地体会到，我还必须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范围，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做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做一个国际主义者。

如果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那么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它一方面反对旧教条、旧道德，提倡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反对文言文、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它粉碎了几千年来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当时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介绍各种主义、学说和思想，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新青年》杂志。我受到新思潮的感染，亦在《清华周刊》、《民国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摇旗呐喊拥护。后来这个运动起了分化，有左右两种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为代表，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另一种是右的倾向，以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为代表，主张所谓好人政治。

清华图书馆订有《努力周刊》和《民国日报》，至于《向导》周报不但学校没有购置，就是北京各书店也不出卖。清华是同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化的、贵族式的学校，教职员、学生中没有共产党员的活动。校址在北京西郊，自成小天地，脱离实际政治斗争。由于这种种原因，我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机会，跳不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摆脱不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也不可能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左右，我在清华学校还组织过“仁社”，以联络友谊，砥砺学行为宗旨，在清华学生政治运动中起了些作用。社员有王国忠、贺麟、彭文应、林同济、陈铨等十余人。一九二五年我留学美国，仁社随即无形解散。总之，我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我是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和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有下列三件事情可以说明我这个时期的思想情况。

(1) 一九二三年清华举行庆祝双十节国庆大会，特请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梁启超演讲，题为《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他强调指出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要负重大责任。我听了非常气愤，认为他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随即在《清华周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梁任公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开头和结尾都是用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①根据历史事实，我揭露他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变为勾结北洋军

^① 此文登在《清华周刊》第292期(1923年11月)。开头的原文是：“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的梁任公先生。”结尾原文是：“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阔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他和他所领导的派系要负重大责任，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倒不能不归功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进而论断他是政治上的落伍者。当时国民党有一部分党员在北京办了一个《时言报》，发现了这篇文章，便把它在第一版首要的地位，加了按语转载出来，并用特大号标题，名曰《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梁任公知道后，气急败坏地向清华校长曹云祥辞去讲座，曹云祥三番四复地把我叫去，要我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前去向梁任公赔罪道歉，否则就要以侮辱师长名义将我开除。我说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但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任公可以谈论国事，我也可以谈论国事，梁任公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亦可以批评梁任公和研究系，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曹云祥以我在学生中有相当影响，怕问题闹大，终于不了了之。梁任公随后不久也就离开了清华。再过十年（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我征文，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题为《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的短文。末了一段是全篇的主旨所在，大意说：这篇短文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东方杂志》编者怕国民党反动派找麻烦，竟把这段删去了。我立即提出抗议，要求下期刊出全文，并表示道歉。结果是第二期发表了一则启事，声明未经作者同意删去了最后一段文字，致与原意有所未合，特向作者致歉。

(2) 一九二四年，我以清华政治学会的名义邀请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演讲。事后美国校董贝克大为不满，吓得中国校董和校长惊惶不安。曹云祥这次又叫我去大加训斥，说事先不经学校同意就胆敢做出这种事情，你是不是“过激派”？（这是当时布尔塞维克的译名，在北京很流行）我说我不是“过激派”，还够不上做“过激派”，清华各个学会邀请包括许多美国人士在内的校外名人来校讲演，都未经学校同意，为什么请苏联公使演讲就要学校批准呢？曹云祥以事关外交，亦不了了之。

(3) 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由旧三民主义变为新三民主义。同年冬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原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吴佩孚，电请孙中山入京。孙中山应邀北上，行前发表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但不幸于一九二五年春病逝于北京。我在《清华周刊》发表《笔血墨泪以吊中山先生》一文^①，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此重要关头，哲人凋谢，实为国家巨大损失，真使人有革命未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当时汪精卫正在北京，我以清华政治学会名义请他演讲，他的演讲大受全体同学的欢迎。不料就是这个在前清末年以行刺摄政王而出名的汪精卫，这个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竟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叛变革命，并伙同蒋介石策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又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重庆，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公开投降日本帝

^① 此文载《清华周刊》第340期（1925年3月15日）。

国主义，组织南京傀儡政权，充当了头号汉奸，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由此可见，谁要背叛祖国，背叛民族，反对人民，反对革命，谁就要受到历史的裁判。你可一时欺骗人民，你不能永远欺骗人民；你可一时欺骗一部分人民，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

一九二五年当我在清华高等科快要毕业的时候，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如果五四运动和与之而俱来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的开展，那么五卅运动就为北伐革命战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五月间，青岛、上海各地日本纱厂先后发生罢工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竟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八日反动当局又屠杀青岛工人八人。三十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随后有群众万余人集合在英租界捕房门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竟悍然开枪打死打伤许多学生和群众。这就是有名的“五卅惨案”。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的反帝爱国热潮立即由上海席卷全国各重要城市，形成极大规模的五卅运动。北京学生闻讯立即组织各校沪案后援会，领导各种反帝爱国活动。我代表清华参加，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①。随后又被派往武汉调查该处惨案，并要求湖北督军萧耀南开放爱国运动。萧看到报上纷纷报导我到武汉后的活动，以为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是教职员和学生的联合组织，欣然接见了我。但一看到我年纪很轻，正在惊奇之际，我

① 清华学生会主编的《上海惨剧特刊》，从1925年6月8日开始至6月底，共出十二期。

劈头就说,现在全国舆论都说萧督军不爱国,压迫爱国运动。他急忙辩称爱国之心决不后人,就是怕游行示威,共产党从中捣乱。我说中央不怕,各地都不怕,就是萧督军怕了而禁止爱国运动,这样就要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公愤,实属不智。他说那么我明天就出布告,声明保护爱国运动。于是第三天武汉学生就举行了极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

八月,我由上海经过日本到了美国。在西雅图上岸,就接到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举行的全体留美学生年会的电报,要我去报告五卅运动。我赶去报告后,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宣誓献身于救国事业。大会结束后,我即往威斯康星大学办理入学手续,学的主科是政治学。我深切感到五四以后参加政治活动太多,读书太少,决定在留学期间不参加党派活动,埋头好好读几年书。特别自国共分裂,南京反革命政权投靠帝国主义,并大打其内战之后,我对国事前途越来越感到失望,亦就越来越钻入书堆里。每年暑假的三个月则入芝加哥大学。因此只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的书本知识,而没有机会去领会被剥削阶级的真实生活;只懂得了一些抽象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的原则,而没有深切理解这些东西的阶级本质;只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而没有认识它的实际内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找来找去,找到一些过了时的东西,而形成了下列一些对于国事的看法。

(1) 中国必须独立和统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对内亦没有获得真正的统一。要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欲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倡爱国主义,唤起全国人民,以民主革命的方法,把中

国统一起来。军阀式的武力统一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失败了，蒋介石亦不可能成功。

(2) 中国必须是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必须把中国建成为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国家重要机关的组成及其职权。人民享有普选权，由下而上地产生各级代表机构；行政机关应直接或间接向人民负责；法律必须由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讨论通过；必要时，人民可以依法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认为事实上国民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实行一党专政，不仅违反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而且必然是此路不通。人民须有组织政党的自由；各党地位平等，并享有合法权利。

(3) 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人民应该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通信等自由，严禁司法和警察部门以外的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的行为。反对国民党各种特务机关的非法、恐怖行为。

(4) 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另一标志。国家必须颁布由立法机关讨论通过的重要法典，以确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必须实现法律不追溯既往和被告不负举证责任的两大原则。司法机关应独立，不受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干涉，法官任期应有保障，审判必须公开，并采取人身保护状制、陪审制和律师辩护制。

(5) 军队国有。军队应由人民产生的民主政府所掌管，作为捍卫国家、保护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保有军队，作为政争的工具。反对军人干政，现役军人不得兼

任行政官吏。

(6) 社会主义的经济。我当时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给了人民以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容易变成为虚伪的东西。垄断资本可以操纵一切宣传工具，影响选举，产生代表它的利益的国会和行政机关首要人员。同时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和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认为苏联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共产党一个党的专政，不符合全民政治的原则，造成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苏联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但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上的平等。大权在手的领导干部和具有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的教授、专家、工程师们享受很高的工资和特殊的待遇，容易形成特殊阶层，等于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是我要到英国去留学并研究费边社会主义的原因。在留学美国期间，我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认为以中国这样极其落后的经济和极其微弱的私人资本，要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赶上美、英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它们竞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种种罪恶的后果，从社会主义上看亦是不足取的。

(7) 科学的文化。美国各大学、各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所设置的科学研究机构不可胜数，科学的发明和创造层出不穷，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涌现，工业、商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的进展日新月异，这与抱残守阙的封建主义文化形成一个极其强烈的对照。要使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把外国的科学知识尽速地介绍进来，并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整理、批判我国固有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

一九二九年夏游历美国一些大城市以后，八月间我就由纽约到了英国，入了伦敦经济学院，作为研究员，跟拉斯基学习。拉斯基是当时国际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家、费边社的社员、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后来担任过英国工党主席。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在英国一年中，除跟他研究外，就是埋头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也就是马克思寄居伦敦时所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我所钻研的主要对象，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费边社会主义。结果是没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误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邪路。

费边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呢？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号称是“渐进的社会主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最好采用一步一步的方法，迫使资产阶级一步一步后退，逐渐地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它认为随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及，民主权利的扩大；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增加，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工人阶级组织的增强，从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随着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发展和强大；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和深入人心；随着资本主义弱点的揭发和暴露；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而社会正义感即所谓社会良心的扩大，工人阶级的政党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逐渐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以至于最后取得政权。工人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根据科学调查研究的结果，逐渐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到最后成为一个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所享的社会主义国家。拉斯基认为资产阶级被迫可能让出一个又一个的前哨阵地，但让到核心堡垒时，它是会用武力反击的，因此分析到最后，他亦不否认工

人阶级应有革命权。

英国工党发展的历史亦使我对议会道路发生了幻想。工党在十九世纪末期还不过是只有十几个议员的小党，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已经成为两大党之一，而自由党则由于向左右分化，变成了小党。当一九三〇年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英国的时候，它便与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我根据费边社会主义这套理论、英国工党发展历史和英国的议会制度，对照我坐井观天所看到的所谓中国实际情况，于是又产生了下列一些想法。

(1)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只有两百万左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具备。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渐实施社会主义。

(2) 怎样逐渐实施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全国工商企业应分为下列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分为三类：(甲)国营农场；(乙)集体农场；(丙)个体农场。随着国家机构的健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各行各业及该企业单位的具体情况，贪污的根绝等等条件，经过科学调查研究，逐步地由(丙)类上升到(乙)类，再升到(甲)类，以达到一切工商业和农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即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

(3) 在政府组织方面，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要比美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的总统制好得多。主要的好处有三：第一，比较能反映民意；第二，政党的责任分明；第三，工作效率较高。中国应效法英国的办法。

(4)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英国行的是单一制,美国行的是联邦制。中国几千年来行的亦是单一制,从社会主义要求有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的观点看来,也不应采取美国式的联邦制。

(5) 什么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亦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而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研究,看问题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答案,在我的糊涂思想里隐约地认为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领导。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永远不会成,我的一生就是一个活的见证。

我花了五年时间,用了大笔公款,在英美学了一些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东西,以为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同时实施所谓“渐进的社会主义”,真是白日作梦。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切。

当我快要回国了,一九三〇年国共早已分裂,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也早已开始。一九二七年有桂系与唐生智的战争,有李济深与张发奎的战争;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有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一九二九年有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蒋、冯、阎三派的战争也正在酝酿中。国际形势亦在世界经济总危机高潮时期,正朝着帝国主义战争方向剧烈地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我在伦敦遇到了江西第一中学同学CC派罗时实,我回国前后,他和周利生

(我小时的私塾老师，亦是C C派)极力劝我到南京去做官，我拒绝了。但是回来做什么呢？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条路摆在前面。第一条是革命的路。毛主席正在离我家乡不远的井冈山闹革命，要去很方便，但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受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条路到南京去做反动政府的官吏。事实上，C C通过它派来英国留学的罗时实已经同我接洽过，要我回去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由于我对南京反动政权的不满和自己要发表所谓“政论”的打算，这条路也是不愿走的。剩下的第三条路只有到大学去教书，凭我的学历、学位，凭我的清华同学关系，这种机会是不难找到的。但是教书亦有两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教书？在国立大学抑是私立大学教书？清华和北大是理想的教书地方，如果以教书为终身事业，那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是我要谈政治，发议论，北京离政治中心太远，不方便。到南京去教书吗？中央大学是C C系控制的，官气很重，压力很大；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我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在上海私立大学教书比较好，观察实际政治比较有言论自由。

主意初步打定了，我就于一九三〇年五月离开伦敦，到欧洲大陆各国游历，访问苏联，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到北京正是蒋、冯、阎大打内战的时候，在清华、北大教书的朋友劝我留住，我见华北动荡，要到上海才能最后决定，于是取海道南下。到了上海^①，由潘光旦介绍接受了私立光华大学的聘书，担任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后来潘光旦往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校长张寿镛^②即聘我继任文学院院长

① 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0年秋天。

② 当时是国民党财政部次长。

长,并在其他大学兼课。在讲课中,我极力宣扬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同时在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办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题为《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影射蒋介石,几乎使新月书店被反动当局勒令关门大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我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田中秘密奏折,独吞中国阴谋计划的第一步,是关系中国存亡的大关键。基于这种认识,我就改变了至少在五年之内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以便著书立说的打算,发表了题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主张对日实行抗战,对内实行民主;并走出课堂,与章益(当时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谢循初(当时暨南大学校长)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我们三人是常务理事)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南京反动政府鉴于民气沸腾,为釜底抽薪,欺骗国人计,于一九三一年底一九三二年初宣布召开国难会议,聘请中国共产党以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我在内的七十余人作为国难会议会员。我们就发起了留沪会员座谈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我与黄炎培、吴经熊、彭允彝等被举为干事。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发生,我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工作,结识了陈铭枢、蔡廷锴、翁照恒。在战事紧急的时候,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及留沪国难会议会员座谈会推举我和熊希龄、左舜生三人为代表,前往北京督促张学良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以解上海之危。同时代表上海国难会议会员与北京、天津的会员商讨出席的提案。在北京曾与张学良、吴佩孚、吴鼎昌交谈数次。张学良说,他的不抵抗是奉中央命令,只

要中央抗战令一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恰在此时，上海十九路军被迫停止军事行动，此事无法再谈。至于出席国难会议的问题，大家商量确定由上海、北京、天津三处的国难会议会员推举熊希龄、褚辅成、穆藕初、马少山、李璜、罗隆基和我七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南京政府谈判关于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问题。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接见了我们，答复毫无诚意，我和其他一部分会员就决定拒绝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①。

这时候，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极力拉我，并以中央委员相许，我以该党政纲太右，又与旧军阀勾结，予以拒绝。张君勱亦拉我发起组织新党，我认为是康、梁一系人物，思想比国民党还右，未同意。这两个小政党，因为想做官，对于结束训政、开放政权是很感兴趣的，对于抗日是假的，对于反共是真的，所以最后都跟蒋介石跑了。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南京政府以为高枕无忧了，于是对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及活动人物开始采取分化瓦解、利诱威迫种种办法。CC系已经拉了一批教授过去，报纸上就出现了所谓十大教授的宣言。蒋介石通过李烈钧（江西同乡）和青年党的头目之一左舜生（中央大学教授），要我到南京或庐山去见蒋介石。去还是不去呢？我考虑自己人微言轻，决不可能影响他对日实行不抵抗、对内实行独裁的政策。他的意图，无非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我还年轻，还有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卖身投靠，最后做他的殉葬品。我分别请李、左两人代为

① 留沪不去出席的国难会议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左舜生、赵叔雍和王造时等，曾发起组织民宪协进会，并与当时在野的孙科谈判过数次，不久即无形解散。

婉词推谢。接着蓝衣社头目之一的刘健群来到上海，约我在新亚旅馆谈话。他说，政府正在准备抗战，但抗战必须全国统一，而统一全国就必须先剿灭破坏统一的共产党，我最好去南京工作，向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不要在上海哇喇哇喇地发空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我答复说，“好意”我很感激，但是我满意于现在的教书工作，不愿变更，至于国家大事，愿抒所见，决不会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

反动派见我态度倔强，便开始进行迫害。匿名信、恐吓信和带子弹的包裹邮件，相继而至。向后退却，还是向前苦斗呢？初生之犊不怕虎，我采取了后一种态度。我主编的《主张与批评》出版了，^①被查禁又改名为《自由言论》继续刊行^②。首先发表了《我们的根本主张》一文，主张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的文化。其次发表了《安内必先攘外》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共产党的感情亦有了变化，由中立转为越来越同情，并且参加了共产党所影响的以宋庆龄、蔡元培为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理事之一，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这些行动更激起反动派的注意和痛恨，于是他们对我采取了下列行动。

第一是彻底查禁《自由言论》的印刷和发行。

第二是一九三三年夏，密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我教书，原有聘约关系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约收了回去。这样一来，生活马上发生问题。怎么办？章士钊、赵叔雍（后来当

① 《主张与批评》创办于 1932 年 11 月。

② 《自由言论》继《主张与批评》之后，创办于 1933 年 2 月。

了汉奸，做汪伪组织的宣传部长）和汤漪（江西同乡，旧国会议员）都劝我挂名做杜月笙的顾问，必要时替他做一些英文秘书工作，每月可拿干薪四、五百元，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骂人家流氓，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如果自己当了流氓的顾问、秘书，岂不要被人笑死、骂死，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章士钊欣赏我的这种态度，就要我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挂牌做律师，一切开销不要我负担，并有他的帮办律师帮忙（我不是专门学法学的，我已料到教书饭碗将被打破，所以事先委托上海律师公会代我领了一张律师证书，以备万一之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则约我译书，每月交稿六万字，致送三百元。这样，我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每月收入和教书差不多，并且可以更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

第三是暗杀。有一天李烈钧叫我到 he 家里去，把从程潜（他与程邻居）那里得来盖有骑缝印的蓝衣社暗杀名单给我看，上面列有四十多人，鲁迅先生和我也在其内。他劝我逃往香港或躲一个时期再说。我想家有老小，又无储蓄，逃无法逃，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亦非长久之计。我想只有把这件事情在报上揭露出来，上海为国际观瞻所在，又有租界关系，反动派不能不有所顾忌。中国人办的报纸是不敢登的，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熟人张似旭^①在里面做总编辑，如果愿意发表，反动派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正在我对这名单半信半疑，还没有找到张似旭的时候，榜上有名的杨杏佛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驻上海办事处门前被暗杀了，这就使我再不能不相信。张似旭在陈友仁当外交部长时做过情报司司长，对蒋介石不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亲美帝国主义。我把暗杀名单交给

^① 张似旭是王造时留美时同学，抗战时期在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所暗杀。

他，要求他发表时，他面有难色。我说，你有美国的关系，他们决不敢动你，他终于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大美晚报》中英文两版就以头条新闻披露，轰动了全上海，迫使上海伪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于次日在上海各报发表谈话“辟谣”，榜上有名的人从此再没有被暗杀的了。但是解放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派了一位王同志来向我了解，说有两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曾奉反动派命令来暗杀我，并且到过我住的地方察看情形，问我是否知道这件事，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我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亦不认识这两个人。反动派这样对我进行迫害，为什么我宁愿“北走胡，南走越”，而不西上井冈山呢？这正好说明我的阶级局限性。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和李济深等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陈铭枢的亲信王礼锡（安福小同乡）密电邀我去参加。我秘密到福州住了几天，看不成气候，就回上海。在厦门搭船途中，在船上认识了章伯钧。

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退居泰山。他通过李烈钧于一九三四年春季，邀我随同李去泰山一游，谈了国际形势与抗日问题，随后他又邀我们同他一起游历了胶东各县。

一九三五年夏天，李济深、陈铭枢由香港托人带信来邀我前去商谈组织抗日救国政党问题。到后看他们内部意见复杂，希望渺茫，乘桂系驻港代表甘介侯（清华老同学，曾以桂系关系做过外交部次长）邀我去广西参观的机会^①，便由广州乘机转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谈过几次，仍由香港回到了上海。后来李济深、陈铭枢派

^① 广西当时实行“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政策。

胡某(忘其名)来告诉我,他们已经组成民族革命大同盟,选出中央委员九人,把我也放在里面,并要我担任华东方面领导工作。我因为不知道其中内容,又没有看到具体政治纲领,未便接受。

正在这万分苦闷之际,传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出的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人民共同抗日救国。我感到非常兴奋,由衷地赞成,当即参加了上海文化界三百余人签名发表的宣言。接着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一九三六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我在三个组织中都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这是我一生政治活动中最有意义的时期。在这时期以前,我是旧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应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结果是到处碰壁,一无所成。在这个问题上,我摸索了十六年,救国会运动开始之后,我才初步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基本上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和领导,并参加了广大的群众斗争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发展迅速、如火如荼的救国会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一九三六年“两广事件”^①的时候,上海警察局派了一个姓范的督察员为首的八个特务,身带手枪,夜间闯入我家搜查,其势汹汹,几乎开枪,幸而没有查到什么,便恨恨而去。八月间,蒋介石以分化利诱等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九月中旬以胜利者的姿态到了广州,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邀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我前往会谈,用“调虎离山”之计,企图使我们离开上海,不能领导

① 1936年6月两广军人以“抗日救国”为口号,联合反蒋,进兵湖南。蒋介石准备武力对付,由于全国人民反对,舆论一致要求国内和平,一致对外,两广事件开始和平解决。同年8月,两广军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瓦解。

即将来临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我们的答复是过了九一八动身。这个答复显然激怒了反动派，我们七个人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被捕，随后被押往苏州，以“危害民国罪”关进高等法院监牢。这就是“七君子”事件。

二十天以后，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及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予以拒绝，而且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枪杀爱国青年。张、杨乃联合行动，将蒋逮捕。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著名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政策，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抗战，蒋介石乃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并于七月底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①，要我们去南京会谈。我于八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从南京乘火车回到上海南站下车，恰好听见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第一声炮响。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了，我们马上投入了后援活动。

不久南京政府成立抗日大本营，各党、各派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我应邀参加第二部（政略部）和第四部（国民组训部）为挂名委员，除参加几次会议外，没有实际工作。上海沦陷以后，第二部部长

① 王造时等被监禁在苏州时，陈立夫曾指使周利生（王造时小学老师，时任河北省监察使）从南京到苏州看望王造时，并与沈钧儒等谈话。周秘密告诉王造时说，如果沈钧儒和王造时同意释放后不再作救国会活动，可以先放沈、王两人。王造时回答说，要放都放，并且无条件，否则以后天下以我王造时为何人乎。周利生游说分化不成，乃作罢。

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李烈钧、罗隆基和我回江西出席全省总动员会议，中共地下党员徐雪寒同志陪我同去。会议结束后，熊约罗和我密谈，留我们在江西担任行政工作或从当时开始发行的江西省建设公债三千万元中拨给我们每人二十万元，在江西开办实业，意图以官职或厚利羁留我们，免得我们在全局政治上“唱高调”，与国民党反动派为难。我们不约而同地以无行政经验和办实业经验为词婉言谢绝。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我回到安福原籍省亲后即赶往武汉。

一九三八年初，熊式辉通过卢作孚约我和罗隆基中的任何一人回省担任新近扩编的保安团的政训处长，而以与他有亲戚关系的肖淑宇为副处长，我们亦拒绝了。接着他又电邀晏阳初、罗隆基、许德珩和我回南昌商谈开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训练全省新县制工作人员以利抗战。我们以事关教育抗战干部，终于同意由我担任教务处主任，许德珩担任训导处主任，罗隆基担任研究处主任，蒋经国任大队长，而熊则自兼院长。第一期刚一结束，熊借口九江渐告吃紧，省政府准备后撤，解除了我们和讲习院的关系。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参政会宣布成立，我们三个人都被任为参政员，转往武汉出席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这个时候，正值徐州失陷，少数失败主义者散播投降妥协的空气，又听说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有调停的活动，于是坚持抗战的人士有救亡总会的活动，在汉口青年会开过几次会，我也参加了。汪精卫当时是参政会的副议长，要彭学沛约我去谈过一次话，我表示反对与日帝妥协，特别是徐州失陷以后谈判就是泄气，就是亡国。他默不作声。

在参政会中，我的发言和提案，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例如一九三八年

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会议，陈嘉庚打了一个简单电报提议“言和者以卖国贼论罪”，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国社党梁实秋发言说，任何战争都是以和平结束的，言和不等于出卖国家利益，为什么要以卖国贼论罪？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汪精卫，他默默地同情梁的意见。我反驳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了东北，占领了华北，占领了南京、上海，又占领了武汉，而且正在继续进攻中，在这种形势下，除了屈膝投降为城下之盟以外，有什么和可言，主张言和者当然应该以卖国贼论罪。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公开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主席针对他的这一投降论调，在六月三十日发表的那篇题为《反对投降活动》一文里，指出抗战到底的“底”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是其他。我们在参政会上亦提出了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的提案，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一九三九年底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协定，我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江西的《前方日报》发表《汪逆精卫卖国协定的分析》一文，并分发其他一些报纸转登，以打击公开的汪精卫的方式来打击暗藏的汪精卫的投降活动。

另一类是关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例如一九三八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的时候，我提议设立省、县各级民意机关。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第四次会议上，我代表救国会提出了限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提案。

此外，因为参政会的关系，我被派参加了第九战区的军风纪巡察团。团长为苏炳文，该团是由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国民参政会、监察院、军法总监部等机关的代表担任委员，表面上看来权力很大，好象带有“上方宝剑”，可以就地处理违犯军纪的军人及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但是实际上和监察院一样，不说不敢打老虎，就连苍蝇蚊子都不敢拍。每到一军部、一师部或一专员公署、一县政府，都是事先通知，军长、师长或专员、县长照例欢迎，照例招待，照例开座谈会，照例听取报告，照例讲一套废话，然后恭送如仪。但是前方军部、师部的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大都是年轻人，朝气蓬勃，关心国家大事，往往邀请我给他们演讲国际国内形势。不料这些演讲活动引起巡察团中个别委员向蒋介石打秘密报告，说我在前方煽动军心，别有用意。后来到重庆开会，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把这事告诉我，并说经他多方解释，才化险为夷。我除把巡察团工作向他汇报以外，立即表示坚决辞职不干。后来这个形同虚设的巡察团便干脆被撤消了^①。

一九三九年春，江西吉安有个《日新日报》，一无经费，二无人才，办不下去，要求我接办。我感于前方精神食粮的缺乏（大报纸都撤到粤汉铁路以西的大后方去了），江浙流亡到吉安、泰和（江西省政府所在地）一带无事可做的爱国青年很多，而吉安又是前方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城市，经与在江西的救国会朋友商讨后，就接收过来了^②。这张报纸始终以坚持抗战和坚持民主为宗旨，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各大报的交换，特别是重庆《新华日报》的交换，得到各地进步人士的来稿，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得到参加工作

① 王造时在任军风纪巡察团委员期间认识了罗卓英，时任集团军总司令，驻分宜。

② 1939年5月王造时在吉安与孙晓村、王枕心、彭文应、许德瑗、刘九峰等组织前方文化书社，同时创办《前方日报》。

的青年的艰苦努力,同时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经历无数的困难险阻、破坏、打击,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种类型报纸以外的第三种类型的报纸,那就是既有地方性又有全国性的中间性的报纸,在东南文化战线上起了一些进步作用。它一直办到解放以后,改名为《前进日报》。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极力拉我入党,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都约我谈过,我以各种不同方式推辞了。一九四〇年周总理视察东南各地,路过吉安,在我内兄家里和我秘密会见,我曾向他汇报此事。总理说:那么将计就计,参加进去搞个反对派好了。我说我一向是公开反对国民党各项反动政策的,如果进去,就要失掉个人在社会上的影响,而且我是喜欢公开发表议论的,不适宜于做这种工作。我没有听总理的话。

一九四〇年往重庆途中,忽然接到江西省政府转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的电报,邀我前往曲江担任法学院院长。到了桂林,又接到由广西省政府转来的第二个电报。在桂林的朋友一致主张我接受这个职务^①,以建立东南进步文化战线的根据地。恰好参政会延期,我便折往曲江,与许会谈,表示可以考虑,惟须回到江西才能最后决定。许在我一离开曲江之后,为了满足学生要求和安定学校秩序,立即正式宣布。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深恐我对反动派不利,乃以中山大学系纪念先总理的大学为理由,认为非国民党员不宜担任此项职务。党部插手干涉,激起了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的反对,法学院全体学生并派了代表六人赶来吉安,接我同去。同时许崇清亦来一电,催我即日前往就职,但是又恳望入党,“以资表

^① 在桂林的朋友指千家驹、陈此生、狄超白、张志让、陈劭先等。

率”。我与在吉安的朋友商量后回电说，讲学与入党不应相提并论，入党问题中央原在洽谈之中（指上节所说国民党极力拉我入党事，用意是留有回旋余地），今以此相挟，殊不可从，谨请辞职，以让贤能。后来学生反对党部风潮越闹越大，传到国外。邹韬奋在香港发表《患难余生记》一文中，论及我的复电中插入“入党问题中央原在洽谈之中”一语，以不明此中内幕，言外似有微词^①。现在想来，我的态度确是不够明朗。当时我应采取的态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复电辞职，但严词谴责广东省党部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将讲学和入党混淆在一起，促请全国注意，给反动派以有力回击。另一种是随同学代表前往就职，不入党，坚决与党部斗争到底，并诉诸全国舆论，争取各方的支持和同情，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这两种态度不采取而采取了上述复电所表示的那种软弱的态度，结果使学生群众大失所望。

一九四二年国民参政会第三届改组时，反动派把代表救国会的几个参政员都除名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外围”，在参政会碍手碍脚。

一九四三年底，国民党为了欺骗国人和应付国际舆论起见，又以准备实行宪政为幌子，在参政会之外设立了一个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把与救国会有关系的张志让和我拉去做会员。我到重庆出席会议的时候，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清华老同学）特来和我密谈，说如果能起草一部“适合最高当局身裁的，切合国情的宪法”，你对国家的贡献就是无法估计的，你的政治前途亦是无可限量的。我说，国内党派问题，主要是国共问题未解决，民主改革未成事实，抗

^① 原文载《韬奋文集》第三卷 233—235 页。

日战争没有达到最后胜利，即使起草好了一部完善的宪法，又怎样实施呢？所以现在还谈不到起草宪法的问题。宪政实施协进会这个组织后来觉得无事可做，又要一部分会员分别在各省考察宪政有关设施，如各级民意机关之类。湘鄂赣区考察委员有湖南的仇鳌，湖北的张难先和江西的我。所谓考察委员，一无职权，二无办法，三无经费，四无交通工具，我们三个始终没有碰过头去做那煞有介事的“三省巡阅使”。我只在吉安、泰和附近几个县看了一下，分别邀请一些人举行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写了几份报告，说明现存的民意机关并不能反映民意，寄往重庆销差。

一九四四年日军进攻湘桂铁路线，前往重庆的交通极端困难。我被迫局处于吉安，孤陋寡闻，很感苦闷。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原子弹一枚。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十日蒙古对日宣战。同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算是胜利地结束了。国际国内形势将发生什么变化？个人作何打算？《前方日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我当时考虑的问题，我的看法大略如下：

(1) 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垮台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大大削弱了，独有美帝国主义相对地增强了。

(2) 苏联大大地增强了，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变得强大了。

(3) 美帝国主义势必支持一切反动势力以镇压革命势力，苏联势必支持一切革命势力以反对反动势力。美苏关系势必趋于恶化。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苏不致马上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不会接着就打第三次大战。

(4) 国民党反动派决不会容许共产党保有强大的红军，势必投靠美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就是说它要

挑起内战。共产党是反对内战的，对于国民党的挑衅是必定要反击的。

(5) 中国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的前途，一是和平民主统一的前途。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内战，又经过八年的抗战，是反对第一种前途，拥护第二种前途的。

(6) 为了争取和平就要反对内战。为了争取统一，就要拥护民主。和平、民主、统一这三项原则是互相关联的。

(7) 今后个人的努力就是要根据这三项原则。正面说来，就是争取和平、民主、统一；反面说来，就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分裂，而实际的工作，还是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为宜。《前方日报》迁往南昌作用不大，如果能迁往上海，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及如何把这些看法付诸于具体行动，还有待于出去看看，搞清内外形势，并与救国会朋友共同商量决定。到重庆去的交通是十分困难的，只有等旧政协开完，后方的朋友纷纷东下，才好动身前往南京、上海。根据这种盘算，我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离开吉安，在南昌徘徊了三个多星期，五月初到南京，与张群、吴铁城、李惟果等见了面。与张、吴会谈的目的在摸清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在打内战还是想和平。与李会谈的目的是替《前方日报》申请迁往上海的许可证。张是行政院副院长，很圆滑，答复问题不着边际。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表示比较露骨，他说如果我是你，大可乘机到美国或英国去教一两年书再说，何必挤在国内惹得一身是非呢？如果你同意，我倒可帮忙。我说让我考虑考虑。李惟果是清华同学，当时的宣传部长，他的答复也很有意思。他说：依私人友谊来说，今后的报纸很难办，我劝你干脆把江西的报纸卖掉；依公事公办来说，《前方日报》的迁移许可证你可申请，但批准与否

须经过研究,我不能单独决定。从这几个人的说话中,从私人朋友的消息中,我的印象是反动派已经决定了打内战的方针,正在争取时间积极准备。一到上海我就把这种看法告诉沈钧儒和张澜、罗隆基等。我认为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统一,反对分裂,应该在蒋管区发展中间力量,壮大中间力量,把软弱无力的民主同盟改组,不以三党三派为组成单位,而以个人为组成单位,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有系统的政治纲领。趁和谈未破裂以前,在全国各大城市尽快发展组织,并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三党三派同时宣布解散。救国会领导成员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但不热心。张澜认为意思虽好,但很难实行,劝我先参加进来再说。罗隆基热衷于和谈。国社党和青年党是倒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张君勱、左舜生等都要保留自己的小摊子,作为买空卖空、讨价还价的依据。到一九四七年年底,我才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个计划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映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如果真正见诸实行,形成一种强大的中间力量,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对于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固然不利,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亦会发生很大的阻力。本来民主政团同盟当初在重庆酝酿组织的阶段,我是参加在内的,但是后来正式成立的时候我却在江西。我因为上述改组计划未被采纳,而民盟内部又极其复杂,故没有同意参加。

这时候我的心情是相当空虚而苦闷的。田汉五十岁寿辰在福州路杏花楼聚餐,郭沫若、夏衍、阳翰笙、周信芳等都参加,罗隆基和我亦在座。聚餐完毕后,我们两个一同走出门,罗问我怎么走法。我说向右走有跳黄浦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他报我以会心的

微笑。

慢慢向左走，做什么具体工作？罗家衡（江西同乡）劝我做律师，办汉奸案子很容易发财，我说以一个主张抗日的人现在来为汉奸辩护，我不能干这种事情。想来想去，还是设法把报纸搬来上海，于是去找上海市长吴国桢（清华同学，兼房屋分配委员会主任委员）申请报馆房屋。他为敷衍面子，分配了北四川路底山阴路口一间门面的店房，既不能作编辑部，更不能作为印刷所。怎么办？我和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量，决定办书店。资金分做四股，生活书店担任两股，救国会同志杨伯鹏担任一股，我的一股是干股，作为我交涉房屋的酬劳。书店定名为自由出版社，职工由徐调配，我挂社长名义，以便对外，不支薪。初步经营贩卖进步图书杂志，凡是在别的书店买不到的，自由出版社出售。这样就引起反动派的注意，遭到两次搜查，职工吕诚一度被捕。徐伯昕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告诉我，当年生活书店所担任的股金，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拿出来的。自由出版社虽然没有出版什么有价值的书，但是在贩卖业务方面曾经起过一点小小的进步作用。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大致就绪，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对于内战前途的看法，我偏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偏低地估计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总的认为反动派贪污腐化无能，不得人心，必然是要失败的，但是由于美国的大力支持，内战可能延续五年或更多的时间，规模要比一九三七年的内战大不知多少倍，人民生命财产要遭到巨大的损失，国家要受到严重的破坏。面对这种局面我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到过十多个大中学校演讲，说明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而不是内战，是民主宪政而不是一党专政，是独立自主而不是美国插手干涉。这些演讲都是由陶行知挂钩联系的。

第二，出席参政会反对“戡乱”。一九四七年一月忽然看见报载国民党政府发表我为参政员，意在拉拢。我随即在《申报》等报上发表谈话，说明事前未经本人同意，是否接受和出席会议须看是否有利于和平、民主、统一。三月，我回江西料理报社事务，接家眷出来，并往安福原籍省亲。四月，参政会开会，秘书处来电通知，报载民盟领导成员梁漱溟、黄炎培及民主人士许德珩等已往报到，并在为和平奔走。我觉得这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一到南京就先与梁、许等商谈，许并于次日邀请主张和平反对“戡乱”的参政员十余人聚餐，当即决定两事：（1）推我当场起草主和提案，由出席聚餐的人签名。（2）推举许德珩、江恒源和我去见陈诚和陈立夫，劝告不要镇压学生运动，避免造成流血惨案。这时，华丁夷来通知我，说救国会要我先往上海一行。我因为次日就要开大会讨论“戡乱”问题，作为主和提案的起草人，并且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事实上是不能离开的。次日，我发言后即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猛烈攻击，但是我们少数派的意见通过《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关系立即在该报发表了。沈钧儒为学生运动问题来到南京，相见之下，就问我在江西是否接到孙晓村关于救国会决议要我不要去参加参政会开会的信，我说并未接到，并且向他报告到南京后所做的工作，他表示满意。但是作为救国会的会员，没有先去上海同领导成员会商，那是违反组织纪律的，特别是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我应该采取同样的抵制行动。

第三，反对解散民盟。一九四七年十月某日，褚辅成约请吃饭，说有重要问题商量，在座的有沈钧儒、楚图南、冷御秋等。沈报告接到黄炎培电话说国民党政府已下令解散民盟，请大家设法挽救。当经商定由褚辅成去找杜月笙、钱新之，由我去找张君勱、李璜、胡政之，要他们出来说话。胡政之说，身体有病，不愿与闻。我同张君勱、李璜谈话时，张澜、陈铭枢亦在座。我说，我非民盟盟员，但这不仅关系民盟存亡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民主政治的命运问题，希望张、李去庐山向蒋介石力争。张、李表示不愿意去，只答应出面打电报给张群转蒋。张要李主稿，其中“勿为已甚”一语是我坚持加入的（电文见当时各报）。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越来越大，张澜约了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在寓所讨论是否要发表解散民盟停止活动的公告，要我也参加。大家不愿首先表示意见，张澜望着我说，还是你这个非盟员来开个头吧。我说国民党政府要解散民盟，那是它的事，你们愿否宣布解散是你们的事。依照法律手续来说，这个重大问题应该召开代表大会来决定，你们少数领导成员是无权作出此项决定的。当年救国会的几个领导人被捕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亦以解散相要挟，当时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此种权力。我说了之后，就先走了。

第四，参加反美扶日和反美扶蒋运动。美帝国主义看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它在中国的特权有被根本消灭的危险，因此，除了大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之外，还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以便将来使它做对付新中国的马前卒。对此，一九四八年上海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有反美扶日和反美扶蒋的运动。关于反美扶日，上海文化界、教育界发表了几次宣言，我参加了这些宣言的起草和签名。关于反美扶蒋，显著的例子是

在《大公报》发表的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两封公开信。一封是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孙大雨起草的，他曾经拿稿子来和我商量过，签名的极大多数是大教联的人。另一封是我起草的，签名的范围比较广泛些。

到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失败已经定局。毛主席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引退”，而由副总统李宗仁上台做代理总统。李的亲信邱昌渭（留美同学，曾任北大政治系教授）跑来上海，企图策动和平运动，希望我出来奔走。我干脆答复说，现在不是和平问题而是革命问题，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投降问题。他要我同去找张澜、罗隆基，我也拒绝了。

眼看上海快要解放，全国快要解放，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紧张。高兴的是蒋家王朝终于垮台了，新中国快要诞生，紧张的是怕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有个朋友来报信，说根据他在伪上海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弟弟的消息，上海准备逮捕八个人的名单中末了一名是我，劝我马上躲起来。过了两天，他又来报信说，调查结果我未参加民盟，已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除去了，但是劝我还是小心为是，不要出门，最好每天到他家里去打打小牌消遣，并且介绍和他的弟弟见面，以便掩护，并可随时了解情况。我就依照他的办法，度过了解放前夕最紧张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方面热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对于新的政治生活不习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觉得陌生，以为新民主主义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体会不到国内的基本矛盾已

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体会不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如此，我还背着一个沉重的“进步包袱”，进入解放后的新中国，自以为五四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无役不从，坚持抗战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对外投降政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以至于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共产党所影响和指导的救国会运动，坐过三次牢，几乎被暗杀，因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

有一次饶漱石约我在他寓所谈话，试探我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我回答说我的自由散漫作风不宜于此，如有机会愿意到大学里去教书。所以后来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和法学院院长胡曲园来找我担任政治系教授，我欣然同意，并以把丢开了十八年的教书工作重新拿起来，并不觉得费气力而引为自豪。

一九五二年参加学校的思想改造，这是一场很激烈的思想斗争，时间经历大半年，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改造以后，院系调整，复旦的法学院和政治系归并于华东政法学院，我被调到历史系讲授世界近代史，并担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主任。我很满意于教学生活，并且自以为对于教学工作是相当认真负责的。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也越来越信任，一九五六年优待高级知识分子，我在复旦是第一个受到最好的照顾。我的爱人逝世^①，后事都是学校料理的，儿子看病的医药费都由学校包了下来，并且要我搬到十八层楼的茂名公寓去住。我觉得同共产党越来越亲近了，胸怀也随之开朗。共产党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而且在政治上重视我，我担任了人民

① 指原配夫人朱透芳同志，救国会成员。

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会副会长、历史学会、国际关系学会和律师协会的常务委员等职务。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举行二十大会议，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文被美国杂志《世界新闻与报道》发表。苏共二十大以后，六月发生波兰事件，十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我私自庆幸新中国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但是国内亦有几种情况使我觉得有扩大民主生活和加强法治的必要。第一，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因之我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扩大民主生活以防止官僚主义，加强法治以防止干部滥用职权，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已经有加强法治的报告，而且中央的刑法草案已经发到上海市政协法律组讨论，我就是该组的召集人之一，我认为颁布重要法典的时机已到。第三，上海法院已经采用律师辩护制和陪审员制，并且有律师协会的成立，而我又是常务理事。因此我认为这是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法治的表现，可见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而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一九五七年二月，全国政协开会，上海市政协推举市统战部长刘述周和我两人去参加。到了北京，救国会的朋友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热情地招待我，史良并向我透露有重要工作在等着我。另外，一些人则批评我说，解放以后我太消沉了，今后应该多说话，在这次大会上应该发言。我就在这种气氛下，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马寅初的赞扬。

当时我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安如磐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

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为光明的、先进的、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以致于演成严重问题，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所以我在全国政协的发言里说过“不患党内的唐太宗不多，而患党外的魏征太少”之类的话。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市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的激烈的斗争从我开始。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改造，到一九六〇年国庆节前一天，党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一年我重新结婚了。我的新爱人^①也是再婚的，她以前的爱人和我以前的爱人一样，因病去世已经多年，留下了几个孩子。我们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所以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

一九六〇年以后，我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再次担任世界近代史这门重点基础课的讲授任务，领导上还叫我为教育革命时期没有上过这门课的班级补课。为了扩大学生知识面，历史系中几个老教师共同开了“史学评论”课，介绍和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我担任其中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部分。领导上还叫我向研究生讲授欧美社会政治思想史，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讲起，特别着重

^① 即郑毓秀。

讲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学派，一直讲到十九世纪末期。领导上还宣布，根据中央计划，复旦着重研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首先要开设美国史的课程，由我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史，还准备带三个研究生。

一九六一年高教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各大学世界史教材编译会议，参加的有北大、复旦、武汉、中山、华东师大等重点大学的老教授二十余人，我也在内。除编写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和世界近代史三部教材外（已出版），还编译一百三十万字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材料（后来减为三十余万字）。我编译了两个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历史哲学著作。

除了校内教学以外，校外的任务也纷至沓来。商务印书馆叫我介绍工党右翼理论的书籍，并要我把解放前所译拉斯基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拉丹纳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加工和补译，作为内部参考出版。此项工作早已完成，稿子现在北京商务。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我参加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已出版）和《历史研究第十二卷》。后者我已译好二十余万字，红卫兵造反时毁去大部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出版的《文摘》杂志，要我摘译资产阶级法学方面的论文十篇左右。我还参加了《辞海》工作，编写了近代国际关系史部分。总之，这几年中我改译和翻译的东西总数约在一百万字以上。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专院校首先是用大字报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行。揭露我的有四张。第一张是揭露我在讲授世界近代史那门课中散布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毒素；第二张揭露我在带研究生讲授欧美社会政治思想中散布关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毒素；第三张是

质问关于罗隆基来上海和我见面搞了什么阴谋；第四张是揭露我在料理彭文应丧事中为右派分子张目的活动。由于揭发的大字报较少，我就认为这次不会挨斗。后来大字报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学阀”、“反共老手”、“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越来越多，我亦被编进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经受批斗，勒令“交代问题”。九月二十二日晚，复旦的红卫兵来造我的反，分班轮流审问，要我交代。每日三班或者二班或者一班，斗争经历四十二昼夜，至十一月二日以群众专政的方式，由公安局把我逮捕。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突然胃大量出血，上吐下泻，昏倒在看守所。我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医院住院医治，经过医生、护士五个星期认真负责的治疗、护理，转危为安，于二月二十一日出院，又回看守所^①。

（何碧辉、赵寿龙整理）

^① 王造时同志于 1971 年 8 月 2 日病故于看守所。关于他被错划为右派已于 1980 年 5 月改正，恢复名誉。

先师圆瑛法师事略

明 旻*

先师圆瑛法师圆寂已经三十周年了。他老人家的一生，是一个爱国爱教的中国佛教徒模范的一生。古《高僧传》对历代高僧大德的应化事迹，曾分为十科立传，其中最重要的是义解、习禅、明律、护法和兴福五科。先师的一生对这五科的特点，可谓兼而有之。凡是和他亲近过他的人无不同怀敬慕。

先师于公元一八七八年生于福建古田县，幼年读儒书，聪颖过人。十七岁曾想出家，被叔父所阻。十八岁大病后，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从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的开山祖师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后来出外参学，先后从当时禅宗尊宿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修习禅定，深得冶开、寄禅二老器重。其间又从当时有名大德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法师，听讲多年，广泛涉猎大小乘诸经论，博览精究，对《楞严经》的造诣尤深。其后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人。

先师毕生致力于佛教界的团结工作，是新中国佛教界著名领袖之一。早在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寄禅和尚主持宁波僧教育会时，先师就极力襄赞，诸多擘划。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三

* 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

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师出席并积极参加工作。一九一四年，中华佛教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当选为参议长。一九一七年，担任宁波佛教会会长。一九二八年，参加江浙佛教联合会的组织工作，被推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一九二八年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先师连续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直到抗战以后。全国解放后，又与赵朴初、巨赞、虚云、喜饶嘉措、陈铭枢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先师毕生致力于我国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地负责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实际工作，获得全国佛教徒和国外佛教界人士的崇敬和爱戴。

五十多年来，先师一贯主张僧伽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首先应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一九〇九年初他主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出许多人材。后来又在南洋槟榔屿创办佛教研究会，最后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些讲堂、学院的。

先师宗说兼通，行解相应，一生演教讲经，遍及国内外，自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远及香港、台湾、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所讲经文，如楞严、法华、心经、金刚经、弥陀经、弥陀要解、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等，均深入浅出，法筵之盛，常座无虚席。

先师英年弘法，盛名闻于丛林，各地名山古刹争相延致。先后主持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进山以后，都规

模一新，清规整肃，海众安和。

先师除随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外，尤重视社会福利的施为。清末，他初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即创立僧民二校，僧校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以教育贫寒子弟。一九一八年，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工读。一九二三年在南洋讲经时，遇星洲转道及巴生转物二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失父失母的孤儿。学科依照普通学校，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全部免费，前后培植人材在数千以上。一九二六年为筹集慈儿院基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基金以归，使慈儿院得以维持发展。

先师博通三藏，著作等身，已刊行者二十余种，其中关于般若者，有仁王般若、金刚般若、心经等讲义；关于净土者有弥陀经讲义、弥陀经要解、普门品等讲义；关于教理者有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弘传序、楞严经等讲义。此外还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和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先师毕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感人至深。一九二三年，先师对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关怀备至，曾两度赴台湾宣化和探访骨肉同胞，和当地佛教界建立联系，促进了台湾各族同胞的团结，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先师义愤填膺，以中国佛教界领袖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先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

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以大悲无我之精神，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积极进行救护工作。又奔走各地组织救护队，办理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无辜难民和卫国受伤战士。由于当时佛教医院和各收容所经济发生困难，先师决心前往南洋筹集经费。一九三七年十月，我随先师到了新加坡，请求华侨总商会组织新加坡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后又到吉隆坡、檳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藉讲经机会，宣扬筹款救国，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踊跃捐献，募得相当款项汇回祖国，充佛教医院和收容所经费。

一九三九年夏间，先师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后，重赴南洋，继续募款再次支援救济工作。同年秋间，第二次回国抵沪不久，时当九月一日，恰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先师在大殿上供礼佛，突来四辆卡车，载有日本宪兵数十人，一部分包围附近弄口，大部分冲入讲堂，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先师和我逮捕，驰往北四川路桥堍日本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企图迫使先师承认“抗日有罪”。次晨又将我们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情况非常紧张，先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日本宪兵即对先师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先师从容陈辩，义正辞严，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坚持了民族气节。

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之后，日本宪兵队长见先师威武不能屈，转而劝诱先师与他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先师以老病相辞。他们无隙可乘，终于在农历九月廿八日将我师徒二人释放返沪，但已饱尝铁窗风味，备受严刑凌辱达一月之久。先师在这次魔劫中始终

临危不惧，应付自如。这正是他平时修持深入，深信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坚持爱国立场的坚定表现。

先师出狱后身体衰弱，在医院疗养一个月后回到圆明讲堂。后来又有日本在上海虹口东本愿寺的僧人藤井草宣几次请老人出任中日佛教会长，先师以老病相却，并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纠缠。在此期间，先师对国家大事未曾一日忘怀，曾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师生赠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号召佛教青年挑起“救国兴教”两副重担。

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紧张，不少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纷纷函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先师飞往南洋，安度余生。先师复信，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为词，婉言谢绝。

解放初期，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前，先师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号召，曾致函中央领导同志表示热烈拥护。信里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祉，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的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后来先师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出席亚太和平会议。这是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性和平会议，对保卫世界和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期间，先师曾和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

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他在北京佛教徒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他说：“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还在锡兰贸易代表团宗教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在新中国“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语重心长，博得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参加和平会议后，先师回到上海即就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对宣传世界和平起到良好的效果。

一九五三年五、六月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民族、各教派、各地区的代表一百二十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空前未有的盛会。先师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仍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

先师毕生爱国爱教，积劳成疾，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一九五三年秋，先师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临行前，写下遗嘱一纸，交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他在遗嘱中说：“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先师回到天童寺以后，病情日益恶化，于九月十九日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消息由新华社报道后，全国各报纷纷刊载圆寂情况，深致哀悼。中国佛教协会委托正在上海的副会长赵朴初居士负责办理治丧事宜。十月十八日，上海佛教界于玉佛寺举行追悼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华东民委、宗教各部门的代表和弟子代表五百余人。赵朴初副会长在追

悼会上介绍了圆瑛法师的生平事迹和遗嘱后指出，圆瑛法师虽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爱护祖国的热忱，保卫和平的真诚，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即微尘也不存在，并号召大家努力学习圆瑛法师的爱国精神，朝着法师遗嘱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他的讲话使与会的人受到极大的感动。

先师栖神安养已经三十周年，缅怀老人遗德，感念弥深。且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各条战线都在落实政策，佛教徒同沐恩泽。今年九月十九日是先师生西三十周年之期，欣逢圆明讲堂恢复，圆瑛法师纪念堂开光，欢欣之余，更应遵照先师遗嘱，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争取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为实现人间净土而尽佛门弟子的职责。

先师生前对台湾同胞十分眷怀，由于历史原因，现海峡两岸仍处于极不自然状态。先师不少道友后辈现散处台湾、香港及南洋各地，天各一方。谨愿尽快结束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局面，完成祖国大团结，人民大团结，佛教徒大团结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以告慰先师于常寂光中。

（一九八三年九月）

回忆《生活知识》周刊

毛 齐 华

一、在斗争中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到上海，参加党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工作。当时《生活知识》周刊已经出版，因为我在工人运动委员会中分工管新闻、出版、印刷行业的工作，组织上便派我去领导。

日本投降以后，饱受苦难的上海人民希望能有一个和平、民主、安定的生活，但是事实却相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外货倾销，民族工商业遭受摧残，失业工人增多，物价飞涨，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很快成为泡影。上海工人、学生和进步人士奋起反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迅速掀起，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控制，派遣工棍对上海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会进行所谓“整理、改造”，妄图以此达到包办工会的目的。同时在政治上实行假民主，用以转移斗争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为了教育群众，加强对人民斗争特别是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决定出版《生活知识》周刊。这就是《生活知识》周刊诞生的历史背景。

二 办 刊 方 针

《生活知识》周刊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创刊起到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休刊止，共出版了三十九期。前后近十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很受工人欢迎，社会上其他阶层也很重视，对于上海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生活知识》周刊顾名思义，好象是对职工进行有关生活知识的教育，其实不然。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是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原来打算叫《职工生活知识》周刊，在正式出版时，把“职工”二字删去，定名为《生活知识》周刊，实际上这是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刊物。刊物一经出版，发行量很大，不但在上海一地发行，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都有代销处。象这样有影响的刊物，国民党当局当然要注意它，研究它的内容。因此我们不能不采取灵活机智的工作方针。

我参加这个刊物的领导工作后，和同志们研究，确定以下几点作为办刊物的方针：

（一）它的性质是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刊物，是工人的喉舌，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工运政策，尽可能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利用国民党的假民主去揭露他们。

（二）通过《生活知识》周刊揭露敌人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如派遣特务控制工会活动等，教育工人提高政治觉悟。

（三）采取各种形式，宣传解放战争在各个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宣传解放区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位变化和生活情况，激励上海工人向往胜利。

（四）总结上海工人斗争的经验，提高工人斗争的策略水平，

不断改进斗争方法，增强他们对斗争胜利的信心。

（五）关心工人切身利益，通过《生活知识》周刊的宣传报导，把工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结合起来，指导工人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提高斗争艺术，动员更多的工人参加斗争行列。

（六）文章要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做到通俗易懂，引起职工的阅读兴趣。长篇专论尽量不登，可另外设法在我们所联系的进步报刊上发表。

三、组织领导和编辑发行工作

当时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成员是张祺、陈公琪、王中一和我。张祺是主要领导人，分工负责棉纺行业；陈公琪负责机器行业；王中一负责市政部门；我负责新闻出版部门，领导《生活知识》。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纪康同志，发行人是陆以文（即陆象贤）同志。马纯古同志来了一阵就去香港。张祺、马纯古、陈公琪、王中一、纪康、陆象贤等同志和我都为《生活知识》周刊写稿，我常用的笔名是“祁华”。我们党的工运政策通过《生活知识》周刊向工人宣传，有时也单独用上海工人协会（工委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的名义发表文件，在《生活知识》周刊上转载。

《生活知识》周刊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工人刊物。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必须依靠工人群众，深深扎根在工人中间，既代表工人发言，又要起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的作用，因此必须大量组织工人群众写稿。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基本通讯员几十人，最多时达到一百多人。这些同志都是上海各工厂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同群众有密切联系，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不但是《生活知识》的通讯员，

更重要的还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同志积极推动上海的工人运动，解放后大都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骨干力量。可以说，《生活知识》周刊为党、为上海总工会培养了一批干部。

我们还吸收社会力量来参加《生活知识》周刊的编辑工作，请科学界人士写稿，提高工人的科学知识；请进步的新闻界人士写专论，提高工人的时事知识。纪康同志还经常和中国劳动协会左派同志联系，请他们撰写有关工运方面的稿件，使工人同志了解国民党统治区整个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生活知识》周刊虽然主要是反映上海工人斗争的情况，但是也反映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工人斗争的情况。我负责审稿，因处于秘密环境，受着种种限制，在审稿中难免有不当之处。

我们办《生活知识》周刊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每出版一期总是困难重重，纸张无来源，印刷临时找，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期的编辑工作都在同志们家里搞，由纪康同志把稿件征集起来，我们在一起商量研究，决定了每期内容，由他负责编辑，找印刷厂。周刊连编辑带发行一共只有六个人，而真正脱产的只有三个人。机构小也有好处，这样行动方便，容易隐蔽，能打主动仗。

我们的发行工作是依靠所联系的工会，还通过地下党交通员带到解放区去，如《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区）的同志曾从《生活知识》上了解上海工人运动情况。在邮局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周刊还寄到重庆三联书店出售。那时，我们的生活很苦。拿我来说，公开身份是中兴印刷所（党开设的掩护性印刷所）的“老板”，生活待遇只供给伙食和极少的零花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资。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很愉快，对胜利充满信心。尽管充满着危险，仍然感

到工作很有意义。

四、避免迫害 主动停刊

《生活知识》周刊出版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有所注意。尽管开始几期政治色彩并不明显，他们始终没有批准正式登记，而我们则照常出版。随着工人运动形势的发展，《生活知识》周刊的战斗性越来越强，作用越来越大，敌人的侦察就越来越加紧，企图进行迫害。他们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刺探我们的机构所在地，盯梢我们的编辑人员。他们公开没收和撕毁我们的刊物，并利用工棍威胁订阅《生活知识》周刊的工人，派遣特务抓编辑人员。就在这种充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生活知识》周刊的出版。

后来，敌人更加疯狂，对上海工人施行血腥镇压，《生活知识》周刊面临最大的难关。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个刊物作为线索，对工人同志进一步迫害，也为了隐蔽精干，迎接解放，经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认真研究，决定采取主动，暂时停刊，改出地下的油印刊物《劳工通讯》，用以指导上海工人运动。

《生活知识》周刊从创刊到停刊，虽然只出版了三十九期，但它在高涨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在尖锐剧烈的工人斗争过程中提高，确实是我们党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个战斗性的刊物，完成了党赋予的战斗使命。

记开明书店

章 克 标

(一)

要谈开明书店的创设,首先不能不提到“章老板”。

章锡琛(一作雪村),绍兴人,创办开明书店,后来人们叫他“老板”,绍兴话则叫“点王”,即是店主。其实把章锡琛叫作“老板”,只是同伴、友朋之间的一种戏谑的称呼,不是说开明书店由章锡琛一人作主。开明书店是股份有限公司,有董事会,有经理,不是独资开设的店。但在某些场合,章锡琛大权独揽,戏称他“老板”,也有一定的道理。

章锡琛原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妇女杂志》月刊。那时正在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思想高涨,他倾向进步,《妇女杂志》问世后,被一些思想较保守的人看作是“过激”,因而引起商务当局的注意,要他改正。章锡琛不同意,后来就脱离了商务编译所。

章锡琛脱离商务编译所后,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赞助,自费创办了一份《新女性》月刊来继续发表他们的主张。开明书店就是作为《新女性》杂志的出版、发行机构而创设的。为了表示要开通前进的思想,贯彻文明开化的精神,所以取名“开明”。这是一九二六年八月的事。

一九二七年秋，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复校，郑洪年任校长，我应邀任职，同时也在立达学园帮忙教课。此时，立达刚从城内黄家阙路迁到在江湾租地自建的新校舍里，还有些房子没完工，大家没有地方住，就和夏丏尊、方光焘、徐中舒、方欣庵等几个人，接受了章锡琛的邀请住在他家里，地点是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这几个人都是要到江湾立达学园和真如暨南大学去教课的，这里地点适中，交通比较方便。这所弄堂房子较破旧，但相当宽大，满可以做《新女性》杂志编辑、出版、发行的场地。当时大家在一起，有机会就帮忙做点义务工，或撰写稿件，或校对文章。同时在茶余饭后、闲话漫谈之间，就有写文章、编书刊的设想，乃至拟订编辑规划等等。开明书店就是在此地起家并逐步前进的。

第二个应该提到的是夏丏尊。他早年去日本学习，大约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差不多的时候，并曾与弘一法师李叔同等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当时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要求每省办一所大学。但没有师资，连专科学校也不易开办，先得办师范学校。浙江办的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放在一起，就叫做两级师范。由于缺乏师资，便招聘日本教师任课。日本教师不会说中国话，所以请这些留日学生回来，一面担任教职，同时兼作日本教师的译员。丰子恺在这里学习过，他是夏丏尊和李叔同的学生，他一直恭恭敬敬叫他们“先生”。两级师范学堂闹过风潮，他们任职期大概不会太久。

经过辛亥革命到民国，夏丏尊一直担任学校国文教师。这个课目当时不被重视，所以他做了多年教师，十分厌烦。据说他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曾在自家住屋的门上，写了一副对联：“青山绕屋，白眼对人”，大有愤世嫉俗的样子。还有一副对联：“不如早死，莫作先生”，或作“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

也表示出厌倦教师生活的心情。

春晖中学也闹过一场风潮，一些教师脱离学校，其中有匡互生、夏丏尊、刘薰宇、朱光潜、朱自清、丰子恺等人。他们后来都到了上海，和上海的朋友结成“立达学会”，显然是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意思，并创办了一个叫“立达学园”的教育机构。特别取名“学园”，表示和一般的学校不同。

章锡琛也是立达学会会员。立达许多人在开明书店出版书册，同开明编辑部的人关系很好。夏丏尊同立达关系很深，也是立达学园创始人之一。开明书店成立后，他一直帮忙，事实上可以说是开明书店的总编辑，不久他就放弃了教师生涯。开明书店的发展，同他的长期积极努力有很大关系，直到一九四六年夏丏尊逝世前，他一直在开明书店主持编辑部工作，是开明书店的元老。

（二）

开明书店办起来以后，为了宣传这家书店和它的出版物，大家又想在《新女性》之外，再办一个杂志，取名叫《一般》，表示读者的对象不限于妇女界，而是面向一般读者。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那时的开明书店，还没有一定的出版方针，而只是想出些人人都可以阅读，其实也可以不读的书。因之，《一般》出刊以后，也吸引了一些读者，但也只是一般的读者，所以是不稳定的。同时，在宣传方面，也没有特殊的功效。

因为稿件来源关系，原来想要出的是一般的书，但后来出版的却都是些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如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意大利亚米契斯原著）、刘薰宇编著的《趣味数学》、夏丏尊和刘薰宇合著的《文章作法》、刘薰宇编著的《马先生谈数学》，黄涵秋编著的《口琴

吹奏法》，还有丰子恺等编写的书。写稿人都是立达学园的教师，很适合于写这些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因此有一定的销路。

此外，文艺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书。如夏丏尊译的《绵被》（日本田山花袋原著）和《国木田独步集》，夏丏尊、章克标合译的《谷崎润一郎集》，章克标译的：《芥川龙之介集》、《菊池宽集》、《夏目漱石集》等。这些日本文学的翻译，原想出一套丛书，后来因种种关系，没有实现。

《一般》月刊因为基本撰稿人不多，外面来稿也少，加以编者对稿件质量要求高，所以越出越感到吃力。当时大家总结出了一句隽语：“开头是人拚命要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得人要拚命。”朱光潜在立达迁江湾时已到外国去了，他对《一般》也经常来稿支持。他写的是关于青少年修养的文章，后来编成了一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开明书店出版，作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

开明书店开办后的情况，大体上还算不错，坚持下去就有发展的前途。主持人看出了苗头，总结了经验，才确定了以中等学校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出版方针。

（三）

开店，办企业，资本是不可少的。开明书店初开办时，资金短少，先邀请杜海生当经理，带进了一点资本。后来店务发展，资金不足，又请范洗人来当经理，也是为了可以拉到更多的资金。

杜海生的经历，不很清楚，好象做过几任县知事，后来是教育界中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当过校长，当然不是很有财产的富人，不过既然那时值得开明借重，总也该是有一点资产的。范洗人是上虞人，我只知道他是范寿康的叔父。范寿康是在东京大学专攻

哲学的，他们是不是大富之家，也不明白。

发行很重要，出版了书销不出去，堆在栈房里，要出栈租和管理费，当然不行。好在章老板有位介弟章锡珊（也写作雪山），后来被叫做“二老板”的，原来也在商务印书馆发行部门工作，后来是沈阳分店经理。开明书店一开始就请他回来担任发行工作。由此可见章老板对于开明书店的经营，是破釜沉舟下了决心的。

搞好发行必须开分店，既可扩大营业，又能尽快回收资金。开明书店在北平、广州、汉口、长沙、杭州等地，陆续开设分店，最多时达二、三十家，几乎可以同商务、中华两大书店分庭抗礼，当然还有一家世界书局也在努力扩张，它比开明书店的实力更为雄厚。

（四）

开明书店的编辑部门由夏丏尊挂帅，最先进来襄助工作的是徐调孚、顾均正两人。他们原来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徐调孚是协助章锡琛编妇女杂志的。两人都是我中学同学，他们在浙江二中毕业后，考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练习生，一面努力自学，一面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对开明书店的发展壮大都有大功。赵景深和钱君匋进开明书店当编辑也较早，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赵景深在文艺方面，钱君匋在美术音乐方面都有不小的贡献。他们在工作起步时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他们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我自己在开明是处于宾友的地位，一度也曾作为工作人员领过工资，只是为时不长。当时开明书店计划在书店之外，办一所中学程度的函授学校。那时中学生入学问题很严重，办函授学校一方面可为升学的学生作自学辅导，为考不上大学的中学生作补课复习；另一方面又可以推销各学科的函授讲义，有助于书店业务的

发展。我被邀去编写函授学校的数学科讲义。

开明书店那时对出版物的报酬，采取抽版税的办法，签订出版合同，依照书籍销售的实际数字，付给书价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金额。函授讲义因估计销售数量必大，而且还有学生的作业要批改，质询要答复等等，所以用工资雇了些固定人员来负责。国文科方面，用人最多，有宋云彬、张同光、顾绮仲等人，选了些文言文，加以适当的注释，后来成为《开明活叶文选》，广泛发行。其他科目配备的人员，英文是方光焘、张沛霖，理化是程祥荣、顾均正、夏承法，史地由国文科方面的人兼顾，美术音乐方面有丰子恺、钱君匋等。

函授学校没有办成，因为用学校的名称，必须得到教育部门的许可，登记、注册等手续很麻烦，同时在“一二八”事变中，开明受到很大损失，只能暂时收缩，停办函授学校。我所编写的数学讲义，改出单行本，取名《开明中学数学自学讲义》，分算术、代数、几何三册出版。国文科的选文，作为《活叶文选》分别单篇出售，受到广大读者和大中学校的欢迎，一时门庭若市，售货员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开明已经有了一个地段较好的门市部，地点在四马路望平街，营业蒸蒸日上。

（五）

开明书店认识到一般的道路不容易走好，决定要以中学生读物为重点之后，就把《一般》杂志停刊，改出《中学生》。《中学生》创刊于一九三〇年一月，编辑人由夏丏尊、叶绍钧，章锡琛、顾均正四人署名，基本写作者，开头仍是《一般》的原班人马，后来特地邀请叶圣陶、胡墨林夫妇进编辑部，主要是编这本杂志。经过大家努力，

销路不断扩大,同时为开明书店的出版物作了很有效果的宣传,使开明这艘书舶一帆风顺地向前行驶。说开明的方向正确,并不是每一项措施、每一个计划都对头,其中有好些是失败的,或者根本没有执行。如上面提到的日本文学丛书,由于方针不明确,出了几种以后,也就没有继续出下去。如英汉对译读物是方光焘发起的,只出了一本汤姆斯·哈代的《姊姊的日记》一篇短篇小说,以后就没有续出,成了孤本。

开明还计划出一本较详明的汉语字典或词典。夏丏尊曾陆续抽空编写条目,参考几本日本的汉和辞典,写了些稿子,还得到王伯祥的合作,但始终无法完稿。后来只出了一本现成的朱起凤的《辞通》。

说到辞典,就附带说一说由我主编的《开明文学辞典》。其实也无所谓主编,只是开明不知从那里收购来的一部烂稿本,章老板不肯抛弃,委托我修订。我认为非大修不可,有些条目要完全重新写过。于是化了相当的工夫,并从大英百科全书中摘译了一些关于西译文学的材料,编成新的稿本,再由许多朋友审阅修改,编辑部同人在排校上费了不少心力,才算完成,得到了内行人的赞扬。

还有一个计划是翻印原版西文书,因为原版书很贵,如能翻印出来,价格低廉,一定得到欢迎,但有一个侵犯版权的问题。那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出版协会,原可以不受拘束,市上翻印的西书也不少,大都是数理化等的教科书,也有些文学名著的畅销书。不过开明不想照此办理。这个计划始终没有着手进行。这与人力、物力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开明不打算注重向外文方面发展。

(六)

开明虽然有许多不成功或未执行的计划，但也有实行得很好而且成功的事例，美成印刷所的开办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印刷的便利和印刷质量的提高，也为了有利可图，开明决定开办印刷所，章老板邀他的妻弟吴仲盐来主持。印刷所定名“美成”，承接开明书店的造货生意，从排版、打纸型到印刷、装订，全套成书项目组成一条龙。

为了把印刷所办好，从日本买来了自动万能铸字机和汉字字模，采用新型活字；同时，对于工人也从提高技术力量出发，雇用老工人，训练新工人，在工作上制订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所以后来美成印刷所的出品，质量相当好，在中小型印刷所中，可以说是佼佼者。

开明书店正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来了一个大大的打击。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开明书店正在战火剧烈的虹口区，受到很大损失。美成印刷所几乎到了不能恢复的程度。书店员工，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自动暂时休假，我也回到老家去休息。隔了一阵出来一看，还是疮痍满目，一时难以恢复，此后我就不到开明拿工资了。数学讲义的善后办法，讲定已完成的第一本算术的版权归书店，其他二册版权归编者所有，由书店付版税。

受到这次打击，开明只好后退一步，减少了人员，缩小了规模。

(七)

出版学校用的课本是项大宗生意，那时只有商务印书馆、中华

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四家经营。开明书店也有此打算，但势必同这几家大店发生矛盾，竞争的结果也许一败涂地，因而必须分外慎重，不敢轻率从事。恰好那时林语堂到了上海，开明书店同他洽谈编写英文教科书。这本是方光焘提出来的设想，他想自己编，可是迟迟不着手，所以章老板要另请高明。正好林语堂也早有此意，他正在上海闲着，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讲到报酬，不采用一般抽版税的办法，而是由书店每月支付一定的金额，作为林的生活费用，待书籍出版后陆续结算。谈妥后，林语堂就在上海安定下来，一心一意编写《开明英文教本》。

除英文教科书外，也出数学教科书，由周为群、刘薰宇和我三人合作分担。依照当时趋势，数学分科分年讲授有点过于陈旧，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美国布利氏的混合式中学数学教科书，但当时很少有人采用，还行不通。所以我们仍采用了分科的办法，但稍加变化，作为过渡，出书之后，得到相当数量的采用者，对数学教育有些推进。

教科书没有象原来设想的那么快就出版，因为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批，再依照审查意见修订，而且不止一次地修改，意外地费了不少时间。英文课本好象比较省力一些，可能林语堂同教育部有关系，可以从旁催促，所以比数学教科书出版得早些。总之，两种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和推广，都没有受到特殊的阻力。可能是因为《中学生》杂志的宣传、广告效果较大，因而占了意外的便宜，使开明的教科书站住脚了。章老板十分得意，开明书店要逐步挤进大书店的行列中去了。

(八)

从前学校里一般的见解，国文、英文、算学是主要科目。在这三个科目中，开明的教科书已有了英文、算学两种，可是没有出版国文教本，这是因为它已经出版了活页文选可以代替国文教科书。而且五四运动以来，语体文逐步发展，学校里已开始教语体文，文言文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所以不出国文教科书是上策。

开明虽然不出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本，但还是出了已经定局的国语课本。供小学用的《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图，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十二册一整套。销售数字及行销范围，我不详悉，估计是以上海为主，对外埠不加注意。这样，在发行方面较便利，同时与大书店的矛盾也不致激化。

对于中等学校的教科书，开明还是毫不放松，又重拾函授学校的计划。于是，用开明中学函授学校出版社的名义开出一套书目，内有张若樵编写的开明实用文讲义，刘薰宇编写的开明算术、代数、几何讲义，林语堂、林函编写的开明英文讲义，沈乃起、夏承法编写的开明物理讲义，程祥荣编写的开明化学讲义，丰子恺编写的开明音乐、图画讲义，叶圣陶、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编写的开明国文讲义。除了生物、史、地及伦理、心理、生理外，中学课程差不多全有了。

函授学校对教育方面说来，确是十分必要的事业，但在旧社会，这事办起来不容易，必须要有相当的人力物力。开明函授学校勉强办了一年，实际恐怕只有几个月，就以批改作业负担过重而停办。

有一件事可以一提，那就是为了《开明英文教本》版权被侵犯

而同世界书局打官司。事实是林汉达也编写了一部英文教科书，由世界书局出版，而林语堂认为林汉达编的书有抄袭他的地方，为维护他的著作权，提出了诉讼。结果世界书局败诉，开明书店胜诉。对这一事件，林汉达认为他之所以败诉是因为林语堂有博士头衔之故，因而奋发图强，后来也到美国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并写了通俗历史故事《上下五千年》，蜚声文坛，名重一时，可说是因祸得福。

这场官司，也给开明书店做了一次出色的宣传，使开明英文教本大大增加了销路。但有人说林语堂因为编写这本书而发了财，这恐怕有点过甚其辞。

（九）

开明书店日益壮大，也表现在出版了《二十五史》。那时大书店都出大部头的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等，有的影印，有的排印，连中小书店也争出大部头的、厚墩墩的书来撑场面。当时中国造纸工业非常微弱，纸张大都靠进口，但价格低廉，最低时每令只一元左右。因之广益书局、会文堂书局，还有临时拼凑起来的大达图书公司等旧书坊，纷纷印古旧书，包括古旧笔记、小说之类的杂书，售价是照码一折八扣，曾风行一时。开明书店之所以能出《二十五史》，可能也是受纸价低廉之赐。

《二十五史》就是在通常的《二十四史》外，再加上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明代宋濂等所撰的《元史》，因急于完成而较草率，向为人所不满。柯劭忞致力于元史研究，广泛搜集资料，悉心考证核对，撰写了一部新的元史，很受人重视。所以开明仿照《唐书》、《五

代史》新旧并列之例，把新元史和原来的元史合刊，就叫《二十五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大宝库，卷帙浩繁，版本很多，要采用最好的版本，十分吃力。商务印书馆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以古本作号召的。开明不这样做，而是采用清朝官方整理过的《殿本》作底本加以缩印，这样就有统一的规格，制版、印刷上很方便。开明书店出《二十五史》，目的只是供人们查阅，字尽量小，但也装成了九大本，可以放在案头当历史大辞典之用，因而有一定的销路。

《二十五史》价格不贵，出版成功。于是照这条路子，又出了《二十五史补编》几大本，内容是清朝几个著名的史学家关于典章制度的著作，或是专题研究，或是对史书所缺的表、志等进行的补作，在学术上都有一定价值，是高级出版物，虽然销路较窄狭，但表示了开明书店正在力求提高自己在文化界的地位。

开明的出版物，向来以中学生参考书、课外读物作重点，但对于文艺及社会科学也较注重。文艺书籍面向一般，销路较好。社会科学多半是进步人士作品，深得青年拥护，如沈端先译的倍倍尔原著《妇人论》，就是一本大书。还有夏承法译的《经济地理学》等，可算开风气之先。

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因为章锡琛是从商务出来的，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在商务编译所，所以他们的书，开明出得多些，属于创造社方面的比较少，但也从不拒绝，门向各方面开着。鲁迅的著作，一向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一度与北新店主李小峰有矛盾，因此，他的作品有交其他书店出版的意思。开明书店方面好象托人去洽谈过。夏丏尊和鲁迅本来是老朋友，但夏丏尊和鲁迅洽谈

却没有谈拢。所以，除了鲁迅、郭沫若之外，在开明书店出版过书册的，从茅盾、巴金开始，几乎网罗了所有文化界、著作界的人士。

（十）

开明书店日益发展壮大，挤进了大书店的行列。为了应付当时的政治环境，请邵力子做董事长，用这块招牌来对付国民党官方，也不显得过分左倾，以免招来意外麻烦。我忘了邵力子是什么时候来开明入股的，据说开明十分困难时，他曾调度了不少资金，让美成印刷所得以重建，那么他同开明的关系是很早就存在了。

开明书店一跃而上，挤到四马路上开设门市部。在河南路西首，中华书局斜对面，一排七开间的店面，坐北朝南，虽然不是高楼，却也可以说是气派堂堂的一家大店铺，远远超过了一般中小书店的架势。

开明书店的发展确实很是迅速，从闸北破烂的弄堂房子起家，到在四马路上开门市部，仅用了十年功夫。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除出版方针正确和经营管理得法外，内部团结得好，也是重要的一点。

开头因为资本短少，鼓励职工和作家投资入股，不论金额多少，即使只认十元一股也可以，目的是以此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对于著作人还以应付的稿费或版税来抵充股份，招其入股。在同事之间，讲求平等，不问职位大小高低，一视同仁，并且希望大家都是股东，以求利害一致，加强团结。在开明任职的人，在离职后很少对它有怨恨和仇视的。

比如赵景深，很早就在开明任职，而且出版《柴霍甫短篇小说

集》八册之多。后来他到北新书局工作，但对开明仍然很关心。又如钱君匋，也是很早就在开明工作的，后到澄衷学堂教书，仍旧肯对开明帮忙，作了很多书册的封面图案及装帧设计，后来他自己经营了一家万叶书店，对开明也没有同行嫉妒情事。又如索非，原来的姓名不详，信奉无政府主义，与巴金非常友好，巴金在开明出版的书，大都是经过他介绍的。他在开明只是一个出版部门的普通职员，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因之他自己出去开了小书店之后，仍念念不忘开明的旧友。至于本来不是店工，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始终不渝，如方光焘、丰子恺、刘叔琴、刘薰宇、周予同、胡愈之等，都可以说是开明书店的知己朋友。由于大家都有相同的事业心，意气相投，感情融洽，相处犹如一家人。又如夏丏尊和叶圣陶，章锡琛和王伯祥，还先后结成了儿女亲家，一时传为佳话。

（十一）

为纪念创办十周年，开明书店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学生》以外，创办了《新少年》半月刊，向更年轻的一代提供精神食粮。新少年社社长由夏丏尊担任，编辑是叶圣陶、金仲华、徐调孚、贾祖璋等四人。

作为纪念，还出了以《十年》为名的文学作品选集，分上下二册，收了当时许多著名作家每人一篇小说。上册也叫正篇，由夏丏尊作序，刊有鲁彦的《银变》、老舍的《且说屋里》、张天翼的《一件小事》、靳以的《雪朝》、王统照的《站长》、巴金的《星》、徐霞村的《裁判员》、吴组缃的《某日》、施蛰存的《嫡裔》、李健吾的《中国的最后一课》、丁玲的《一月二十三日》、凌叔华的《死》、萧乾的《鹏程》和叶圣

陶的《英文教授》。下册也叫续篇，刊有蹇先艾的《谜》、郑伯奇的《烟》、艾芜的《海岛上》、沙汀的《逃难》、芦焚的《马兰》、沈从文的《主妇》、周文的《爱》、萧军的《四条腿的人》、端木蕻良的《乡愁》、蒋牧良的《报复》、茅盾的《牛的故事》和夏丏尊的《流弹》。

一九三七年一月，又创办了一本综合性的大型文摘杂志《月报》，看来是要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争一高下。这个月报社由夏丏尊任社长，内容分门别类，胡愈之主持政治类，孙怀仁主持经济类，邵宗汉主持社会类，胡仲持主持学术类，叶圣陶主持文艺类，还有金仲华参加实际工作，一发刊就气势不凡，表明了这时正是开明书店的黄金时代。

八·一三战役发生，开明书店的编辑、出版发行部门以及货栈和美成印刷所，遭到猛烈炮击及空袭轰炸，受到巨大损失，期刊《月报》、《中学生》、《新少年》停刊。幸而四马路还有那个体面的门市部，后面也有个小货栈，还可以继续营业。

大势所趋，非内迁不可。章老板同经理范洗人、编辑主任叶圣陶到杭州与该店汉口分店经理章雪舟（雪村弟）交换意见，再去汉口实地考察，想在汉口筹建编辑部，并整顿战火中的残余，把书籍、纸张和美成印刷所的印刷机器及材料，装上船，由长江上溯，预备搬到汉口。这批物资在镇江白莲泾附近遭到盗匪打劫，损失浩大，在汉口筹建编辑部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抗战初期，上海租界形成孤岛，许多比邻地方的学校和学生多来租界避难，一时私立学校大增，所以开明书店的门市部，有生意可做，当然经济情况不好，书店要紧缩各项开支。后来把这个堂皇的门市部关了，另外租了个单间门面的铺面，回到了中小书店的规模。那个地点就在原址旁侧，只隔开一条小弄，是原来“一家春”西

菜馆的楼下。但原址还保留了后面的假三层房子，底层用作货栈，上面做缩小了规模的办公室，作为开明困守孤岛的神经中心。章锡琛、夏丏尊、王伯祥等人，虽不天天来办公，但也常来坐镇这个留守府。

为什么要叫它“留守府”呢？因为战事发生之后，大部分人去内地，范洗人、叶圣陶先到重庆，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开明书店驻渝办事处，由范洗人坐镇。叶圣陶又往来于武汉、成都等地，做大学教师及刊物编辑等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从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重新回到新成立的开明书店成都办事处，主持编辑事务。

当时桂林地位特殊，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开明书店的桂林分店成了在后方比较活跃的单位。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学生》杂志改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复刊。此事系由傅彬然、贾祖璋发起，由他们负实际编辑责任，推叶圣陶出面担任社长及主编的名义。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到一九四四年七月随店由桂林撤迁到重庆。一九四五年七月，又在重庆创办了《开明少年》杂志，由叶圣陶、贾祖璋、唐锡光、叶至善主编。那时开明书店从困厄中逐渐复苏过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开进租界，把租界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开始对抗日活动加强压迫，取缔和没收带有抗日色彩的书刊和宣传品。十二月二十六日，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五大书店悉被查封，出版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书籍还是不可少的，广大沦陷区的学校还是在伪组织之下开着，青年学生还是在学校里学习，大量的教科书还是要由上海书店来供应。于是一个以出版中小学校教科书为业务的联合机构组织了起来，敌伪要求各大书店都参加，开明也被邀参加。大约

以此为条件，把书店启封，仍旧让做生意，但以不反日为条件。其实暗中斗争很剧烈。一九四四年约五月间，章锡琛、夏丏尊二人曾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其他被逮捕的还很多。后来章、夏二人经过有关人士的疏通，总算放了出来，而开明书店留守府仍然屹立不动。

（十二）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二月，《中学生》杂志重新迁回上海出版，由叶圣陶、顾均正、傅彬然、徐调孚主编。另一本杂志《开明少年》也由重庆迁来上海，由叶圣陶、贾祖璋、唐锡光、叶至善主编。此时开明书店在上海恢复工作的部署已经大体完成。

同年四月二十三日，长期在开明主持编辑工作的夏丏尊因病逝世。他一开始就同章老板合作，晚年象不大管事，但任何事情，章老板总要和他商量。他的逝世，使开明失去一位元勋。

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开明书店开业二十周年，开了一个纪念会，茅盾到会致贺词，表扬了开明的功绩。开明还出了一本论文集作为纪念。

这本《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叶圣陶主编，并写了一篇序文，到次年三月才出版。书中收录吕叔湘、郭绍虞、郭沫若、钱锺书、王了一、游国恩、顾颉刚、翦伯赞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十篇。这时开明书店终于度过了难关，并且整顿了一番，在北四川路祥德里设置了编辑部，加紧工作。

学校教科书仍旧出版，先后出有《少年国语读本》（一至四册，叶圣陶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共三册，叶圣陶、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专选文言文，另有甲种本专选语体文，已先

出),《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叶圣陶合编),《开明文言文读本》共三册(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合编)。还出版了小学用书,是叶圣陶撰写的《儿童国语读本》及《幼童国语读本》,都是一至四册,幼童读本由丰子恺作画。此外仍以中学生参考书、课外读物以及文艺作品为大宗,继续出版。这个时期,局势动荡,经济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意难做。国民党挑起内战之后,形势更加恶化,上海各书店争以配给的纸张为牟利手段,开明书店要造货,自然要多积存一些纸张,这方面很作了些奋斗。

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计划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的精简本,开头想先出二十册,结果只出了十册。当时我赋闲在家,他们让我承担了几本。另外也找陶亢德等写了几本,可能是销路不大好,所以后来不再继续出书。这次十册书的选定,不知由谁主持,都是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由于时间匆促,有些撰写人不够认真,可能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书目大部分已忘记,只记得其中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我改写的;还有一本《保卫察里津》。

其实,这类特大长篇作品,确有必要改写成精简本,以供一般人阅读。开明书店曾出版过宋云彬改编的《洁本水浒传》,为此种工作开了头。世界文学名著中的长篇,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等,阅读起来太费时,现在还是应该可以有精简本的。

(十三)

解放后,开明书店很多早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此时走上了新岗位,负担了重要的责任。如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任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金仲华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叶圣陶转任教育部副部长,傅彬然、贾祖璋等人,都到教育部当司、科级干部,其

他还有些人也改业从政。开明书店留下来的人，编辑部里就只有顾均正、徐调孚、周振甫和叶至善等，章老板当然也不可能大权独揽了。后来开明书店与群益书社合并，成为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顾均正被任为副社长。开明书店原来的书籍，依照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性质和出版方针，予以甄别，把许多不适合的书都淘汰了。当然，书店原来的员工，除章老板及二老板之外，都进入新单位，各安其位。

开明书店的人，总还有一点开明的作风，在结束店务时，对章老板的多年辛勤工作表示感谢，赠送了三千元人民币，作为纪念。至于清产核资等等，是财务、会计人员的事，我不很明白。总之，开明书店可以说是善始善终，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上海雷士德工学院

郑 朝 强

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建成开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四年停办，历史并不长，延续时间仅十年。我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该校任教，一九四三年二月学校被日本侵略军接管，英籍校长和教师都被关进集中营，我也辞职离开，前后共六年，兹将我所知情况追述于下。

亨利·雷士德其人

雷士德工学院是英国人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单独出资开办和维持的。他出生于一八三九年，受过高等教育，所学专业为土木工程和建筑。一八六七年他二十八岁时，由英来沪当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去世，在沪时间长达五十九年。他一直从事房屋设计和建筑工作，去世前曾与约翰逊(Johnson)、马力斯(Gordon Morriss)合伙开设德和洋行(一称雷、约、马、建筑师和测绘师事务所—Lester, Johnson & Morriss, Architects and Surveyors)。几十年中他设计了不少英国式的房屋，据说北京路近外滩一带的楼房，例如目前上海广播事业管理局的那座楼房，以及虹口大名路上不少类似的楼房，都是他设计建造的。

他孑然一身，自奉甚俭，从未成家，也不购置住宅，在沪数十年

都栖身在英侨总会里。作为建筑工程师，他赚钱不少，主要用以经营房地产。过去南京路上先施公司的那座房屋（今为上海服装店），就是他购置的产业。他去世前留有遗嘱，详尽地制订计划，要求把他的全部遗产用于在上海推进理工教育和医疗事业。单就工学院而言，据闻他连建校地址、校舍建筑、课程设置、学生人数以及校领导和教师待遇等都订入计划。他的总计划为：（一）建立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称仁济医院（英文名为 Lester Hospital，该医院设在山东路，即现在的第三人民医院）。（二）建立雷士德医药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三）建立雷士德工学院及附设中专，设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这些机构所在的地产都是他的，也是他在遗嘱中选定的，还规定如尚有多余资金，就用以扩大工学院的规模。

他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逝世，终年八十七岁，葬于静安万国公墓（今改静安公园）。死后一年，即一九二七年，他所遗资产总值为一千四百三十四万三千八百一十二点三两银子。到一九三二年，因产业涨价，总值增至近二千万两。他死后，根据他的遗嘱成立的雷士德工学院，规模比他在世时所计划的要大得多。

关于他的历史，在一九三七年某日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有较详细的叙述，以上只是我凭记忆所及略述梗概。他在上海发迹主要是靠经营地产。但他与同样靠地产发财的沙逊和哈同这两个英籍犹太人有所不同。他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来上海，是用他的建筑工程技术为上海的初期建设做过贡献的，不象沙逊和哈同那样，依仗帝国主义势力，贩卖鸦片和放高利贷，坑害我国人民，以及操纵上海地价，强取豪夺。他也不象沙逊和哈同那样穷奢极侈，挥霍我国人民的血汗，甚至干涉我们国家的政治，

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他生前吝惜资财，不谋享受，死后将全部遗产用于上海教育和医疗事业，更是沙逊和哈同之流所望尘莫及。

筹办工学院经过

雷士德死后，为履行其遗嘱，在他逝世一周年的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照他所拟的计划，组成了雷士德遗产管理委员会(The Lester Trust)，由五个委员组成，其中一人为主任，另有一人为秘书。华德(H. Lipson Ward)和马斯德(R. F. Chester Master)曾先后当主任；与雷士德合伙搞房屋建筑的马力斯，以及内雄(W. Nation)、贝尔(A. D. Bell)、波特(H. Porter)、帕森斯(E. E. Parsons)和麦克唐纳(R. G. Mac Donald)等先后充当委员。秘书一职一直由在沪设有事务所的会计师威尔金森(E. S. Wilkinson)担任。

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按照雷的遗嘱进行筹设医药研究所和工学院的工作。雷士德医药研究所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先行成立(这个所现已改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工学院和附设中专的英文名称为 The Lester School and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中文名称原系照英文生硬地译出，其全文为“雷氏德工业职业学校及雷氏德工艺专科学校”，后来学生们对这中文名称大有意见，就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改用“雷士德工学院”这个比较简洁的名称。学校原只计划提供总额三百多名学生的设备，任何国籍的学生都收，但主要收华籍学生。后来因经费充足，设备有很大扩充，学生名额也随之增多。

遗产管委会的委员们对创设医药研究所和创办工学院毫无经验，因此首先向香港大学提出谘询，请求协助。港大校长派遣厄尔

(H. G. Earle)博士作为代表充当委员会顾问。厄尔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来到上海,经研究后提出一份报告,并建议将工学院和中专合设在一处。这个报告被委员会采纳,翌年(一九二八年)八月,获得法官格仁(Peter Grain)爵士的裁定(按照英国法律,执行死者遗嘱,必须先获得法官裁定),将学校设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这地方原为虹口地区的一个闹市,不宜设校,但因遗嘱中有此指定,不得更改。为使筹设学校的计划顺利进行,委员会特请香港大学的布朗(Walter Brown)教授前往英国,调查了解英国国内办科技教育的方法,以及把这些方法应用于上海的可能性。他的调研工作历时两年多,在一九三一年提出一份详尽的报告。由于那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衰退,银价涨落无常,金融情况不稳定,委员会推迟了关于建校的最后决定,直到一年后才继续按计划进行。此时雷氏遗产已增值四成,有助于计划的扩充。

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三三年之交的冬季,伦敦北方专科学校(The Northern Polytechnic, London)的退休校长克莱(R. S. Clay)博士来沪访问,委员会请他审查已经拟订的设校计划。他强调工学院与附设中专合在一处是适当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伦敦大学工学士、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李赉博(Bertram Lillie)被任命为工学院和附设中专的校长。他在简单考察了英国一些有名的工科学院后,于同年九月初抵达上海。此时因建校计划已延缓过久,建造校舍的工作必须尽速进行,而且校舍建筑和校内设备必须符合各种形式教育的要求,因此,除招收一般学生外,还决定开办夜校,培训业余学生。

校舍设计拟定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举行奠基典礼,基石由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John Brenan)和当时我国教育部

长王世杰共同植置。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一座耗资一百万银元的壮丽校舍即已建成，并于十月一日启用。其规模甚大，装饰甚美，屋内的墙壁、门窗、楼梯、地板和盥洗间都甚考究，并装有暖气设备。此外还装有专供校长和教师使用的自动电梯，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属罕见。因为校舍壮丽，大礼堂比较宽敞，在沪的英国文化协会和国际性的中国工程师协会都曾借用来召开大会。

一九三四年三月，在英国聘请了七个人作为教职员的核心，八月底他们到沪任职，同时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日校在十月八日开始，夜校在十一月五日开始。

学 校 概 况

这个学校设有日校和夜校。日校包括学院、附设中专(高中)和初中三部分，其规模在当时可说不小，校舍和设备也可说十分完善。学院设有建筑和土木工程系及机械(包括电机)工程系。夜校设有机械、建筑、土木施工、电气安装、化工、无线电工程等专业。这些系科和专业的设置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当时上海的洋商企事业单位服务为主要目标，校舍和设备完全按系科和专业的要求建造和购置。

校舍为一座大楼房，中间三层和两翼都供教学之用，后来在后面又费资十七万五千元增建一翼平顶房屋，准备再加层添建。楼的大门廊当中墙上挂有雷士德的油画立像，这是除校名外用以纪念雷氏的唯一象征。除教室外，楼内设有各种工场和实验室，还有大礼堂、图书室、博物室、校长教职员办公与备课室、教师和学生食堂及厨房等。大楼总面积约八千平方米。各工场和实验室的机器设备耗资六十万元，都是当时最新和最齐全的，而且专供教学使

用,具有多种功能。所有课桌椅和家具都相当考究,黑板是可以上下滑动的两块大石板,极便使用。学校聘请一个退职的船长当校舍管理员,下面雇有不少清洁工人,每日不停地揩擦、扫除、冲刷、打腊,使室内外常保清洁。这个校舍的唯一缺点为太近闹市,噪音过多,不免影响上课。这学校设备虽好,可是容纳的学生并不多。学生全部是华籍,抗战前夕的一九三七年春季,学生最多,但上全日课的包括学院、中专和初中三部分学生在内,仅有四百五十多人,上夜课的仅有一千二百多人。

学院与中专合在一起,直接由校长和注册主任两人管理,许多教师同时教学院和中专。初中设在三楼,具有半独立性质,由一个英籍人当主任,所有教师都为华人。学院和中专的教师除两三个华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学院教师一律称讲师,不过每系有一个主任和一个高级讲师。工场和实验室里设有助理员。教师的人数非常少,日校教师最多时学院部只有二十七人,初中部只有八人。夜校教师除由日校教师兼任外,另聘兼职的教师,多半为在职工程师,最多时二十人。教师的待遇颇为优厚,除工资外还免费供应午餐,晚上有课时,可以在校吃晚餐或晚点,仅需付少许费用。外籍教师有两类,一类是从英国请来的,占大多数;一类是在上海聘请的。华籍初中教师每月工资都在一百元以上,多的超过二百元,而且规定逐年增加。我在学院当讲师,试用三个月,每月支薪二百四十元,后月薪定为三百元,并规定每年加月薪十五元,直到四百五十元为止。聘任合约是在学校指定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除自请辞职或因故被学校辞退外,可以继续任职到退休。学校还订有储蓄金办法,每月由教师交纳工资的百分之五,再由学校加付百分之十,统存以利储蓄,到教师离校时本利一次领回。因为教师们的职业有

了保证,待遇在当时相当高,因此工作比较认真。

英国人的等级观念非常浓厚,学院部的教师,不论外籍或华籍,都在二楼食堂用膳,吃的是西餐西点,质量相当好。在这个食堂里,校长有其专座。初中部的华籍教师则限在三楼学生食堂里用膳,吃的是中餐。不但吃饭分开,就连盥洗间也分开,在二楼有学院教师的专用盥洗间,校长有独用的一间,初中部教师则与学生共用三楼的盥洗间。校长的权力很大,学生无论什么事都得经他批准。在学校每年印发的概况说明的扉页上,都印有“校长拥有拒绝任何学生申请入学而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权力”的字样。他还经常在课间走进教室,视察学生出席和教师讲课的情况。有学位的教师在讲课时都要穿学士服。这个学校的学生不多,收费不高,而开销却相当大,据估计培养一个工学院学生,学校要花费大约五千元。

学校定有校徽,有的学生穿制服,其上装胸前镶有校徽。学校还定有校训:“苦心志,劳筋骨”,系摘自我国的古训。

初中学制三年,着重德、智、体教育,奠定进中专的基础。新生年龄必须小于十三岁,并通过中文、英语、算术考试,入学后学习的主要课程也为中文、英语和数学。中文课包括文、史、地和公民,学生的作文规定须用毛笔书写,要求字迹工整。英语课要求学生熟练讲、读、写,数学课全用英语讲授。此外,学生还要学习理化和生物的基本知识,也用英语讲授,同时也学简单制图。每周都有体育课,有体操和球类运动。初中一、二年级每周上课五个全天,三年级星期六上午上半天课。学生可以在校吃午餐。

中专的学制也为三年,课程结合一般高中课程和技术课程,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能在毕业后进入学院继续深造,或进入工程单位担任低级技术工作。成绩较优的学生得以报名参加伦敦大学的入

学考试,倘获通过,就可以免去加入英国土木工程师会或英国机械工程师会的初试。我有几个学生在沪参加过这种入学考试,并获得通过。中专学生的入学年龄不得小于十四岁,必须具有初中毕业程度,并通过中、英、数的考试。非华裔学生也可入学,但免试中文。课程每年都要学中文(非华裔学生改学法语)、英语、数学、物理、制图和体育,此外要学两年的化学、力学和地理(要熟悉工程材料产地)。在三年中,学生每学期都要在各工场练习各工程项目的操作,每星期三个半天。因为学建筑工程和学机械工程的学生系分班上课,故他们的课程和工场实习内容有所不同。除中、法文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授。对于准备参加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学校特别给以机会,多教些应考的学科,同时减少工场实习的时间。中专毕业生可得雷氏遗产管委会颁发的文凭,倘欲参加工作,委员会可以介绍他们到在沪各洋商企业当学徒。

学院的学制开始时定为三年,一九三八年改起改为四年。学生按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分为A、B两班,其专业课内容有所不同,但数学都要连续学三、四年,第一年都要学物理和化学。学生入学都要通过英、数、理、化和力学考试。学生来源除学院的附设中专外,主要为当时租界和教会办的中学。已经通过英国各大学入学考试和上海圣芳济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入学,但必须先经校长许可。上课时间为每周五天半,每天上下午各三节课,全部排满。为使学生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每周有不少时间在工场或实验室上课或实习。学生必须各科成绩及格,才能得到毕业文凭。毕业生做过一年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并写出一篇得到认可的论文后,学院可以吸收他为院士。毕业生得以进入上海各大洋商企事业单位,担任较重要的工程技术职务。事实上,学院毕业生进入上海电力

公司等公用事业和怡和洋行等洋商企业工作的也不少。同时也有一些毕业生被推荐入当时政府的建设和工程部门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抗战期间洋商业务压缩，不需要添补新人。当然出国深造或自谋其他工作的也有。曾取得伦敦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在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参加该大学的中期考试，二年后参加终考的第一部分，四年后（即毕业后）参加最后考试，通过一级才可以参加上一级的考试。倘最后考试得以通过，则被该大学授以校外理学士的学位。这些考试就在上海举行，由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派人监考，试卷由伦敦寄来，考后寄往伦敦大学评阅。学院所以能取得伦敦大学的许可，让学生参加校外学位的考试，系因该大学曾派教授来审查了解教学条件，认为符合要求，因此成为当时除香港大学外，在远东取得伦敦大学认可的唯一学院。

夜校的学制一般定为七年，学生每周至少要上三个晚上的课，经过特别准许的可以选学单科。学校对于夜校学生管理很严，非经批准不得迟到、早退或缺席，作业必须按期交与老师，否则取消学籍。夜校学生多数来自各洋商单位，年龄不一，基本上都是工人或小职员。入学前他们都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但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通过学习，可以在原单位得到升级和加薪，因此参加的人相当踊跃。学费头三年每年十五元，以后每年二十元，只学单科的每年十元，有的人是单位出资送来学习的。夜校开课的专业除机械和土木建筑工程外，还有电工、化工、无线电工等。开头两年，学生都要先学英语、数学和机械制图。

由于要求很严，课外作业布置得相当多，因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淘汰的不少。如机械工程系第一班学生在第一年有四十几名，到毕业时仅剩十多名，几乎有三分之二被淘汰。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一些公用事业和洋商以及中国工程师协会(在沪的国际性工程师组织)都设立奖学金，发给成绩优良的学院和夜校学生。学院和夜校基本上都不用课本，所有课程都由教师按要求编写讲义讲授，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抄或听写。学校还设有文具纸张出售部，低于市价售给学生。

在中专里，外籍学生很少，学院和夜校里，外籍的很多，英、法、西、葡等欧洲国家和印、菲等亚洲国家的人都有。教师以英籍占绝大多数，故在校内英语为通用语言。学校的所有各部分都只收男生，教师中仅有一个教英语的女教师，但办公室职员和图书馆员都为英籍少女。

这个学校虽为英国人所办，但与教会丝毫无关，因此校内没有宗教气氛。除雷士德逝世纪念日师生们往静安万国公墓祭扫外，其他教学外的活动很少。学院学生曾组织一个工程学会，邀请校外工程专家讲演，有一些学生参加中国工程师协会为学生会员。此外，我还记得学生们开过一次音乐会。

学校在开办前就向南京政府立案注册。一九三六年夏，教育部曾委托学院办过一期全国性的高等工程学校教师进修班。除此以外，我没有听到国民党政府对这学校有过什么干预，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政界要人送其子弟入学。

为了管理校务，在雷氏遗产管委会下面，设立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其中一人为校长，一人为遗产管委会的秘书，两人由遗产管委会委员兼任，这两人中有波特一人当主任。在校内管理学校的仅有校长李贻博和注册主任桑顿(A. E. Thornton)两人。所有教师都只管授课，不管校务，兼当系主任的也只管系内事务。后来为审定毕业文凭的颁发，学校另行组织一个校外考核人

委员会,由校长兼充主任,七个校外工程技术人员当委员,其中一人由教育部指派。

开办以后和夭折原因

学院和中专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开始上课,当时初中部尚未开办,学生总数仅一百十四人。夜校于同年十一月五日开始上课,每星期总共只设五十二课,学生总数为六百〇二人。一九三五年秋,日校学生增至二百十六人,夜校学生增至九百七十三人。一九三六年夏,原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英华学校停办,其校长纽沙姆(G. F. C. Newsam)在九月被聘为新设的初中部主任,兼任学院和中专的英语系主任。这一年秋的学生人数达到最高峰,日校有四百五十八人,夜校有一千二百十人。

从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夏这三年中,学校情况蒸蒸日上。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九日,为启用新建的机械和电机实验室,学校曾举行一个隆重仪式,邀请英驻华大使哈格森(H. K. Hugessen)主持。其后学校曾于雷氏逝世纪念日对外开放一天,让师生的亲属来校参观。不久,八·一三战事发生,虹口地区被占,校务因而停顿。从这以后,这个学校进入多灾多难的年代,不断遭受种种挫折,以致于过早消逝。

首先,因为学校所在的虹口地区战火连续数月,学校无法开学,临时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五六三弄一座洋房里开初中部的课,为期一年。因为既无实验室,又乏工场,连中专部分都无法开课。到一九三八年秋,战火虽已远离上海,但虹口地区仍被日军控制。经与日方交涉,才让日校在校舍内恢复开课,学生们每日来去都要乘租用的大客车,由实验室助理教师英人麦克令(H. Y. Mc-

lean)护送。汽车停在白渡桥南端外滩公园外面,过桥时都要停下,让日兵上车检查进入虹口的许可证,并点算人数。回来时也一样。中国教师过桥要向日兵出示通行证,还要鞠躬。不但过白渡桥如此,就是过里虹桥也如此。因为许多学生害怕或不愿过桥到虹口地区学习,这一年的学生人数猛减。夜校则分在南京东路电力公司楼上和福建中路电话公司楼上开课,只设电气专业,学生人数也大为减少。当学校初在虹口恢复开课时,东长治路一带几乎路无人行,以后从苏州河南面过去的人才逐渐增多。一年后,日方对虹口地区的控制逐渐松弛,后来不需要凭通行证进去,故从一九三九年秋起,学生逐渐增多,但始终没有恢复到一九三六年秋的人数。后来夜校也迁回上课,但专业仍大大缩减,学生人数也少。由于战火的影响,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有若干英籍教师回国不返,教师从二十七人减至二十人,以后复逐渐减少到十七人,同时教师的质量也差了。为补充教师的不足,一九四一年以后,聘用了两个从德国逃难来的犹太籍德国人,一个白俄人和一个兼职华人授课。

一九四〇年,李贲博校长回国休假归来,在外虹桥因与日军哨兵争执,遭车祸伤重死亡,就由桑顿代理校长职务,同时仍兼注册主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在沪的英美单位都被军事管制,许多英美籍人被关进集中营,但雷校的英籍人仍然继续工作,一切教学都照常进行。日方只对学校的经济加以管制,一切用款都要经其批准,教师待遇等没有改变,如此维持了一年。一九四二年底,日本的侵略战争开始失利,所有英籍人都被关进集中营,由日方派同文书院的院长池田来兼雷校的负责人,并派日人接管办公室,学校的教学工作由那个白俄人负责,临时找几个兼职教师

维持。到一九四四年,校舍被日本海军占用,学校因而结束。

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爱国同胞无不义愤填膺,雷士德学校的学生和职工也不例外。一九三八年秋恢复在虹口上课以后,曾先后发生化学实验室助理员和一个学生因有抗日行为被捕的事件。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学校里有个地下组织,暗中与进步学生和职工一起与日伪作斗争。据我所知,有几位那时的地下党员,今天在我国外交方面担任重要职务。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关在集中营的英国人既获自由,当即谋求恢复开学。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无法实现。(一)被日海军占用的校舍被国民党海军作为战利品“劫收”。学校负责人以及雷氏遗产管委会多次向南京政府交涉,都毫无效果。校舍被劫收以后,一切木器和木制品,包括楼梯栏杆上的扶手木条,都被蒋军官兵卖掉或当柴火烧掉,一切可以拆下的金属机件,都被当作废铜烂铁卖掉或毁掉,即使校舍得以收回,学校恢复也非易事。(二)雷氏遗产很大一部分资金借给在沪洋商单位,由它们提出抵押品作保证。因伪币贬值,贷出之款随而贬值,几乎损失殆尽,有的抵押品被日军蹂躏糟蹋,变得分文不值或荡然无存,也有些资金被管委会委员中饱。因此要完全恢复这学校,经济上也存在困难。学校既无法复开,英籍人员当即被遣散,由国外来的都离沪他去。华籍教师所存的储蓄金本息直到解放后清理战前存款时,才得从遗产管委会秘书威尔金森所设的会计师事务所领回。

解放后,雷士德工学院经国家修理利用,现在是上海海员医院。未损失的机器设备,国家也曾加以充分利用。有一部我操作过的多用途材料试验机被拨给某单位使用,因为该机有点损坏,该单位曾于一九五二年向怡和洋行(这机器原是该行经手由英国进

口的，1952年该行尚在沪）询问，要求代为向生产此机的艾佛利（AVERY）厂索取图样及说明。该厂竟荒谬地回答说：“如果在国内的中国工程师没有完全被处死，这机器一定会有人了解”，并拒绝提供图样和说明。这时期正在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大造谣言，污蔑我国。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在怡和洋行工作的我的葡籍学生布拉加（Braga），他告诉我这消息，我听了非常气愤，当即要他写信告知艾佛利厂：“用过这部机器的唯一中国工程师还生活得很好，他还留有一张自己绘的该机图样。”后来我把描有这图样的透明纸给他，叫他转与需要的单位。因为我再也没有遇见他，不知道他曾否照我讲的做。但从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学校的机器设备都得到妥善的利用。

雷士德工学院存在仅仅十年，而在这十年期间又屡遭挫折，因此它只是昙花一现。但在它短短的寿命里，曾经培养出一些有用的技术人才，在今天的四化事业中还能贡献出力量，因此我不厌琐细，叙述经过，供有关同志参考。

（政协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对《我所知道的上海震旦大学》 一文的几点质疑

程 兆 奇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一九七九年第一辑刊载刘麦生写的《我所知道的上海震旦大学》一文，与事实不符之处甚多。后来马相伯先生的后人马玉章女士写了一篇《关于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及其它》一文在《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〇年第六辑刊出，对某些问题作了订正，但对震旦的几个史实问题，马玉章女士的文章仍未指出。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觉得仍须提出，以补马文之不足。

一、关于震旦开办的时间

刘文说：震旦学院“于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在徐家汇天文台原址开学上课。”但以往的各种记载都说是二月份。《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说是“千九百另三年二月之杪”；《震旦大学一览》说：“公元一九〇三年为本校创始之年……至二月杪新校成立”；唐钺等编的《教育大辞典》则明确地说：“二月二十七日开学。”

二、关于震旦创办时学生的人数

刘文说，“当时学生仅有二十人。”但据《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及《教育大辞典》诸书都说有二十余人。

三、关于一九〇五年离开震旦的学生人数

刘文说：“法籍神父南从周于一九〇五年进一步干涉学校行政，重订教学计划，马（相伯）忿而辞职。当时全部学生二十多人（包括邵力子、于右任等在内）闻而大哗，摘下校牌，集体离校。”据《教育大辞典》说：震旦创办“翌年，学生人数增加，达百余人。”从这时（即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学生退出学校时，学生人数没有大减。如果说一九〇五年退出学校的学生是“当时全部学生”，则人数不止“二十多人”。如果说退出学校的是“二十多人”，则不是“全部学生”，而只是一部分学生。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说：“上海震旦学院一部分学生因反抗传教势力之侵渎，愤而出校，另组复旦公学……”可见离校的仅是一部分学生，不是全部学生。

四、关于复旦创立时的校址问题

刘文说：“马氏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带着全部学生在徐家汇李公祠内创办了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据资料记载，复旦创立时，校址不是在徐家汇李公祠，而是在吴淞提督行辕。《教育大辞典》说：“复旦大学，创于民国纪元前七年，……由江督周馥拨借吴淞提督行辕……开办”。《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说：“离校学生于吴淞复创一校曰复旦”。复旦确曾在徐家汇李公祠中开办过，但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辛亥革命爆发后，复旦被充作光复军司令部，学校遂解散。民国元年，经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批准，由江苏都督拨借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这段历史在《教育大辞典》和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民立报》刊登的复旦公学招生广告中也有明确记载，刘文是把复旦恢复时的校舍错当成创立时的

校舍了。

五、关于马相伯“还俗”的原因

刘文说马相伯一八七五年还俗的原因是：“他在三十四岁那一年，在松江泗泾行使神父职权，做弥撒送圣体时，看上了一个女子，教会方面认为他不守清规，逼着他退出教会。”这一说法与传世的文献不同，和其他人的回忆也不同。传统的说法有二：（1）马相伯和教会屡次发生矛盾，在徐汇公学是教学内容上的矛盾，在编撰馆是与出版译著的矛盾，在南京是用厨子的矛盾。由于发生过这些矛盾，马相伯觉得无法与教会相安，所以退出了耶稣会。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材料是：张若谷的《马相伯先生年谱》、王瑞霖笔录的《一日一谈》、钱智修的《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夏敬观的《马良传》等。（2）马相伯接受神职后，被派往苏皖地区传教，那时这些地区刚经动乱，百姓穷困，到处有流亡的，马相伯不忍闾阎困穷，凑集了一些钱财，周济贫民。这事被教会得知，认为马相伯违反教规，罚他禁闭。马相伯的哥哥马建勋闻讯后，率领部下赴教会，抢出了马相伯。这样马相伯就自动退出了教会。

马相伯先生及震旦、复旦的历史情况，知情者很多，我的以上说法，如有失实之处，亦望知情者给予纠正。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31,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900

书号 11074·591 定价(六) 0.70元

内部发行



内部发行

书号 11074·591

定价 0.70 元